

澳門華商與社團的關係網絡建構及其社會資本形成

方木歡

[摘要] 澳門華商家族與社團之間的關係網絡建構是澳門研究的重要內容。重點分析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探討具有影響力的澳門華商家族如何通過支持社團發展而建立社會關係網絡，可知華商家族與澳門社團之間通過發生雙向互動，實質上形成了一種“互利共存”的社會關係網絡，從而增加家族無形的社會資本存量並形成社會權力。

[關鍵詞] 互利共存 社會資本 社會關係網絡 華商家族

一、研究背景

澳門社團林立，擁有悠久豐富的發展歷史，在澳門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各領域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澳門社會由此亦被稱之為“社團社會”。^①不少研究者就澳門社團的歷史演進、類型結構、功能創新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大範圍的研究，出現了大量具有研究價值的成果。^②同時，澳門亦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近代以來，澳門地區聚集了眾多實力深厚的華商家族，對澳門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同樣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與影響。

一些研究者就華商家族與社團的關係展開了一定範圍的研究。林廣志研究晚清澳門華商參與華人組織的發展、策劃與運營，這些華人組織包括神緣性組織、業緣性組織、慈善性組織、聯誼性組織、政商性組織，它們各自有其發展過程及其階段特點。^③林廣志還以盧九家族為個案，研究其家族如何通過鏡湖醫院、同善堂、澳門商會等社團組織積極參與或主持澳門華人社會的各項活動。^④婁勝華對於轉型時期的澳門社團研究中，在分析澳葡時期立法會議員與市政會議成員的社團背景時，就涉及了華商家族與社團的關係

作者簡介：方木歡，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廣州 510275

^①劉祖雲、徐歡：〈2013年澳門社會研究回顧〉，《當代港澳研究》（廣州），第2期（2014），頁138。

^②這方面文獻，參見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婁勝華：〈成長與轉變：回歸以來澳門社團的發展〉，《港澳研究》（北京），第4期（2016）；潘冠瑾：〈1999年後澳門社團發展的狀況、問題與趨勢前瞻〉，《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杭州），第3期（2013）；陳震宇：〈現代澳門社會治理模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1年；馬志達：〈論葡澳時期澳門社會治理的法團主義模式〉，《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3期（2011）。

^③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454—510。

^④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年，頁145—169。

發展。^①黃雁鴻研究了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的關係，探討近代華商家族中的傑出人物如盧九、盧廉若、何連旺、高可寧、崔諾枝等人在同善堂的慈善活動，以及華商家族與同善堂建立的關係網絡。^②婁勝華、潘冠瑾等人通過對澳葡時期中華總商會協商推薦的“華人代表”進行研究，發現“華人代表”的家族背景大多是具有影響力的澳門華商家族，如盧廉若、盧榮錫、高福耀、何賢等人。^③蔡永君在研究1996—2013年間三屆立法會議員的家族與社團背景時，從進入立法會的途徑來看，認為“擁有家族背景的優勢在間選上相對突出，這與間選中以社團協商為基礎的制度模式不無關係”。^④可以說，以上研究為澳門華商家族與社團之間的關係網絡研究提供了重要視角，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華商家族提供了豐富的知識經驗。不過，從澳門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澳門華商家族為數眾多，且其影響力不斷更替興衰，社團數量與作用也不斷迅速擴張，仍需要對華商家族與社團的關係發展加強研究，尤其往後還需要對澳門華商家族與社團之間的互動關係及網絡結構進行更多的專門性、系統性探索，以進一步豐富和增強澳門研究。

實際上，澳門華商家族與不少社團尤其是傳統社團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兩者互為表裏、相互滲透。譬如，澳門權威性較高的傳統大型華人社團的運轉發展，是由有影響力的華商家族在領導和運作，這些華商家族正是華人社團強大起來的背後支撐力量。因此，華商家族與社團之間構建的社會關係網絡是他們形成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而由此構建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絡對華商家族獲得社會權力起到促進性作用。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是澳門的核心社團，被稱為“三頭馬車”，^⑤正如馬萬祺所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和同善堂，是澳門華人社會中，三個較有影響的機構”，^⑥而澳門深具影響力的華商家族正是與這三大社團關係相當密切。近代以來，澳門華商家族就通過積極參與華人社團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從而與各大社團構建了較為緊密的社會關係網絡，他們也由此幾乎掌控了社團的核心權力，並獲得和積累社會資本。上述三大社團及其他社團也正由於獲得了澳門華商家族的支持，深深扎根於澳門社會之中，深受社會民眾的支持。由此而言，澳門華商家族與華人社團實質上形成了一種“互利共存”的關係網絡。因此，本文主要選取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為案例，通過分析它們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從中探討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家族等是如何通過立足和支持社團發展而建立社會關係網絡，並以此增加華商家族的社會資本存量而形成一種社會性權力。

^①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08—211。

^②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72—322。

^③婁勝華、潘冠瑾、趙琳琳：《自治與他治：澳門的行政、司法與社團（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389—400。

^④蔡永君：《轉型時期的澳門政治精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年，頁52—53。

^⑤〈馬萬祺訪問記〉（1985年7月29日），李炳時：《澳門八十年代》，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3年，頁347。

^⑥〈馬萬祺訪問記〉（1985年7月29日），李炳時：《澳門八十年代》，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3年，頁347。

二、推動澳門中華總商會發展

1913年澳門商會正式成立，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澳門華商蕭瀛洲被公推為首屆總理。而在1911年以前澳門華商並沒有社會團體之設，如若遇事則一般選擇到鏡湖醫院集議解決。1911年之後，鑑於澳門華商越來越多，為了團結澳門華商以促進經濟貿易，蕭瀛洲聯合在澳華商發起籌備組織商會，擬具綱領，條陳澳葡政府，最終於1912年12月14日獲得澳葡當局批准立案，名為“澳門商會”。澳門商會成立後，暫借同善堂為臨時辦事處，後來獲得康公廟值理會撥借木橋街4號之嘗產為會所。^①同年，澳門商會以“旅澳華商總會”名義，獲得當時的中國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到了1916年，澳門商會正式定名為“澳門中華總商會”，^②在澳門經濟社會領域中開展相關活動並不斷發展壯大。

時至今日，澳門中華總商會已是一個擁有逾百年歷史的社團，根基深厚。在澳門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下，中華總商會逐漸具備有“擬政府化”和“擬政黨化”的功能，^③它在澳門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澳門中華總商會設立之初，是以振興澳門商務、工藝、船務，並辦理關於商務、工藝、船務各事件為宗旨。^④伴隨着時代的不斷發展，澳門中華總商會的社團制度和功能作用不斷作出調整與適應。在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初期的三十多年裏，先是實行值理會總理制，後改為值理會主席制。這一制度以集體決策、總理或主席負責制為核心，任期一年。至1948年起實行理監事制，首次引入具有監察制衡功能的監事會，以作為對理事會所執行會務的監督，並於1956年起改任期為兩年。在1968至1986年期間，取消了監事會，將理事制改為會董制，權力集中於理事會或會董會。直到第五十九屆起才恢復設立監事會，至今仍一直在有效運作。1994年，總商會組成機構成員的每屆任期改為三年。1999年澳門回歸之後，便改為以會長、理事、監事制沿用至今，其特點是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⑤

^①嘗產是明清以來中國社會極其重要的資本形態，在閩粵地區比較流行，它與宗族組織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有些地方將之稱為族產、會產，主要成分是族田、山林、房屋等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一種財產，這些財產由家族成員共同約定不能將其瓜分，而是將其出租後以獲得租額，將其收益用於祭祀、培養科舉人才、修理公共設施等公共費用的支出。參見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②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史略〉，《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九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中華總商會，2008年，頁22—28。

^③婁勝華認為，在澳門回歸前，由於澳葡政府殖民管治澳門地區時，在公共物品供給、社會求助、社會整合等方面具有很大缺陷，需要澳門華人社團的協助與合作，包括中華總商會在內的澳門社團逐漸發育出“擬政府化”功能。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澳門是沒有政黨組織的，澳門社團作為參選單位，參與澳葡政治機構如立法會的選舉，因而逐漸具有“擬政黨化”功能。回歸後，在他看來，澳門社團的“擬政府化”功能有所弱化，而“擬政黨化”功能不斷加強。參見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17—234；婁勝華：〈成長與轉變：回歸以來澳門社團的發展〉，《港澳研究》（北京），第4期（2016）。

^④《澳門商會章程》第二款，1912年12月14日。在2014年1月20日澳門中華總商會第79次會員大會通過的《澳門中華總商會章程》，其宗旨為：擁護“一國兩制”，團結工商界，堅持愛祖國、愛澳門，維護工商界正當權益，做好工商服務工作，促進與外地之商業聯繫，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而努力。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主頁，<http://www.acm.org.mo/index.php/acm-intro/history/>。

^⑤邢榮發：《澳門中華總商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年，頁13。

從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之日起，其總理、主席或會長一職是由在澳門華人社會中具有聲望和能力、並深獲官方及社會民眾依賴的華人領袖擔當。在 20 世紀 20 年代，知名華商盧廉若擔任了中華總商會值理會總理，當時他還擔任澳葡立法委員會成員以及諮詢常設委員會委員，充當中國與葡人社群之間發生的摩擦矛盾的調停人。到 20 世紀 30 年代，范潔朋是早期同盟會會員，在內地軍政界擔任要職，後定居於澳門，他在 1936 年曾被選為“中華民國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新一任的澳門華人領袖，並出任中華總商會總理、主席。在抗戰時期，澳門富商、“按押大王”高可寧出任中華總商會主席，在澳門抗戰艱難時期堅持領導總商會，不遺餘力地解決澳門難民不斷增多和缺糧嚴重的問題，並成立慈善團體贈衣施食、捐資和籌集資金幫助大批難民回鄉。自 20 世紀 40 年代起，何氏、馬氏、崔氏等華商家族就開始與澳門中華總商會建立聯繫與互動，並從中積極參與中華總商會的運作與發展。

20 世紀 40 年代末，作為當地頗具影響力的澳門華商代表何賢，在 1947 年就開始進入中華總商會領導層，擔任副主席。1948 年澳門中華總商會改為理監事制，何賢連續兩屆當選為副理事長。1950 年，在柯麟、^①馬萬祺等人的協助與幫忙下，經過與中華總商會裏國民黨人的鬥爭，何賢當選為理事長。由此，何賢自 1950 至 1983 年，連任 18 屆理事長及兩屆會長，連續三十多年來一直負責領導中華總商會，為總商會有效運作與發展壯大出錢出力，在總商會的發展歷史上可謂影響深遠。馬萬祺從 1950 年、崔德祺自 1953 年開始，就一直擔任總商會副理事長，協助何賢主持總商會的會務工作，極大地提升了中華總商會在澳門社會的影響力，開創了澳門中華總商會的“何馬崔”時代。在此期間，以何賢為代表的華商家族總是不遺餘力地支持中華總商會的發展，例如籌措總商會運營經費。一個社團的正常運轉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持，資金就是能讓社團活動起來的“血液”。澳門中華總商會及附設部門所需經費龐大，歷年均出現赤字，端賴何賢理事長及社會熱心人士贊助，方能解決。到 1973 年，在何賢理事長的倡議下，為求在根本上解決商會今後經費問題，於是發起籌募建廈基金運動，擬將會所拆建為十五層新大廈，部分留為自用，其餘則作為嘗產。最後，籌得澳門幣及港幣共七百多萬元。但到 1978 年底，當總商會把新大廈圖則送呈澳葡政府有關部門時，當局政府以位於“文物保護區”為由不批准拆建。後經過總商會的多年努力交涉，終於在 1987 年與澳葡政府達成協議，在羅理基博士大馬路以批租方式興建“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除部分自用外，其餘用作寫字樓及商業單位，以籌得經費供商會運轉。^②因此，經過何賢的籌劃與努力，為澳門中華總商會的正常有效運轉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與辦公場所。

^①柯麟，是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醫學教育家，被譽為中山醫學院的一代宗師。1935 年，地下黨員柯麟醫生全家遷居澳門，此後以醫生身份作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曾在澳門擔任過鏡湖醫院值理、鏡湖醫院院長等職務。柯麟與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華商代表在澳門社會事務中進行了諸多合作。其傳記可參見魯陽、卓大宏：《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 年。

^②《澳門中華總商會史略》，澳門中華總商會網頁，<http://www.acm.org.mo/index.php/acm-intro/history/>。

澳門中華總商會的人事安排在華商家族之間得到有序更替，這使華商家族掌握了總商會的核心權力。到了 1984 年，馬萬祺接續何賢當選為會長。1986 年實行會董監事制，馬萬祺蟬聯會長。此後，馬萬祺一直連任會長，崔德祺、何厚鏞、崔樂其等出任副會長。2000 年，澳門中華總商會的制度架構改為實行會長、理監事制，馬萬祺獲選為會長，崔德祺、崔樂其、廖澤雲等擔任副會長。許世元出任理事長，馬有禮、崔世昌和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擔任副理事長，負責領導日常會務工作。從 2010 年開始，馬有禮連續三屆獲選擔任會長，崔世昌、何厚鏞也連續三屆出任副會長。在理事會上，崔世平、馬志毅、南光（集團）有限公司等擔任副理事長，負責領導日常會務工作。何厚鏞與馬萬祺也被選為第 69 屆和第 70 屆的永遠會長。^①因此，可以看出，何氏家族及其他家族與澳門這個規模最大和影響力最強的華人社團構建了密切的關係網絡，各個重要的組織機構都有家族成員在其中，且這些家族長期以來佔據了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重要位置（表 1）。實際上，何氏、馬氏與崔氏家族掌控了澳門中華總商會的核心權力，並主導推動了總商會整個的發展進程與運作活動。

表 1 何馬崔家族參與澳門中華總商會管理職務列表

屆數	會長 (主席)	副會長 (副主席)	(常務) 會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理事
35	/	何賢	/	/	/	/	/
36	/	/	/	/	何賢	/	/
37	/	/	/	/	何賢	/	馬萬祺
38	/	/	/	何賢	馬萬祺	/	/
39	/	/	/	何賢	馬萬祺	/	/
40	/	/	/	何賢	馬萬祺	/	崔德祺
41-55	/	/	/	何賢	馬萬祺 崔德祺	/	/
56-57	何賢	馬萬祺 崔德祺	/	/	/	/	/
58	馬萬祺	崔德祺	何厚鏞	/	/	/	/
59	馬萬祺	崔德祺 何厚鏞	/	/	/	/	/
60-62	馬萬祺	崔德祺 何厚鏞	崔世昌 馬有禮	/	/	/	/
63	馬萬祺	崔德祺 何厚鏞	崔世昌 馬有禮 崔世平 馬有恒	/	/	/	/

^①根據 2014 年 1 月 22 日第 79 次會員大會通過的《澳門中華總商會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本會正、副會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本會理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理事長；本會會董卸職後，得聘為榮譽會董。可出席本會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發言權及表決權。”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章程》，澳門中華總商會網頁，<http://www.acm.org.mo/index.php/acm-intro/principles/>。

64	馬萬祺	崔德祺 何厚鏞	崔世昌 馬有禮 馬有恒 崔世平	/	/	/	/
65	馬萬祺	崔德祺	/	/	馬有禮 崔世昌	崔世平 馬有恒	何厚燦
66	馬萬祺	崔德祺	/	/	馬有禮 崔世昌	崔世平 何厚燦 馬有恒	馬志毅
67	馬萬祺	崔德祺 馬有禮 崔世昌	/	/	/	馬志毅 馬有恒	馬志達
68	馬有禮	崔世昌 何厚鏞	/	/	崔世平 馬志毅	馬有恒	何敬麟 馬志成
69	馬有禮	崔世昌 何厚鏞	馬有恒	/	崔世平 馬志毅	何敬麟 馬志成	馬志達
70	馬有禮	崔世昌 何厚鏞	馬有恒	/	崔世平 馬志毅	何敬麟 馬志成 馬志達	/

註：本表主要根據《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一百周年紀念特刊（1913—2013）》，澳門：澳門中華總商會，2013年，頁114—137，以及澳門中華總商會主頁上的“組織”欄提供的《澳門中華總商會第六十九屆會長、副會長、會董、理事會、監事會各部門成員名單》和《澳門中華總商會第七十屆會長、會董、理事、監事名表》整理而成，詳細可參見 <http://www.acm.org.mo/index.php/acm-intro/history/>。

三、扶持鏡湖醫院慈善會發展壯大

澳門鏡湖醫院是鏡湖醫院慈善會創業之始沿用之名稱，是澳門歷史悠久的一所民辦慈善機構，也是澳門最早的一所華人社會福利團體。鏡湖醫院慈善會歷經晚清時期至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至今已擁有150年的歷史。1871年，為賑災救濟貧苦，由澳門之慈善人士及商行發起組織慈善團體，由當時澳門華商向政府註冊建立鏡湖醫院，進行濟施貧困、贈醫贈藥、施粥、平糶、賑災、修路、施棺殮葬、收孤養殘、興辦教育等，舉凡社會善事均力赴所能。因慈善事業不斷發展和擴充，屬下機構有澳門鏡湖醫院、鏡湖護士助產學校、鏡平學校、鏡湖殯儀館、鏡湖思親園等機構。由於名稱混淆不清，為明確管轄關係，鏡湖醫院於1942年向澳葡政府立案，改稱為鏡湖醫院慈善會，訂立慈善會立案章程，並設立總辦事處。^①在澳門歷史上，鏡湖醫院慈善會曾是澳葡政府與華人社會進行溝通與聯繫的重要渠道之一，協助澳葡政府辦理澳門華人社會事務及排解矛盾糾紛。澳門鏡湖醫院及鏡湖醫院慈善會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澳門華商和一些社會熱心人士的捐贈，以及通過舉辦籌募活動籌集經費。直到1968年，鏡湖醫院慈善會才獲得澳葡當局的資助。1988年，鏡湖醫院慈善會獲澳門總督頒授慈善功績勳章。

^①參見〈前言〉，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

何賢作為當時在澳門漸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很早就開始參與鏡湖醫院慈善會的公共事務。在 1943 年，因為澳門的物價高漲，鏡湖醫院院務開支浩繁、經濟拮据。澳門新聞協會與各界熱心人士組織發起為鏡湖醫院捐募善款，就在澳門舉行“閩澳居民為鏡湖醫院籌款大會”。這次大會由劉敘堂、高可寧、馮祝萬、傅德蔭、黃蘇、趙斑瀾組成主席團，劉敘堂、高可寧、柯麟、何賢、馬萬祺等六十多人組成常務委員會主持籌款大會。籌款大會分別組織總務、財政、宣傳、粵劇、義賣、遊藝、球賽、交際、勸募、票務等十多個工作小組。在關於這次大會的一份統計專輯〈閩澳居民為鏡湖醫院籌款大會徵信錄〉中，就記錄了何賢擔任了籌款大會的常務委員，並負責財務組的相關工作。^①這次籌款大會得到社會各界人士廣泛支持和捐助，總計捐得善款實數葡幣八萬餘元。

由於何賢先生為人厚德，寬達豪爽，熱心濟施，與鏡湖醫院慈善會林炳炎先生、柯麟院長、馬萬祺先生等人相交甚厚，志同道合，為鏡湖醫院慈善會事業的發展起到棟樑性的作用。特別是 1946 年，抗戰勝利後，對鏡湖醫院慈善會的興革、建樹以至善業籌募功績顯著。^②據統計，在錢銀捐贈上，1949 年 3 月，何賢捐 3 萬澳門元予鏡湖醫院；1950 年 6 月，何賢捐 1 萬澳門元予鏡湖醫院；1957 年 6 月，鏡湖醫院赤字 22 萬澳門元，由何賢的大豐銀號墊支；1958 年 4 月，何賢率先認捐鏡湖醫院籌款 30 萬澳門元。^③同時，在 1950 年何賢任慈善會副主席時就捐資購買醫療儀器。到了 1956 年，何賢出資在鏡湖醫院內興建何澄溪紀念堂，作為捐予鏡湖護士學校的新校舍。

1945 年，何賢擔任慈善會值理會的理事。從 1946 年開始，何賢進入鏡湖醫院慈善會的領導層，對慈善會的發展投入精力與支持。1946 年 3 月 22 日，鏡湖醫院慈善會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修訂會章，將值理會改為董事會，以兩年為一屆，選舉正副主席及董事，慈善會設秘書長，醫院設院長。慈善會的董事會包括主席林炳炎、副主席何賢、謝保明，名譽董事長孫科，名譽副董事長戴思樂（Gabriel Mauricio Teixeira），名譽董事高可寧、劉柏盈、傅德蔭、畢侶儉、馬師曾等 42 人，董事孔宗周等 17 人。1948 年，改制後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第二屆董事會產生，選林炳炎為董事會主席，何賢、謝保明為副主席，孫科為名譽董事長，戴思樂為名譽副董事長。當時還選出戴恩賽、馮祝萬、劉敘堂、高可寧、劉柏盈等 42 人為名譽董事，孔宗周等 17 人為董事，並且以柯麟醫生為鏡湖醫院院長。^④

從 1950 年開始到 1953 年的第三、四屆董事會，何賢被選任為慈善會主席，柯麟、鍾子光為副主席。從 1954 年開始到 1979 年的第五至第十一屆董事會，何賢連任慈善會

^① 〈閩澳居民為鏡湖醫院籌款大會徵信錄〉，1944 年 8 月，載《鏡湖醫院慈善會創辦 130 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

^②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頁 234。

^③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81—282。

^④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2707、2735。

主席，馬萬祺、柯麟為副主席。直至他逝世前，何賢出任第十二屆董事會的主席，而且從1966年到1983年一直任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校長。對於他何以能連任這個職位，何賢自己亦談到，“有的機構有人爭，（慈善會）這個檔口，幾十年來就沒有人爭”，而且“鏡湖醫院是年年要進貢（捐錢）的慈善機構”，“我的時間，為大眾做事花得比較多”。^①後來，這一主席之職由馬萬祺繼任，連任四屆。在1985年至2000年的第十三至第二十屆的董事會上，何賢之子何厚鏵任職董事會的董事、常務董事、以及副主席及永遠主席。何賢之子何厚韶在2000年第十六屆董事會上，擔任常務理事，何厚鏵在第十九屆上任名譽主席。何賢之兄何添以及崔氏家族代表人物崔德祺從十二至十六屆就一直為名譽董事。何氏家族年輕一代何敬麟、何敬豐也開始在慈善會董事會承擔相關職務。馬氏家族的馬有禮、馬有恒、馬志毅、馬志成也在其中擔任重要的職務（表2）。來自崔氏家族的崔世安就曾在慈善會董事會任職董事、常務董事，並曾在1988年至2000年期間一直擔任鏡平學校校長。

表2 何馬崔家族成員在鏡湖醫院慈善會的職務

屆數	時間	主席	副主席	董事	常務董事	理事長	常務理事
1	1946-1947	/	何賢	/	/	/	/
2	1948-1949	/	何賢	馬萬祺	/	/	/
3	1950-1951	何賢	/	馬萬祺	/	/	/
4	1952-1953	何賢	/	馬萬祺	/	/	/
5-12	1954-1985	何賢	馬萬祺	/	/	/	/
13	1985-1987	馬萬祺	/	何厚鏵	/	/	/
14	1988-1994	馬萬祺	/	馬有禮 崔世安	何厚鏵	/	/
15	1995-2000	馬萬祺	何厚鏵	/	馬有禮 崔世安	/	/
16	2000-2006	馬萬祺	/	/	/	馬有禮	何厚韶
17	2007-2010	馬萬祺	/	/	/	馬有禮	/
18-19	2011-2016	/	馬有恒	/	/	/	馬志毅 馬志成 何敬麟
20	2017至今	/	馬有恒	/	/	何敬麟 (副理事長)	馬志毅 馬志成 何敬豐(理事)

註：根據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頁249—251，以及《鏡湖通訊》（澳門），總第109期（2010）、總第128期（2014），總第146期（2017）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

^①黃霽：《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頁367—368。

四、促進同善堂事務管理

澳門同善堂創辦於 1892 年，是由一批港澳紳商發起倡建的慈善團體，屬於澳門民間多元化的慈善機構，至今已有逾百年歷史，與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和澳門中華總商會被稱為“澳門華人三大社團”。^①同善堂在開辦之初，為便於管理，便實行值理會制，由捐資倡建者公推總理和值理若干名管理堂務，值理會由此成為了同善堂的核心，後伴隨時代的發展，制度也不斷改革和完善。同善堂堅持社會慈善公益服務，其宗旨是“同心濟世，善氣迎人”，為澳門社會大眾提供免費服務，為有需要的人給予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幫助。目前同善堂日常的主要服務包括助貧施濟、贈醫施藥、免費教育、免費托兒及緊急救援等項。同善堂的經費來源主要包括：一年一度沿門勸捐、平時各界善長捐款、嘗產租項收益、值理自行捐款、政府有關部門的津貼資助。^②

在同善堂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高可寧、崔諾枝和崔德祺三位為同善堂和澳門華人社會出錢出力，貢獻良多，在同善堂內設有三位的銅像。其中，崔諾枝父母為進教華人，自幼信教，長期生活於葡人社會，和葡人關係密切，他從 1920 年代開始進入同善堂服務，在 1920—1924、1928—1929 年間擔任值理，1933—1945 年間成為值理會總理。也就是說，從 1933 年開始，崔諾枝就掌管同善堂，一直到他辭世為止。崔諾枝過世後成為同善堂的永遠值理，而他的兒子崔樂其，則由 1964 年開始成為同善堂的值理，1967—1997 年擔任值理會副主席。而崔德祺家族很早就參與同善堂的服務工作，崔德祺父親為崔六，原名崔殿明，是 20 世紀 20、30 年代以建築發跡的華商。1929、1938—1941 年就任同善堂值理，現今同善堂會址上還掛有崔六的瓷像。由於崔六長年擔任值理，1948—1949 年被選為永遠值理。^③同善堂發展到今天，崔六的後代都在負責主理，崔德祺從 1942 年開始就加入同善堂值理會，1953 年任職主席，一直連任至 2007 年 10 月逝世為止。而崔德祺和崔樂其是何賢在澳門重要的合作夥伴與助手，在協助何賢處理澳門的政治與社會事務中提供了不少支持與幫助。

何賢雖然沒有擔任同善堂值理的職務，但一直鼎力支持同善堂的發展，通過協助同善堂值理會救助社會弱勢群體和貧病孤弱，扶助同善堂的事務管理。抗日戰爭期間，同善堂就堅持開展施粥工作，在 1943 年每日施派“難童粥”逾千份，以救濟大批湧來澳門的難童和澳門的孤兒貧童。當時聯生公司、何賢、鍾子光等捐款開辦“難童粥”，按粥票領粥，實報實銷。^④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由於澳門經濟甚為蕭條，同善堂大力開展贈醫施藥、

^① 莊金鋒：〈從澳門社團的特殊性看“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一國兩制”研究》（澳門），第 6 期（2010）。

^② 〈同善堂百年光輝史〉，《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1892—1992）》，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 年，頁 86—90；〈同善堂歷史沿革〉，《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1892—2002）》，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 年，頁 89—91。

^③ 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308—314、317。

^④ 《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1892—1992）》，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 年，頁 88。

扶貧救災等賑濟活動，都得到何賢捐助經費，當時受惠的貧民多達數千人；1952年12月，同善堂懸掛何賢及其父何澄溪像，褒揚何氏父子歷年捐款10餘萬澳門元，當月，何賢捐23,000澳門元予同善堂施粥；同年，何賢將新居落成時歡宴親友的部分筵席金，連同個人捐款5萬澳門元，贈予同善堂；1953年6月，承擔同善堂1個月的施粥經費；10—11月，分兩次捐12,000澳門元予同善堂繼續施粥；1954年，主持“吳陳比武”表演，籌款10多萬澳門元，支持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1958年1月，捐新棉衣1,400件，由同善堂向貧民派發；1959年4月，捐19,000澳門元予同善堂施粥。^①而何賢支持同善堂發展的最為突出事例就是在1963年捐贈35間樓宇給同善堂和鏡湖醫院，屬於是“大手筆”的捐贈，同善堂從中獲得五成的產權，即獲贈十多間房屋。當時社會上的報紙記載了何賢這一社會義舉，同善堂和鏡湖醫院慈善會先後登報鳴謝何賢的捐款。報紙報道了澳門居民以何氏慈善為懷、慨斥巨資承購並捐贈鏡湖醫院、同善堂，深為感動，而社會人士對何氏此義舉莫不深為讚揚。記者以何氏完成此次義舉，向何賢道賀，何賢謙謝說：“這是社會慈善事業，我是樂意做的。這樣既可以使到二千多居民繼續安居樂業，也可以紀念故夫人郭綺文、胡燕嬌，而鏡湖和同善堂又增加慈善經費，因此我是樂意略盡綿力的。此次屋宇能順利轉讓，是得到澳督羅必信關懷與同情，特別准許不用開拍，由鏡湖、同善堂承購作慈善經費，足以說明澳督羅必信關心居民生活與樂意致力於慈善事業。”^②

同善堂在1963年8月12日刊登了鳴謝捐款啟事，內容是：“本堂現蒙何賢先生斥資承購亞美打街、施利華街、青草街、大興街、田畔街五條街道，共屋宇三十五間，全部業權，以五成捐贈本堂，所收租項，亦充善費，並將此善產紀念其故夫人郭綺文、胡燕嬌兩女士之生平懿範，以誌德徽，足徵熱心慈善，嘉惠貧民，本堂的拜賜之餘，其深感紉，爰書數語，藉伸謝忱。”^③

鏡湖醫院則在1963年8月27日的《澳門日報》上刊登鳴謝廣告：“何賢先生為紀念其已故夫人郭綺文、胡燕嬌兩女士之生平懿德，特斥資承購座落本澳亞美打街、施利華街、青草街、田畔街、大興街五條街道之樓宇共三十五幢，永遠捐贈鏡湖醫院及同善堂為善產，並以該善產全部租項收益撥充善款，鏡湖醫院佔五成，同善堂佔五成，本會拜領之餘，謹代表貧病者致深切謝意，此啟。”^④此外，何賢還於1978年將田畔街五福大廈名下的樓宇捐送予同善堂，現成為澳門同善堂第二托兒所的所在地。^⑤何賢這些捐贈在同善堂捐冊上屬較為罕有的慨捐，妥善有效地紓解了貧民疾苦，有利於維護澳門社會秩序穩定，因而自然受到澳門社會各界普遍的讚賞。

^①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82。

^②〈五街三十五間屋宇，何賢斥資承購後轉送鏡湖同善堂〉，《大眾報》（澳門），1963年8月11日。

^③《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1892—2002）》，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年，頁95。

^④《澳門日報》（澳門），1963年8月17日，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頁234。

^⑤〈各善長送業名錄〉，《同善堂一百二十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13年，頁208。

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何氏、馬氏、崔氏等華商家族就與同善堂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通過不同途徑、渠道與同善堂建立了不可磨滅的關係，積極推動參與同善堂的運作發展（表 3）。崔氏家族代表崔德祺在 20 世紀 50 年代管理同善堂的運作，家族成員崔世昌從 1984 年第 86 屆開始擔任值理、副主席、主席，崔世平擔任值理、副主席，崔世安也曾擔任過值理。何氏家族成員何厚鏵直到 1986 年才開始參與同善堂管理，出任值理。從第 88 屆起，何厚鏵連續五屆擔任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何厚焯也曾擔任過值理和副主席，其子何敬麟後來也擔任多屆值理。何氏家族成員何厚鏗曾在第 95 屆任副監事長，如今也已連續兩屆擔任值理會副主席。從 1997 年同善堂第 92 屆值理會至今，馬氏家族成員馬有友也在其中一直擔任值理會理事、監事。

表 3 三大家族參與同善堂值理會管理

屆數	主席	副主席	值理
76-85	崔德祺	/	/
86	崔德祺	/	崔世昌
87	崔德祺	/	何厚鏵、崔世昌
88	崔德祺	何厚鏵	崔世昌、崔世安
89	崔德祺	何厚鏵	崔世昌、崔世安、崔世平
90	崔德祺	何厚鏵	崔世昌、崔世安、崔世平
91	崔德祺	何厚鏵	崔世昌、崔世平
92	崔德祺	何厚鏵	崔世昌、崔世安、崔世平、馬有友、何厚焯
93	崔德祺	崔世昌、何厚焯、崔世平	馬有友
94	/	崔世昌、崔世平	馬有友、何敬麟
95	/	崔世昌、崔世平	馬有友、何敬麟
96	崔世昌	崔世昌、何厚鏗	馬有友、何敬麟
97	崔世昌	崔世昌、何厚鏗	何敬麟

註：根據《同善堂一百二十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13 年，頁 172—181 提供的〈歷屆理值芳名錄〉以及澳門同善堂主頁 (<http://www.tst.org.mo>) 提供的第 96 屆、第 97 屆值理會名單整理。

由此可見，這三大華商家族一直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同善堂的管理活動中，為同善堂的慈善事業發展、推進澳門社會慈善服務作出了不少努力和貢獻。也基於此，何氏家族與同善堂這個澳門歷史最古老的社團構建了深不可破的社會關係網絡，並在這個關係網絡中起到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五、作為活動“主陣地”的中華總商會

在何氏、馬氏、崔氏家族與傳統社團構建的社會關係網絡中，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是這些華商家族在澳門社會發揮影響力的三大重要平台。他們在社團的活動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是領導和發展社團。澳門華商家族及其眾多成員在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慈善會、同善堂等社團中擔任重要職務，成為社團的精英代表。正是這些華商家族及其成員的有力支持，維繫了社團的正常運行與有效發展。二是籌措社團運營經費。維繫社團運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四種：會員繳納的會費；租業收入與其他經營性收入；社團內部與社會募捐；政府資助。其中，傳統社團有大量來自華商家族無償捐助的遺產，設有專門的管理委員會將遺產收益用於社團會務。三是向社團輸送家族精英成員。澳門社團迅速增長，大型社團也徵求新會員，不少家族精英通過進入這些社團並相繼承擔重要職務，成為促進社團發展的中堅力量。四是進入政府機構為社團發聲。在澳葡政府管治時期及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之後，不少社團成員與負責人都在政府相關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就不乏有影響力的華商家族成員，如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成員、立法會議員、特首選委會成員、諮詢委員會成員等，這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為其所代表的社團發聲，向政府有關機構部門反映意見建議，維護社團會員與社會民眾的合理權益。華商家族通過積極主動地參與社團事務與發展活動，不僅使他們掌控了該社團的運作與發展，也通過該社團與其他方面如政府、政黨組織等建立了重要聯繫，進一步積累社會資本。

這裏將以澳門中華總商會為重點，分析華商家族如何從其社會關係網絡建構中獲得社會權力。在歷史上，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人自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領導職務開始，就積極主動地參與總商會的管理、維護和運行，通過總商會與澳葡政府、中國政府進行互動與接觸，領導總商會協助和支持解決1952年中葡關閩武裝衝突事件、“一二·三”事件及其他政治社會事件，為澳門社會穩定發展作出了不少貢獻，由此奠定了這些家族在澳門中華總商會的影響力和社會地位。除此之外，中華總商會還是這些華商家族參政議政、處理澳門社會事務以及協助澳門政府管治的主要平台，表現在經由總商會參政議政、調解勞資糾紛以及參與解決外勞騷動事件，以協助當局政府維繫社會秩序穩定。

（一）經由總商會參政議政

澳門中華總商會前理事長許世元回憶，自新中國成立後，何賢當選為總商會理事長，由於他處事誠心、公正及為人慷慨疏財，並代表商會出任多個政府委任職務，事事為居民出頭，漸漸成為澳門華人首席代表，“其時可謂事無大小，只要何賢出面處理就一定會擺平”。當時各大社團負責人經常到大豐銀行會見何賢，商議需要處理的事務，特別是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馬萬祺及同善堂主席崔德祺經常參與處理相關社會事務。當然，若有重大事件發生時，他們還必須首先與時任澳門南光貿易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商議，因其時南光相當於新華社澳門分社的性質與功能。^①

^①那榮發：《澳門中華總商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年，頁52。

在澳門回歸之前，澳門中華總商會已有多位負責人分別在立法會、諮詢會、市政廳、經濟諮詢委員會、職業稅評定委員會、營業稅評定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等擔任議員或委員，^①為澳門居民及工商界反映意見，爭取合理權益，以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在澳門回歸後，澳門中華總商會積極配合和支持特區政府各項政策，為澳門社會的經濟繁榮以及“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在澳門的成功實踐發揮作用。該商會仍然有多位負責人分別在行政會、立法會、經濟發展委員會、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澳門基金會等機構和組織擔任議員、委員和顧問。從1976年澳葡當局推行《澳門組織章程》成立立法會以來，至澳門特區立法會的組成人員中，多位中華總商會主要負責人或獲官方委任，或通過間接選舉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代表僱主、專業、慈善等團體在立法會發聲，參政議政。1976年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獲澳督李安道（José 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委任為首屆立法會官委議員，並在第二屆立法會當選為副主席。總商會副會長馬萬祺則出任第一至第五屆立法會議員。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曾任立法會議員、副主席。曾擔任總商會副會長的何厚鏞在1988至1999年期間也先後出任立法會議員、副主席。到了今天的澳門特區，何氏、馬氏、崔氏等家族都有家族成員活躍於立法會，例如在第五屆、第六屆立法會上，總商會副會長崔世昌、副理事長崔世平、常務理事馬志成，均是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②

（二）調解勞資糾紛和外勞騷動事件

澳門中華總商會也是華商家族參與澳門社會治理的重要平台，成為澳門華商與社會民眾之間進行聯繫、溝通、接觸的渠道與途徑，例如參與調解澳門的勞資糾紛或協助政府解決外勞騷動等問題。

一是參與勞資糾紛調解。1967年，受中東局勢影響，澳門經濟發生波動，一家生產橡膠的公司之葡人老闆決定壓減工人工資，七名工人代表前去和公司老闆談判，結果不但談判沒有成功，七名工人代表反而被無故解僱。工人向澳葡市政當局反映無果後，向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何賢求助，何賢應允前往橡膠公司商談，這老闆表面上答應認真解決，但最終沒讓工人代表復工，於是橡膠公司工人進行罷工以示抗議，後面還是由何賢出面調解，最終迫使橡膠公司重新僱用工人代表，使罷工事件得到妥善解決。^③

二是協助解決外勞騷動事件。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於澳門工業快速發展，出現工人不足的情況，於是澳門廠商紛紛向內地聘請勞工，期間一批又一批內地勞工來到澳門工作。但是，由於這些勞工只是持護照的來澳人士，且人數眾多，澳葡當局即以持護照入境乃屬旅遊性質，不准留在澳門工作為由，要求廠商即時辭退這些勞工。但是，這些勞工不

^①對於澳門回歸前有關委員會的具體設置，以及澳門中華總商會有關負責人的具體任職情況，參見古維傑（Rogério Beltrão Coelho）編：《澳門立法會成立二十週年（1976—1996）》（附錄），澳門：澳門立法會，1996年，頁36—54。

^②邢榮發：《澳門中華總商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年，頁43。

^③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頁150—152。

肯返回內地，廠商迫不得已只能停止宿舍的水電供應及不發放工資，以致當天晚上爆發了勞工聚集抗議事件。^①後來，由何賢領導的澳門中華總商會派出崔樂其、彭彼得、許世元等商會負責人趕往現場進行調解，經多方協商，終獲三方諒解，以向這些勞工承諾廠商將立即恢復勞工宿舍的水電供應和發放工資，及在澳葡當局答應准許這些勞工暫無需離開澳門，並於期限內申辦正式居留手續等條件下，事件始告平息。後來考慮到澳門工業確實急需大量工人支持生產，澳葡政府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向那些勞工發放了身份證，這些工人遂發展成為促進澳門工業發展的生力軍。1982年，澳葡政府委托澳門中華總商會、廠商聯合會、出入口商會、建築置業商會及毛織毛紡廠商會，連續十天開展徵集工廠、公司及商號等受僱的無證員工及其家屬、以及有證勞工無證家屬的身份信息登記工作，成功登記了受僱無證員工 23,800 人、其無證家屬及有證勞工無證家屬各有 3,000 人。至 1984 年 5 月，澳葡政府向他們發出了澳門身份證，領證者人數達 24,016 人。

六、結論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研究意大利南北地區差異中提出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徵，諸如信任、規範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社會資本，如信任、規範和網絡，一般來說都是公共品”，其中“信任是社會資本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②從澳門華商家族的政治影響力和社會活動來看，這些華商家族要獲得的社會影響力，其形成與發展同樣需要掌握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華商家族發展壯大並得以延續至今的重要因素。而華商家族獲得並積累的社會資本，離不開社團的支持以及社會民眾的信任認同。華商家族自身與社團建構的整個社會關係網絡，通過承擔社團領導職務、參與管理社會事務、捐贈募集運作經費、代表社團表達民眾訴求、協助民眾解決糾紛矛盾等途徑而積累。如從慈善捐贈來看，有學者研究了中國民營家族企業主的慈善捐贈行為，認為家族企業主的慈善捐贈會給家族企業建立政治聯繫，而這種政治聯繫為家族企業主帶來社會地位、為家族的經濟產業帶來利益優惠，以及與政府建立相互依賴的關係。^③但是，從接受澳門華商家族慈善捐贈的社會團體角度來看，華商家族的慈善捐贈除了能夠建立政治聯繫之外，還與社會團體建立社會聯繫從而獲得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重要資源，也會使華商家族獲得社會民眾的信任與認同，提升華商家族在澳門地區的社會地位和民眾支持度，從一定程度上促使政權機構與華商家族建立更為緊密相連的關係網絡，以借助華商家族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維護澳門社會管治和秩序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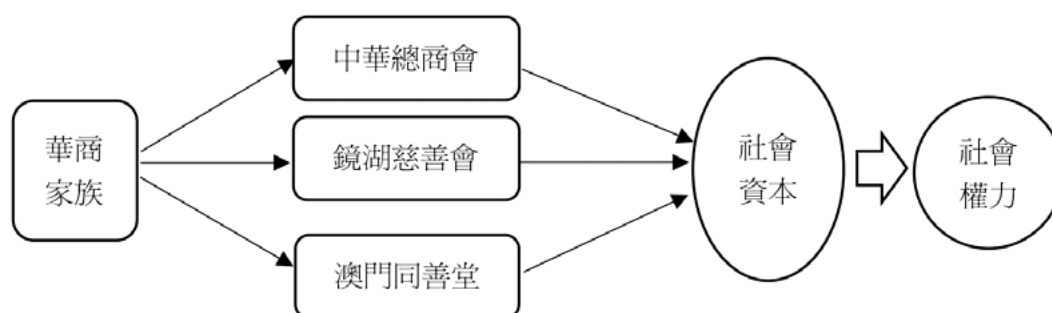
^①邢榮發：《澳門中華總商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年，頁52—53。

^②（美）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王列、賴海榕等譯：《使民主運轉起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16—221。

^③陳凌、王昊：〈家族涉入、政治聯繫與制度環境——以中國民營企業為例〉，《管理世界》（北京），第10期（2013），頁130—141。

的治理目標。以澳門何賢家族、馬萬祺家族、崔德祺家族為例，本文發現這些華商家族與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澳門同善堂等重要社團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社會關係網絡（圖 1）。華商家族與澳門社團緊密相連並相互合作，積極主動地參與社團運作，從而推動社團不斷走向壯大發展，有利於華商家族從中積累充實的社會資本，促使其在社會領域中獲得深厚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從而形成一種社會權力。

圖 1 華商家族與社團的社會關係網絡



在澳門，這些華商家族不僅影響或掌握了社團的領導權或控制權，而且對社團的運作發展與趨勢走向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他們通過與社團的互動建立起一個緊密的社會關係網絡。概而言之，這些華商家族與澳門社團所構建的互動關係網絡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

一方面，澳門華商家族為社團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支持。在一個澳葡政府進行殖民統治的社會裏，由大型的華人社團管理華人事務並為華人利益服務，其運營需要依賴各種資源的支撐，在澳葡政府資助少之又少的情況下，澳門經濟實力較強的華商家族能夠為其提供物質支持，如房產物業、錢財、物品等各方面的慈善捐贈，社團的發展和壯大實質上是離不開澳門華商家族的支持。澳門華商家族通過慈善捐贈等方式與社團建立社會聯繫，既幫助澳葡當局減緩了社會管治的壓力，也給底層公眾帶來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從而使澳門華商家族在地區政治中獲得與澳葡政府的政治聯繫。

另一方面，澳門華商家族需要通過積極參與社團管理，並經由社團參政議政。在澳門，經濟實力雄厚的華商家族除了慈善捐贈外，還積極主動地參與社團管理事務，在三大社團及其他社團中承擔領導性職務並成為社團領袖。由於社團具有強大的社會管理功能，澳葡政府需獲得社團領袖的配合與支持，這更加強了澳門華商家族與澳葡政府的政治聯繫。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發現澳葡時期“立法會的華人政治精英當中，他們絕大部分均屬於某一社團的領導或管理層，除第一屆立法會外，其餘各屆均佔當屆華人議員比例的八成以上，而在各社團中，以被稱為屬於澳門的頂級社團如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中華教育會等五大

社團所佔比例最為突出”。^①何氏家族核心人物何賢在1955年就以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身份被澳督委任為政務委員會成員，成為“華人代表”。在澳葡時期的立法會建立之初，何賢與來自馬氏家族、崔氏家族的兩位核心人物馬萬祺（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崔德祺（同善堂值理會主席、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就通過間選或委任的途徑成為立法會議員。在此期間，何賢在第二屆還當選為立法會副主席。在澳葡時期第三至第六屆的立法會，何氏家族成員何厚鐸更是以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銀行公會主席的社團職務被連續間接選舉為立法會議員，並連續擔任最後兩屆澳葡立法會副主席。正是這些有影響力的華商家族在社團形成的影響力和支配力、以及它所掌握的社會資本，使得從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政府就將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吸納到國家政權機構中，如來自何氏家族的何賢、何厚鐸就曾先後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他們積極主動的行動參與到國家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當中。

概而論之，澳門華商家族與華人社團之間不僅發生了雙向互動，而且實質上形成了互利共存的社會關係網絡：一方面，華人社團要發展與壯大，就需要得到澳門華商家族源源不斷的財力支持、物質以及人力輸給，從而促使社團自身植根於社會各階層之中，以在社會中擁有深遠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另一方面，華商家族通過華人社團獲得充足的社會資本，表現為通過持續性的慈善捐贈行動和擔任社團的領導職位，使華商家族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認可，為華商家族的經濟產業帶來更多的利益優惠和政策保障，以確保華商家族的生存與發展。因此，澳門華商家族與社團構建的社會關係網絡是華商家族整個關係網絡的基礎性一環，華商家族要與資本、政府和政黨構建關係網絡，繞不開華商家族與社團構建社會關係網絡這個關鍵性環節。而澳門華商家族與社團構建緊密的社會關係網絡，正是他們通往成為澳門最具影響力的華商家族的重要途徑之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

^①蔡永君：《轉型時期的澳門政治精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年，頁52—53。

雙向合流：2021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趙哲

[摘要] 2021 年有關澳門文學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一年來，澳門文學不僅以獨特的風姿和紐帶性的作用積極融入大灣區文學共同體，驅動力更加精準，研究視野也更為清晰；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澳門文學正在努力構建在地感極強的研究圖景，在創作和研究方面各有收穫。從澳門文學現代性的發生、歷史沿革到各文體的發展狀況，研究的深度逐步推進，在構建本土化研究系統的同時，同步面向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融入，總體上呈現出雙向發力的趨勢。

[關鍵詞] 文學 大灣區 本土性 澳門

一、大灣區文學視野中的澳門文學

澳門文學近來在大灣區文學共同體構建的過程中逐漸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和價值，澳門文學的研究史也逐漸進入了學界視野。隨着大灣區文學後續發展的方向，澳門文學的發展也有了更加明確的任務。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一項重要的文學活動是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廣東省作家協會嶺南文學空間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一周年座談會暨廣東文學評論年會。會上，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吳義勤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編委的身份指出，面向粵港澳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在廣東熱烈的文學氛圍中，這一年來逐漸形成了越來越清晰的風格和定位，社會反響也越來越大，這些都為刊物今後行穩致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對於刊物今後的發展方向和工作任務，他還提出了要將香港文學的經典化和澳門文學的經典化工作提上日程，完成大灣區文學歷史感與現場感的有機結合，在形成鮮明的文風和立場的基礎上，以刊物欄目和話題設置帶動文學活躍度，在跨界意識和大文學意識開闊包容的視野中，^①組建和培養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家隊伍，力求大灣區可以成為今後向全國輸送評論家的一方陣地。^②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當代香港文學跨界現象研究”（編號 20FZWB06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媒介融合與當代江蘇文學跨界互動研究”（編號 2020OJSA1089）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徐州 221006

^① “大文學”思想是對文學特質和文化建設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晶。詳細參見張毅：〈從“純文學”觀念到“大文學”思想——兼談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古今會通〉，《文學與文化》（天津），第 1 期（2020），頁 15。

^② 王金芝：〈《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一周年座談會暨廣東文學評論年會專家發言摘要〉，《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 6 期（2021），頁 153—158。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立，2021年的澳門文學研究也隨着大灣區文學的整體發展時常被學界的視點所觀照，例如山東大學黃萬華教授提出的香港、澳門文學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前存在”。在〈“前存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香港澳門文學〉一文中，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作為三地文學發展歷程的一種結果，其中的“前存在”至關重要，^①即三地當代文學七十年歷史所積累的“本土性”、“開放性”和“關聯性”。該文以報刊為重點的考察視角，對置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之中的香港和澳門兩地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爬梳，集中分析了香港文學和澳門文學如何透過報刊媒介，在進入文學歷史現場的“物”、“人”、“事”三個維度上——文本場所（書籍與報刊）、文學作品所面向的主體和受體（作者與讀者），以及文學現象與事件，完成粵港澳大灣區特殊的文學場域的建構，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粵港澳文學構建了“遠超”該地域文化空間的“中華民族文化體”。這樣的觀點不僅肯定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意義，還指出了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灣區文學帶來的民族文化意義。

又如中國傳媒大學樂琦教授等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源流及傳承述評〉一文，文章從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淵源入手，以述評的方式對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分別進行了文學歷程的溯源，雖然三地之間文學與文化內在的千絲萬縷關聯並沒有在文章中呈現，但作者提及的晚清嶺南文學、香港學海書樓等重要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場所，卻是我們進入大灣區文學史現場的重要憑據。^②文章對澳門文學史進程的基本脈絡作出了鳥瞰式的宏觀梳理，從澳門進入文學視野的起點——湯顯祖與賈梅士開始，延續這一條線索指出了澳門葡語文學與澳門土生文學的起始，以及“澳門作家”的界定問題，並從李觀鼎等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2009）、鄭煒明《澳門文學史》（2012）、李淑儀的博士論文〈十六至二十世紀澳門葡語文學的探索與研究〉（2000）、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相關論述以及張劍樺對澳門文學意義的發掘等重要的文獻，結合回歸後澳門文學發展的成就，例如作家出版社與澳門基金會、中華文學基金會共同出版的澳門文學系列叢書等，列舉出了有關澳門文學重要的研究成果。儘管一些重要的專著未被文章提及，像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2018）、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2018）和朱壽桐主編的《澳門文學編年史》（2019）等，但作者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視野盡力向我們展示出澳門文學研究史的發展圖景，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二、澳門新文學的發生及澳門文學史沿革

澳門現代文學的發生或成為2021年度的熱點話題，學者們紛紛對此提出重要的觀點。而新史料的發現也刷新了以往學界對澳門現代文學的發生和20世紀30、40年代澳門文學生

^①黃萬華：〈“前存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背景下的香港澳門文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5期（2021），頁5。

^②樂琦、范伊夫：〈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歷史源流及傳承述評〉，《粵海風》（廣州），第1期（2022），頁9—12。

態的認識。如廣東海洋大學學者李明剛詳細闡述了澳門本土刊物《醒心周報》等新史料的價值，^①通過梳理在其中發表的白話文各文體作品，瞭解這一時期澳門新文學初步向現實主義靠攏的基本樣貌。值得注意的是，文藝色彩頗為濃厚的創作及編輯風格卻偏偏寄生於這樣一本本土宗教刊物上，由此折射出彼時作為殖民地的澳門在新文學發展歷程中的曲折境遇。作者指出，《醒心周報》從第三期開始推出“新綠”專欄，這是面向本地青年以及在校學生的創作專欄，從作品舉隅不僅可以看到“新綠”作為本土學生新文學創作園地的角色，刊物還通過定期舉辦作家座談、徵文比賽、頒設獎項等文學活動，激發本土作者尤其是青年的創作熱情，不難看出《醒心周報》對本地文壇新生力量的重視，以及對澳門新文學發展的重要作用。此外，作者還詳細介紹發表在《醒心周報》上、進行白話文寫作實踐的三篇文章，^②又結合了本土作家陶里和時代親歷者李鵬翥對 20 世紀 30、40 年代澳門文學現場的回顧為佐證，認為《醒心周報》對澳門新文學在創作實踐和白話文理論建設方面具有雙重助推意義。的確，作者對《醒心周報》的發現，更新了以往學界對於澳門新文學發生時間點的認知。而這一時期行旅至此的南來文人在澳門的創作和相關論述頗具先行者的意味，打破了殖民地新文學園地過往的沉寂，為澳門新文學發生和發展注入了養分。

澳門科技大學趙海霞教授同樣關注到了澳門白話文學（新文學）的起點問題，從澳門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縱向梳理了以白話文學為代表的澳門新文學走過的歷程。作者首先向我們展示了晚清時期澳門地區對內地白話文運動的首次回應——陳子褒白話啟蒙讀本。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20 世紀初白話文報刊的創辦蔚然成風，全國各省幾乎都有所回應，而地處南隅的澳門也不例外。1904 年陳子褒主編的《婦孺報》、《婦孺雜誌》“為澳門白話文學的興起吹響了前哨”。^③他為了推廣白話文給婦孺，親自實踐啟蒙教育活動以涵養新人，宣導他們接受教育，並先後為其推出系列白話啟蒙教材，如《改良婦孺須知》、《三字書》、《四字書》、《五字書》、《婦孺八勸》、《女兒書》和《愛國書》等，這些教材也被廣泛用於粵港澳地區的學堂與書塾中。據介紹，陳子褒對於白話文的積極宣導還見於他在《知新報》發表的〈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認為白話文的推廣有利於開民智民風，促進國家進步。整體來看，我們不能因為這一時期的澳門沒能像內地那樣完成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完全轉身而磨滅陳子褒在澳門地區為白話文推廣所做的多種積極嘗試，相反，正是因為這一聲實實在在的“在地”式獨響，打破了澳門新文學道路的沉寂，為 20 世紀 30 年代澳門新文學的正式登場奠定了基礎；隨後作者沿襲時間線索，從澳門第一首白話新詩馮秋雪的〈紙鳶〉（1920）、聞一多〈七子之歌·澳門〉（1925），以及馮秋雪、馮印雪和趙連城的新詩集《綠葉》（1928）、郁達夫的小說《過去》（1927）、白話散文

^① 李明剛：〈發生期澳門新文學再探——以《醒心周報》等新見史料為視角〉，《華文文學》（汕頭），第 4 期（2021），頁 32—42。

^② 分別是京呼平的〈寫作漫談〉、柳翌的〈寫作之路〉以及應如的〈閒話新詩〉。

^③ 趙海霞：〈轉型與新生：澳門白話文學的興起及文體變革〉，《學海》（南京），第 1 期（2022），頁 198。

〈艙中之夜〉（1933）、〈寫白鴿巢公園〉（1937）、白話劇本〈鬼子進家之結果〉（1938）到長篇白話小說《虎窟情花》（1938），由此基本勾勒出澳門新文學早期（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大致樣態；之後作者就澳門文學踏上新文學旅程作出的準備進行了三點概括：第一，作家身份從士人階層普遍下移；第二，作品的主導思想也發生了改變，由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一元思想模式發展成了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多元碰撞，作品內容也開始向現實主義靠攏；第三，新文體的全面發展，湧現了白話散文、白話詩與白話戲劇，打破了以往澳門文壇古典詩詞一枝獨秀的局面；最後，作者特別強調了抗戰時期對澳門新文學發展的重要性，1938、1941年廣州和香港相繼淪陷，這一時期澳門新文學作品的數量卻隨之大幅增長，澳門文壇新舊文學的角逐在戰火的催促中也逐漸有了定論，隨着新生代本土作家的出現，澳門也在這一特殊時期完成了從舊體到新文學的全面轉型。陳子褒白話啟蒙讀本有如澳門文學在新舊交替轉換過程中的一個橫切面，確切且真實，與作者對於澳門新文學的縱向梳理結合起來，完成了一次縱橫交錯的澳門新文學研究。

南京大學霍超群博士關注到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這是近年來有關澳門文學研究本身較為細緻齊全的梳理，所關注到的研究成果也是新鮮的，是對一直以來澳門文學研究狀況的一次有力的回應。他以普遍認同的澳門文學研究起點（1983年）為澳門文學研究史作出了四個階段的斷代，並將與之對應的發展脈絡歸結為個人經驗式的回顧、建史的嘗試與專題研究的起步、專題化研究成為主流、史料學轉向與批評觀念的調整同步開展。作者將四個階段具體情況概況如下：首先是以《澳門文學論集》（1988）為代表的預備期（1983—1988）；而接下來，陶里《澳門小說發展概略》（1996）、廖子馨《澳門散文四十年歷程——從五十年代末走到今天》（1998）、李觀鼎的〈試談澳門文學批評的特色〉（1998）、鄭煒明〈澳門中文新詩史略〉（1999）、田本相及鄭煒明等人《澳門戲劇史稿》（1999）和鄭煒明的博士論文〈澳門文學發展歷程初探〉一同建構了澳門文學在各種文體方面的發展脈絡，體現了澳門本土學者明確的“建史意識”。他們與內地學者劉登翰、饒芃子、王劍叢、費勇、陳遼、王宗法互為補充，共同為澳門文學描繪了初步樣態，由此形成了澳門文學研究的奠基期（1989—2000）；進入拓展期（2001—2010），一方面，澳門文學研究出現了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2002）、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2003）、湯梅笑《澳門敘事——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小說的文化品格及敘事範式》（2004）、饒芃子及莫嘉麗等《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2008）、朱壽桐主編《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2010）等研究專著，他們分別在文學批評、小說、散文等新的研究專題上有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也非僅僅局限在文學內部。另一方面，郭濟修的碩士論文〈從飛歷奇小說看澳門土生葡人的文化特徵〉（2001）、汪春的博士論文〈論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2004）、余少君的碩士論文〈八〇年代以降澳門後現代詩研究：以葦鳴和懿靈詩為例〉（2008）以及陳少華對澳門文學中的“澳門性”的關注，雖然難掩其中的地域局限性，但也展現出這一時期澳門文學研究對既有專題的接續與深耕；進入夯實期（2011至今）的澳門文學研究最突出的就是對史料的重視，從呂志鵬《澳門

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2011）、王列耀和龍揚志《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2014）、王國強《澳門文學書目初編（1600—2014）》（2015），以及鄧駿捷對澳門第一首新詩、第一本新詩集以及第一個新詩作者群“雪社”的發現（2015），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2018）、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2018）、朱壽桐主持的《澳門文學編年史》（2019）、龍揚志《澳門文學期刊述要與目錄匯編》（2020），再結合歷時十年“澳門文學館叢書”的出版工程，不難發現其中“自覺的史料意識”和實證研究的突顯。^①不僅如此，作者還指出，澳門文學研究在史料建設的基礎上逐漸打開了澳門文學評價的格局，在嘗試構建文學評價體系的同時也在努力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架構中來。雖然澳門文學以“遲到者”的身份進入大眾視野，但這不應成為被學界忽視的藉口，反而應該“在兩岸四地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下……向歷史縱深處漫溯”。^②

三、澳門文學研究本土化圖景的構建

將 2021 年度多位學者針對書寫澳門、面向澳門的詩歌、散文、話劇等文體的研究集合起來，再結合該年度針對澳門土生文學的成果，不難發現澳門文學研究的本土化圖景在穩中有序中漸漸成形。澳門大學鄧駿捷教授以宏闊的研究視野梳理了自明代以來澳門詩詞的發展歷程，他主要將澳門詩詞創作分為三個階段，^③具體來看，第一階段是明代至清初，即“澳門詩詞的開創階段”。這一時期首先是湯顯祖對澳門的描寫，它開啟了澳門詩詞乃至澳門文學獨立自主的征程，如〈香壘逢賈胡〉對澳門的對外貿易、外商的描寫，以及〈聽香山譯者〉（二首）中對遠洋至東南亞航行、西方女性的描寫等詩作，具有起始的意義。明末清初的蒞澳土人也留下了一些有關澳門彼時情境的作品，如吳歷〈畧中雜詠〉寫澳門不同族群和澳門風光，具有特殊意義。而清初蒞澳的詩人則有兩大群體——明遺民、清廷舊官員，前者代表是屈大均，著有澳門詩十多首，其中〈澳門〉（六首）最為著名，他的詩中多有將對故國的哀思寄託於澳門風物的描寫中。後者以劉世重為代表，他的詩作〈澳門〉為後來的澳門詩創作奠定了風格基礎，而詩句“思傳六籍將夷變，令識中華禮教尊”中的“用夏變夷”也體現出作為本土人士對中華文化的自信；第二階段是清乾隆至道光，即“澳門詩詞的共生階段”，據介紹，這一階段重要的背景是澳門成為廣州府直轄的特殊地區，兩任澳門同知印光任和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是當時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澳門史志，標誌着澳門文學及文化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其中，印光任的“濠鏡十景”、張汝霖共有六題 22 篇描寫澳門的詩作，豐富了澳門詩的創作體量。這一階段的蒞澳詩人中商人群體因社交層面的差異，其作品所關注的對象與士人、官員大為不同，拓展了澳門詩的文學形象，

^① 霍超群：〈澳門文學研究史略（1983—2020）〉，《華文文學》（汕頭），第 1 期（2022），頁 94。

^② 霍超群：〈澳門文學研究史略（1983—2020）〉，《華文文學》（汕頭），第 1 期（2022），頁 95。

^③ 鄧駿捷：〈明清澳門詩詞論略〉，《文學研究》（南京），第 2 期（2021），頁 133—144。

應當加以關注。這一時期還逐漸形成了對澳門固定地景反覆描寫的風氣，媽閣廟、青洲島、三巴寺等地點頻繁進入詩中，如媽閣山石上就可以看到 24 首石刻詩。與此同時，澳門詞雖然進程緩慢，但也在同步發展，例如黃呈蘭的〈青玉案·澳門〉、鮑俊的〈行香子·澳門〉都可謂是箇中佳作。同時還有本土詩人湧現，以望廈趙氏族人為代表。從趙同義〈冬日蘆石塘晚眺〉和〈臘日登海覺寺〉、趙元儒〈次張太守石壁原韻〉、趙元輅文集《自警日記》及《觀我集》、趙允菁〈重修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碑記〉、〈重修媽祖閣碑記〉及《書澤堂文稿》等清晰可見，澳門本土文學的創作並非單純的“植入”；第三階段是道光至清末，即“澳門詩詞的激蕩階段”。作者指出，由於清廷軟弱，澳門被葡萄牙侵佔，人民憤恨，於是出現了以劉燾芬〈沈義士歌〉為代表的面向現實的詩歌創作，如鄭觀應〈澳門感事〉、潘飛聲〈澳門雜詩〉（其五）、丘逢甲〈哭沈烈士〉等，開啟了澳門詩詞直面社會現實，情感迸發的階段。創作形式上，逐漸形成了“澳門雜詩（詠）”組詩獨特的手法，前後有屈大均〈澳門〉六首、張汝霖〈澳門寓樓即事〉十四首、陳官〈澳門竹枝詞〉四首、鍾啟韶〈澳門雜詩十二首〉、潘飛聲〈澳門雜詩〉（十二首）、丘逢甲的《澳門雜詩》（十五首）等，是澳門詩詞創作中不可忽視的現象。澳門本土詩人創作也在這一階段有所發展，鄭觀應〈題澳門新居〉、〈澳門感事〉等，與蒞澳詩人共同構築了澳門豐富多元的文學形象。鄧駿捷教授歷時性地概括了明清時期以澳門為書寫內容的詩詞作品，打破了以往僅瞄準中國文學史為參照而作生硬地劃分——明萬曆至清中葉、清中葉至辛亥革命（1911）、民國時期（1912—1949）——的情況，其立足於澳門文學尤其是詩詞發展現狀的基礎上重新考量得出了三段式的劃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一向以詩詞創作見長的澳門，在新詩創作方面也有所拓展，尤其在回歸後，以開放包容的胸懷和立足本土的視角逐漸孕育出具有澳門特色的獨特風格。但是新舊詩體並駕齊驅的發展模式似乎沒有為澳門新詩得到特別的關注提供便利，因此在澳門，新詩創作或許需要通過借助各類介質完成對孤獨感的消解，例如求助網絡媒介、形成創作團體等。而核心成員為粵澳詩人的七劍詩群之創作《七劍詩選》，可謂“灣區乃至更廣闊區域內文學合作交流的成果和典範，也為澳門文學，尤其是澳門新詩創作的發展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模式”。^①七劍乃七位詩人的合稱，分別為龔剛、楊衛東、李磊、羅國勝、張小平、薛武、朱坤領，其中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澳門大學龔剛教授與廣州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李磊院長聯合主編了這部《七劍詩選》。雖然七劍並非一個在地性很強的詩人群體，但其核心成員以粵澳詩人為主，《七劍詩選》的結集出版又落地廣州，所以被認為“是灣區文學合作交流的縮影，也是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新的文學創作、交流和傳播模式的突出代表”。^②七位詩人的居住地主要分佈在澳門、廣州等五座城市，相識於網絡的他們平時

^①馮傾城、王如利：〈“灣區典範”的締造與澳門文學的發展創新——以《七劍詩選》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 1 期（2021），頁 60。

^②馮傾城、王如利：〈“灣區典範”的締造與澳門文學的發展創新——以《七劍詩選》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第 1 期（2021），頁 61—62。

也主要通過網絡進行詩歌的交流。七劍的詩歌雖各有風格，但也有共同追尋的創作理想，開啟了信息時代跨媒介、跨地域的新詩群體創作範式。我們可以從這首花劍的〈七劍的一天〉感受到七劍筆下尋常意象中悠遠厚重的彼此情感：

剛降落，一場霧霾等着我
幸好心裏流淌着，柔劍的伊河
霜劍和問劍，據說躲在山中
現在也不知幹了甚麼
斷劍的上海，華燈初照
遠遠望去，一條流不動的河
論劍在香港逛逛，滿臉幸福
陪伴的，是霜劍的最美麗師母
沒想到靈劍也在飛機上
去紐約，明天
在美利堅，給美女們講七劍
向山姆叔描繪詩意的中國
而我還在去虹口的路上
不憂傷，也不快樂
七劍兄弟，在三大洲縱橫
天空遼闊。靈劍在美洲講哲理
論劍在購物陪老婆
柔劍在康河授課，霜劍在銀行
問劍幫女人洗碗
斷劍在談生意，打乒乓球
唯有我花劍，在漫漫車流中
等待，肚子還餓
七劍就是幾個奇怪的傢伙
見面很少，也許在人群中
還互不相識，擦肩而過
卻像哲人一樣思考
又像凡人一樣生活^①

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楊克曾在《七劍詩選》序言中表示，現代互聯網技術為詩歌帶來了更加便捷、更加多元化的通訊交流機會，也為從古遠時代一路走來的詩歌文體帶來了新的

^① 〈七劍的一天〉，新性靈主義詩城網，<http://www.xinxingling.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0&id=67>。

生機，“七劍的創作也是當代漢語寫作者的一個縮影，新詩承擔了以百年光陰實現三千年古典詩歌傳統涅槃重生的艱巨任務，沒有也不可能與傳統遺產割裂，在繼承中改造、在批古中復古，實際上延續着自春秋以來時移世易、波浪式向前發展而未曾中斷的漢語詩歌發展史”。^①

對於澳門散文創作方面的關注，既有從微觀角度進行作家作品分析的細緻觀察，又有將澳門散文放置於粵港澳大灣區進行整體觀照的宏觀論述。中山大學楊丹丹教授的〈文學史視野、在地意識和文化共同體——《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讀本·散文卷》序言（二）〉雖然不是針對澳門一地散文的有限批評視角，但是對於身處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框架中的澳門文學乃至散文創作，都賦予了時代新意。一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讀本·散文卷》的出現，讓大灣區的散文創作共同承載“回望歷史”和“凝視當下”的雙重責任。文中作者對澳門散文歷史發展進行剪影式的回顧——發軔於明代中期；在20世紀30年代隨着內地文人南下進入高速發展，湧現了一批散文家，形成了“直面人生，直面現實，直面社會，讀來有一種清新、濃郁的生活氣息”的書寫特徵，面對澳門獨特的地理空間，以散文這種形式承托“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情懷，是這一時期散文創作的普遍傾向；21世紀的澳門散文發展步入新的階段，出現了凌稜、林中英、沈尚青、夢子、穆欣欣、胡悅、丁璐、玉文、水月、谷雨、凌之等一批女性散文作家，她們的“文字不獵奇，不濫情，不炫博，也不故作高深激烈狀，無論是一顰一笑，都出自女性溫婉柔和自然秉性，感情飽滿，筆觸機巧，文字溫婉，文風秀雅，有着典麗恬淡，親切溫馨的韻致，給人一種素面勻淨、骨肉亭勻之感，女性氣質充溢其間”。^②此外，《澳門日報》的“鏡海”、“新園地”副刊為澳門文壇新秀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培養了一批以校園散文創作方式出現的學生作者，設立了“東亞校園”、“瓊林燕語”等專欄。對於這部散文集，作者從個體與城市之間建立內在的生命聯繫和精神體驗、自然生態書寫中的哲思與美學特質等方面進行評價，進入其中的澳門代表作品有林中英的〈一底年糕〉和穆欣欣的〈豆撈誤讀〉均表現了本土作者對澳門城市尋常生活徵得大眾再認識的一種追逐。此外，作者對粵港澳大灣區散文整體情況的評價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她認為，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概念，“粵港澳大灣區散文”未來會有一定的生長空間，但我們也應當正視這一較新的概念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不足，主要表現在“現階段仍然存在概念內涵與寫作實踐之間的不契合、形成地區散文流派的條件不充分、作家代際分佈不均衡、文化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意識不突出、地方知識挖掘不透徹等”的問題上，^③為包括澳門散文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散文發展指明了方向。有學者則將研究視點落在了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的散文創作之上，作為內地南來澳門的作家，龔剛的跨界身份不僅局限在地域上，學者型的作家身份豐富了他的創作體裁，作詩與撰寫散文、論

^① 〈都市喧囂之上升起的性靈之月〉，《爾雅國學報》（東營），2020年2月6日。

^② 姜建：〈澳門散文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徐州），第3期（2001），頁97。

^③ 楊丹丹：〈文學史視野、在地意識和文化共同體——《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讀本·散文卷》序言（二）〉，《粵海風》（廣州），第6期（2021），頁19。

文並行不悖，完美詮釋了“他的文學世界構築在複雜的身份之上”。^①作者李昂在〈哲性與鄉愁——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散文創作的藝術境界〉一文中將龔剛的散文總結為學人隨筆、懷鄉隨感和澳門書寫三種主要題材，尤其是他對於澳門的書寫展現出了新移民作家視野中的澳門特殊性。雖然這一主題在龔剛的散文作品中並沒有佔據太多的比例，但卻是外界觀察澳門文學生態中獨特性的窗口。作者認為，龔剛的澳門書寫有自身的獨特表達方式，一是“溫潤和煦、閒適自如的文風”，二是對澳門景致的“情感遷移”。^②前者比較容易理解，後者則源於龔剛的跨域經歷和雙重身份的認同，眼前的澳門景物難免投射出作家過往的經歷，一同流動在文字中，正如其代表作〈澳門的夜〉中由眼前的黑沙灘聯想到故鄉的西湖，懷鄉的情結自如地凝聚在靈動的語言上，形成了有別本土作家對澳門書寫的別樣視角，這也豐富了澳門散文的書寫體驗，體現了澳門文學的多樣生態：

在澳門生活多年，早已走遍了這個小城的山水、街巷，大炮台的滄桑，石子路的諧趣，葡人舊居的落寞，皆能引發我別樣的興味，但最能令我從塵世的煩囂中超脫出來而盡一時悠遊之樂的則是黑沙灘……當初聽說好友要來澳門，我心裏就想，大三巴這種熱鬧地段不去也就罷了，葡京賭場這種銷金之地不去也就罷了，馬介休鹹魚這種所謂異國風味不嘗也就罷了，但是黑沙灘可一定要帶他去轉轉……蘇東坡昔年賦詩感懷他在杭州作刺史的風光，說是“一半勾留是此湖”，此湖非他湖，正是豔名堪比西子的西湖……蘇東坡心中的西湖，蘇舜欽心中的滄浪亭，也正是我心中的黑沙灘了……^③

劇作研究方面，江蘇開放大學學者江萌聚焦當代澳門社會劇創作，認為當代澳門社會劇有所關注的特殊主題，但也有自身難以逾越的局限。首先從李宇樑〈怒民〉（1983）、〈逆旅〉（1987）、〈冥中行〉（1988）、鄭繼生〈來客〉（1984）、盧耀華〈斷鳶〉（1989）、李盤志〈神奇女俠也移民〉（1993）、陳雪瑩〈暗處〉（1996）、鄭桂卿的〈鏡海情〉（1996）、周和根的獨幕劇〈把根留住〉（2007）等作品可以看出，當代澳門社會很重要的主題是體現偷渡和移民問題的，充分顯示出澳門劇作家對本地社會的現實思考；其次，作者認為李宇樑的八場劇〈澳門製造〉（*Made in Macao*）（1986）開啟了澳門話劇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和對本土性的追尋，隨後余潤霖〈斷雲依水〉（1996）、李宇樑〈澳門特產〉（1996）、鄭繼生〈鏡海濠情〉（1996）、青苗劇社〈從前有班細路仔〉（1994）、王智豪〈江記士多〉（2005）、曉角劇社〈聚龍通津〉（2010）等都是遵循這一路徑，抒發對澳門的“在地”情感，篤定而且深沉，不似香港話劇對認同的焦慮與迷惘。但作者也指出，澳門當代

^①李昂：〈哲性與鄉愁——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散文創作的藝術境界〉，《藝術廣角》（瀋陽），第3期（2021），頁99。

^②李昂：〈哲性與鄉愁——澳門新移民作家龔剛散文創作的藝術境界〉，《藝術廣角》（瀋陽），第3期（2021），頁104—106。

^③龔剛：〈澳門的夜〉，閻純德編：《我心中的澳門》，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97。

劇作只能面對“銀紙味”蓋過“人情味”、治安惡化、教育體制等社會具體問題進行反思和批判，基本只能做“在力所能及的空間善盡職責”，而“對政治及社會根本問題抱着迴避態度”，^①對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或者諸如“族群衝突、黑幫仇殺、賭場黑幕、政治賄選”等重要問題，則表現出無能為力之感，有失社會劇本來的責任感。這一觀點鮮明而犀利地指出了當代澳門社會劇創作的現狀和局限，為澳門劇作的發展指出了方向。同時，江萌還在文章〈透過人情和人性揭示社會人生意蘊——當代澳門話劇創作思潮研究〉中詳細論述了澳門話劇對“人”的關注，^②並從四個方面介紹了澳門話劇如何對人性、人情展開自己的理解：一是通過對許國權的獨幕劇〈我係阿媽〉（1992）、李宇樑〈亞當 & 夏娃的意外〉（1993）、獨幕劇〈二月廿九〉（1993）、陳柏添的獨幕劇〈媽媽離家了〉（1995）、李宇樑的獨幕劇〈請於訊號後留下口訊〉（1997）、王智豪的六場劇〈婆婆離家去〉（1997）、李宇樑的20場劇〈紅顏未老〉（2006）和石頭公社的無場次劇〈在雨和霧之間〉（2010）等幾部劇的介紹，總結了澳門話劇對現代社會中親情、家庭倫理關係的思考；二是通過介紹李宇樑的四場劇〈男兒當自強〉（1992）、周樹利的獨幕劇〈此情可待成追憶〉（1993）、許國權的五場劇〈空白的信紙〉（1994）、莫兆忠的獨幕劇〈那一年的聖誕〉（1998）、李宇樑的多場次劇〈捕風中年〉（1998）、梁淑琪的八場劇〈連理樹〉（1996）、李宇樑的兩幕劇〈海角紅樓〉（2007）、多場次劇〈天琴傳說〉（2009）概括了澳門話劇如何通過愛情主題折射人性和人情；三是通過介紹周樹利的獨幕劇〈我的女兒〉（1976）、獨幕劇〈愛的音訊〉（1983）、李宇樑的五場劇〈等靈〉（1985）、許國權的六場劇〈九個半夢之後〉（1989）、周樹利的獨幕劇〈錶的故事〉（1990）、譚淑霞的四場劇〈灰姑娘之非常結局篇〉（1995）、莫兆忠兩幕劇〈星星男孩〉（1996）、周樹利的獨幕劇〈兩小無猜〉（1996）、李宇樑的多場次劇〈滅諦〉（2008）等劇作，將視野從家庭內部擴大到社會層面，以此觀照澳門話劇對人、人性、人情的解讀；面對過往學界對澳門話劇不同程度的誤讀，作者提出了獨到的看法，認為無論從創作主旨、戲劇審美還是劇作形式的層面來看，澳門話劇都存在鮮明的特殊性——精簡的篇幅之下慣以細節之處折射人情的光芒，於此表達對人性的洞悉。這一點，更新了以往學界對澳門話劇的認知，有助於更加客觀地瞭解澳門話劇的創作與發展。

南開大學學者胡婧關注到澳門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審美選擇問題，在參考了安娜·瑪麗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的《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Filhos da Terra*），萊薩（Almerindo Lessa）的博士論文〈澳門的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Anthropologie et Anthroposociologie de Macao”）和專著《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歷史及人類群體，澳門——一個公民島嶼的生物學及社會學特徵》（*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等研

^①江萌：〈當代澳門社會劇創作研究〉，《文學研究》（南京），第1期（2021），頁217—218。

^②江萌、胡星亮：〈透過人情和人性揭示社會人生意蘊——當代澳門話劇創作思潮研究〉，《中國文藝評論》（北京），第4期（2021），頁62—71。

究成果的基礎上，縱向簡析了 16—18 世紀直至澳門回歸前土生葡人族群大致的形成情況，剖析了同時擁有東西方血統的土生葡人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理，以及在文化身份認同方面的尷尬處境。由這個群體在澳門創作的文學作品，在 20 世紀前大多使用土生葡語——帕圖亞語（*Patuá*，受漢語影響，混合葡語、英語、粵語、西班牙語和馬來語），20 世紀 40 年代後多以現代葡語進行創作，因此這類作品既不能被籠統地認為是澳門的葡語文學作品，又不能簡單將其歸屬到葡萄牙文學的範疇，強烈的“在地感”和文化的多元性本身就是澳門文學的直接表達，因此作者認為“土生文學不僅是澳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澳門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①在澳門獨特的文學景觀中，土生文學的研究價值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以跨界親歷者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觀照文化衝突、文化交融的表現和發展過程；二是在這些作品中生動地呈現了澳門彼時真實的風貌，具有一定的歷史參考意義。作者提出，澳門土生文學大致有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時期是初步形成時期，從 17 到 19 世紀，創作語言為帕圖亞語，主要是土生歌謠和土生詩作，見刊於《大西洋國》（*Ta-Ssi-Yang-Kuo*）、《復興雜誌》（*Renascimento*）等；^②第二個時期是土生文學的繁榮時期，始於 20 世紀 40 年代，各題材不乏上乘之作，如詩歌方面有李安樂（*Leonel Alves*）的詩集《孤獨之路》；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即阿德 *Adé*）的詩集《澳門本如斯》、《澳門詩歌》、《澳門，受祝福的花園》；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的詩集《一日中的四季》等。小說方面有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的短篇小說集《長衫》、《旗袍》；雅伊梅·多·英索（*Jaime do Inso*）的《東方之路》、《中國觀察》、《中國》；瑪麗亞·布拉嘉（*Maria Ondina Braga*）的《神州在望》、《北京的苦悶》、《澳門夜曲》、《中式晚餐》；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的小說《瑪麗亞與歐美勒·若翰的故事》以及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大辮子的誘惑》、短篇小說集《南灣》等。散文方面有愛蒂斯·喬治·德·馬天妮（*Edith Jorge de Martini*）的散文〈廢墟中的風——我在澳門的童年〉；戲劇方面有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的劇本〈見總統〉、〈畢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由此可見，澳門土生文學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是澳門文學多元生態的一個側面，駁雜的創作語言背景下映射出土生葡人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但也能從飛文基的劇本〈見總統〉、阿德的詩〈未來〉、李安樂的詩〈知道我是誰〉、飛歷奇的《大辮子的誘惑》中逐漸明晰了一條認同線索——從二元對立中建立“在地”的認同，一種對澳門的認同。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

^①胡婧：〈澳門土生文學中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審美選擇〉，《華文文學》（汕頭），第 4 期（2021），頁 51。

^②胡婧在文中提到在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末這段時間內，這類作品主要發表在上述兩個刊物中，但筆者查閱到《復興雜誌》在澳門的創刊時間為 1943 年 1 月，因看不到原刊物，故暫推斷原文表述有誤。詳細參見：https://macaumemory.mo/entries_0d63aabd8bb14fdd9138c11d1d2b6737。

澳門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國家認同的建構

劉子源

[摘要] 結合政治社會化理論，以澳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編的澳門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2018年修訂版）的內容分析為基礎，可從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國家文化和國家制度四個方面概括教科書對學生國家認同的建構。此外，教科書在內容上應走出一條注重獨特性、開放性和針對性的澳門特色之路，並力圖適應不同背景學校的教學現實，從而更好地達至建構國家認同的預期效果。

[關鍵詞] 品德與公民 教科書 國家認同 澳門

一、研究背景與理論架構

澳門長期奉行多元自由的教科書制度，公民教育的教科書往往是由各學校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內地、香港、台灣等地區的版本，並結合學校自編材料進行補充組成。^①在2006年頒佈了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後，澳門特區政府開始制定對非高等教育階段各學科的基本學力要求，而品德與公民教育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2008年9月，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21年已改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發佈了《澳門初中品德與教育基本學力要求（諮詢意見稿）》。第15/2014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明確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都必須開設品德與公民課程。2017年第56/2017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正式發佈《訂定初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八“初中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作為品德與公民課程的最重要的指向和綱領性文件，《基本學力要求》為特定教育階段的品德與公民課程設定相應標準，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和學習範疇的具體內容。圍繞國家認同，《基本學力要求》在基本理念中就提到要讓學生“關心澳門、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學習做負責任的公民”，在課程目標中則表述為“增進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培養他們愛國愛澳的情懷”。而在學習範疇C“社會參與”中單列一部分——“公民生活與國家認同”，規定初中學生須達到如下具體要求：（1）能瞭解澳門政治制度的特點，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和意義；（2）能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作者簡介：劉子源，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①黃素君、黃樂源、謝均才：〈公民身份與意識初探：澳門小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分析〉，《教育學報》（香港），第46卷第2期（2018），頁69—70。

基本法》的內容、意義和作用；（3）能理解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4）能認識中國的政治體制；（5）能基本瞭解和體會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取得的主要成就及遇到的困難；（6）能認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影響和作用；（7）能瞭解澳門和中國內地相互依存的關係。同時，在“民族認同與多元共生”部分還要求“能瞭解中華民族具有相容並包的文化特色”；“能瞭解所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風俗，並能夠認同所屬民族的優良傳統及成就”。^①

從上述內容可見，在《基本學力要求》所列明的與國家認同直接相關的內容的學習要求，有“認識”、“基本瞭解”、“瞭解”和“理解”多種要求，措辭的變化表明《基本學力要求》對國家認同中學習要求的設計有一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遞進設計。

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品德與公民教材的建設，2008年發佈《澳門初中品德與教育基本學力要求（諮詢意見稿）》的時候已開始進行教材編寫工作，2009年8月，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開發的《品德與公民》教科書試行版出版，供澳門學校選用。這一版本的教科書集合了內地和澳門的資源和意見，尤其注重吸納來自澳門本地不同類型學校、教師的意見。在2018/2019學年，新修訂的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已可供學校使用，^②這足以體現澳門對於《品德與公民》學科發展的重視。

至於國家認同的概念，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將政治社會化定義為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③而政治文化被認為是一種在一個民族的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④本文所關注的國家認同問題在其中歸屬於以政治合法性為內容的體系文化範圍之內。在他們看來，國家認同問題就是對由許多個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的支持問題，^⑤而個人對政治對象的態度則分為認識的、感情的和評價的三個部分組成。其中，“認識的”是指個人對政治對象的瞭解，是一種客觀的知識存在；“感情的”是主觀地受自己或他人影響所形成的一種好惡感受；“評價的”則是在前兩個部分基礎之上所形成的一套有關政治對象的衡量標準。^⑥

基於這個“認識—感情—評價”框架，本文主要採用文本分析法，以澳門初中人教版《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內容為研究對象，歸納整理其中有關國家認同的內容並加以分類，挖掘教科書內容所呈現的國家認同建構模式，進而就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進行討論。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56/2017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訂定初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八“初中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②本文的分析以此版本為基礎：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著：《澳門教材·品德與公民（初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

^③（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91。

^④（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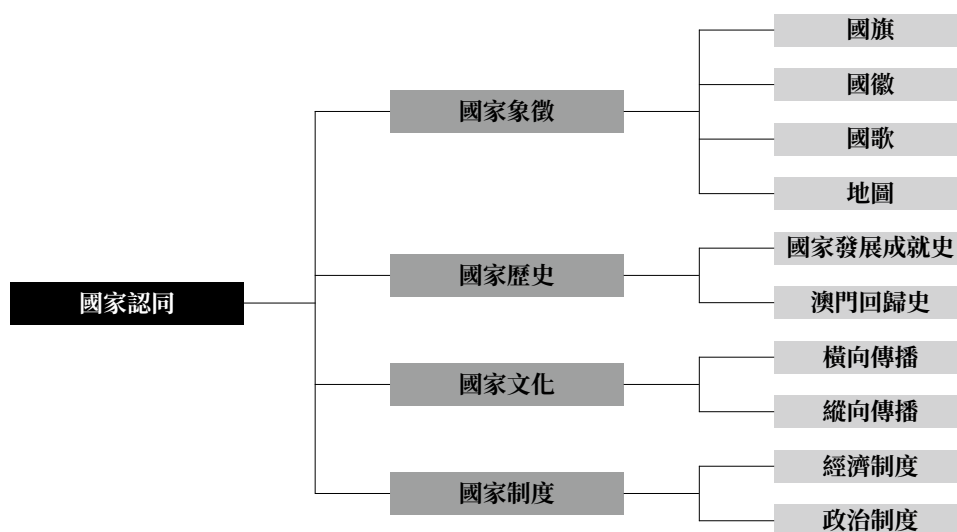
^⑤（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38。

^⑥（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30。

二、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認同內容的呈現

澳門初中人教版《品德與公民》教科書按年級劃分為三冊，每冊設置均有由三課組成的九個單元及一個用以課外延伸拓展的專題研習部分。本文採用文本分析法，將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在國家認同建構的情況總結歸納為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國家文化、國家制度四個部分（圖1）。

圖1 《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建構示意圖



（一）國家象徵：抽象到具象的轉化

“國家是不可見的，它必須人格化方可見到，必須象徵化方能受到熱愛，必須被想像才能為人們所接受”。^①作為眾多承載着有關國家的權力的媒介之一，國家象徵無疑是最直觀、最具象為人們所熟知的。總的來看，在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象徵的內容在初中每一個年級中皆有分佈，但還是主要集中在初一年級，具體包括國旗、國歌、國徽和地圖（表1）。

表1 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象徵的情況

國家象徵	位置	所屬欄目類型	內容
國旗	G1-U2-L5-P27	動手做一做	校園活動舞台背景
國旗	G1-U4-L11-P59	插圖	立法會工作場景
國旗	G1-U4-L12-P63	插圖	居民在賽場為中國隊加油
國旗	G1-U7-L19-P101	腦力探索	澳門回歸儀式現場
國旗 + 國歌 + 國徽	G1-U8-L22-P116	正文 + 腦力探索	國旗、國歌、國徽介紹
地圖	G1-U8-L23-P121	插圖	中國的世界遺產分佈

^①馬敏：《政治象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頁113。

地圖	G1-U8-L24-P125	腦力探索	中國的民族分佈
國歌	G1-U8-P128	思考與行動	探究國歌的歷史與意義的單元課外活動
國旗	G1-U9-L25-P134	動手做一做	各國人的文化特徵
國旗 + 國徽	G2-U4-L10-P54	插圖	特區政府總部大樓
國徽	G2-U8-L22-P119	腦力探索	全國人大工作場景
地圖	G2-U8-L24-P125	腦力探索	中國沿海開放地區
國旗 + 國徽	G3-U4-L11-P57	腦力探索	政府總部、立法會大樓
國旗	G3-U6-L17-P90	插圖	中國位列 2016 年可再生能源生產國榜首

註：“G1-U2-L5-P27”代表1年級第2單元第5課第27頁，如此類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品德與公民》教科書整理。

由於國家象徵的基礎性和直觀性的特點，認識國家象徵的任務早已在比初中更早的教育階段完成。小學《基本學力要求》中就將“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理解其基本含義，會唱國歌”放在“我與國家”學習範疇中的第一條列明。^①到了更高階段的初中，國家象徵更多地被放在了輔助文系統之中。

聯繫“認識—感情—評價”的框架來看，國家象徵在教科書中突出的是有關權威的想像、邊界的意識和二者之上產生的感情對評價的引導。^②國家象徵將國家所擁有的抽象的主權、領土加以轉化成了具象的畫面認知，尤其是澳門記憶與日常中的國家象徵的出現，不斷地鞏固學生有關澳門與國家的歸屬關係的認識。當與他國並列或描述全國的有關資料時，區別於他者的邊界透過國家象徵直截了當地為學生感情所接受。權威的樹立、邊界的明確，自然也就將澳門學生有關中國、中國人的情感引導至同一處，形成對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實踐的積極評價。

（二）國家歷史：特定歷史觀的形塑

歷史是有關記憶的集合，“是諸多個體記憶在社會佔主導意識形態和文化規範的作用下被合力統攝作用的結果”。^③歷史是不停地被書寫的，這其中既有事實的記錄，又有解讀和立場的發揮。

不同於歷史學科的專門教科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的歷史內容表現出了更強的指向性，筆者將這種指向性歸結為主體位置轉換的原因。在歷史學科的教科書中，歷史內容是主體，基於訓練學生瞭解、掌握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歷史知識的能力的需要，其他的素材皆圍繞這個需要服務。而《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的歷史內容作為公民教育所涉及的眾多專業領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核准小學教育階段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附件八“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②（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30。

^③吳玉軍、顧豪邁：〈國家認同建構中的歷史記憶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北京），第3期（2018），頁70。

域素材的一部分存在，發揮的是一種輔助工具性的作用，從而表現了更強的指向性。

圍繞國家認同，焦點自然首先放在有關國家的建立與發展歷史上。教科書對於國家的建立與發展的內容呈現可以被劃分為三個時間段，其劃分事件節點分別是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改革開放。

從形式上說，歷史內容沿着時間鋪開，以時間為脈絡的時間軸、樹狀圖、階梯圖因可以直觀清晰地交代資料而備受教科書推崇。這從每一年級的教科書都將唯一的、用一張圖佔據兩個頁面的“特殊待遇”給了有關國家歷史內容的設置便可以看出。在初中一年級的教科書中，佔據兩個頁面的時間軸上展示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31—1945年抗日戰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五個時間節點，在時間軸下方對應了孫中山、李大釗、毛澤東的人物介紹及抗日戰爭的簡介。在時間軸的兩旁，“資訊站”欄目介紹了五四青年節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有關資料，為時間軸的內容進行了必要的拓展補充。在初中二年級的教科書中，佔據兩個頁面的階梯圖細數了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29年間的經濟發展進程。除了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其中列舉的都是國家經濟發展中重要節點和當年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如三大改造、“一五計劃”、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等。在初中三年級的教科書中，佔據兩個頁面的由許多箭頭構成的樹狀圖上用序號依時間順序標註了20個發生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大事件，包括經濟特區的設立、港澳回歸、鄧小平南方視察、農業稅全面取消、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G20杭州峰會、高鐵運營里程、中共十九大等。

從內容上看，有關國家的建立與發展的歷史在教科書中主要被用於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改革開放之於國家的重要意義。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分界點，教科書對上至推翻清王朝統治的辛亥革命的這段歷史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過程、代表人物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扮演的領導角色進行了集中介紹，強調了其在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地位的歷史依據。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階段，教科書將焦點對準了以改革開放為轉捩點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教科書以甚麼是改革開放、為甚麼要實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如何鋪開的這三個基本問題進行了詳細敘述，大量的歷史材料展現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斷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路徑並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形象。

除此之外，澳門歷史中與國家相聯繫的部分也理應歸入教科書在國家歷史部分。教科書在初中三年級用第七單元對澳門這塊中國領土由被佔據到回歸的全過程進行了再現，這可以被視為是教科書在初中階段三冊中少見的以歷史內容為主的單元。該單元着重談及澳門被佔據的過程及回歸過渡期面臨的問題。從有關澳門被葡萄牙殖民者佔據的歷史片段內容看，雖然教科書作出了“中葡之間的糾葛歷史綿延數百年，其中既有血淚與衝突，也有扶助與合作”（G3-U7-L19-P103）的表述，但是從亞馬喇事件、中葡涉澳條約內容到“一二·三”事件的選材都似乎看不見有關“扶助與合作”的影子。葡萄牙殖民者的霸道貪婪、澳門民眾的堅強抗爭、中央政權的堅守支持，構成了教科書對澳門被佔據過程還原的基本構造。

同時在有關條約的內容部分還多次強調了中國對澳門喪失治權而非主權的歷史事實，為澳門回歸的歷史正當性提供基礎。而在回歸過渡期的部分，中葡雙方的共同合作成為了教科書的主基調，具體表現在為應對“三大問題”（中文官方化、法律本土化、公務員本地化）以及治安經濟發展問題的逐步解決，從而實現平穩過渡的過程的描述，尤其是其中引用的一些統計資料使得這一合作成效更為突顯。

因此，筆者對教科書在國家歷史部分進行一個總結。教科書在這一部分選取的國家維度是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其主線為發展成就；而選取的澳門維度則是從被佔據到回歸的歷史，主線為對立抗爭。學生從教科書由二者組成的國家歷史部分裏可得到這樣的評價：那就是國家的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也是澳門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澳門長久以來的抗爭，也正是國家近代以來為了獨立自由對外抗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教科書通過歷史內容傳遞出來的是一種看待國家和澳門發展的特定歷史觀。在這一特定歷史觀指導下審視國家和澳門歷史形成的實踐，其中隱含着國家自豪感和歸屬感。

（三）國家文化：橫向與縱向的交錯

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認為文化是一個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①“文化中國”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所收穫的認同往往要遠高於“政治中國”。^②在這一現實下，教科書在國家文化方面的內容上無需過多考慮因境內外地理社會環境差異造成的理解障礙，代表性、典型性成了這一部分的重要選材標準。

以文化傳播的模式來分類，筆者將教科書在國家文化方面的內容分為橫向傳播與縱向傳播。橫向傳播指文化在空間維度上的傳播，而縱向傳播則指文化在時間維度上的傳播。在橫向傳播中，文化在中外之間的交流是主要的表現。這種交流既包括外國文化的“引進來”，又包括中國文化的“走出去”，兩者貫穿於文化交流的全過程。教科書中對於中外文化交流主要圍繞着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展開，其中包括了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背景、古絲綢之路的回顧、“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內涵與發展、澳門在中外交流中的角色、傳統文化的復興輸出。筆者從教科書內中國文化的橫向傳播內容中提取出幾個信息。

第一，中國是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中的重要成員。教科書在有關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內容中引用了中國少數民族服飾、中國古村落建築、粵劇、花木蘭等文化符號，在與其他國家文化符號的並列中突顯了存在。第二，中國文化具有和平與包容的特徵。教科書在以古絲綢之路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歷史的回顧中提到了互通有無的貿易促進科學技術、宗教的傳入與本地化，中外雙方在這一過程中得以收穫進步的積極一面，這些史實都為一個和平

^① Tylor, Edward B. *Primitive Culture*. Dover Publications, 2016, pp. 37-38.

^② 郭曉明：〈教材中的身份認同——以澳門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為例〉，石鷗主編：《教科書評論 2014》，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34—153。

與包容的中國文化提供了例證。第三，中國是當今世界推動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引領者與建設者。教科書通過細數“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過程，指明了中國是這一倡議發起者的地位，並且列舉包括蒙內鐵路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等“一帶一路”倡議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說明了這一倡議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理念，突出了中國在其中發揮的重要建設作用。第四，澳門曾受益於歷史中外交流並將在未來的發展中大有可為。從對16世紀開始的、由葡萄牙人推動的澳門充當中外交流中轉站的歷史回望，到聯繫今天國家賦予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定位，教科書對兩個時期的澳門進行了對比。第五，中國文化的復興輸出應是更有策略性的主動作為。教科書總結了“從文化迷茫走向文化自覺，從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強”（G3-U8-L24-P125）的復興方向，強調文化輸出之於公平話語權和文化之間相互理解的戰略意義，這些都為策略性主動作為提供指引與動機。

而縱向傳播，主要表現為代際間的傳承。世界遺產、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是教科書在文化縱向傳播的關注重點。世界遺產和民族文化是文化多樣性的展現。教科書運用大量圖片直觀地讓根植於中國各地不同土壤的文化特色躍然紙上，從自然風光到服飾、建築、戲曲、舞蹈、文字、飲食，歷經歲月洗禮卻仍具有勃勃生機。在多民族文化部分，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內容更是對這一歸因的體現。教科書將由個人修養、人倫關係與社會責任這三個主要方面組成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奉為“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歷盡磨難而信念愈堅，鬥志更強”（G3-U8-L23-P120）的原因，並引導學生思考、接受淘汰傳統價值觀中不適應時代需求的部分，將不影響其中優良部分的堅守。

教科書在有關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等為人所熟知的內容設置上遵循了常規的模式，滿足了對“文化中國”代表性、典型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之上，強調文化輸出的戰略意義將國家文化的討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學生在這種國家文化競爭的現實面前，自然地確認了文化自覺和文化歸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教科書在這一部分積極嘗試將文化與政治融合起來，如“一帶一路”倡議這一時政熱點的頻繁引用，將中國文化的傳承與中外文化的交流具體化的同時，也促進學生形成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的大國形象。

因此，教科書在國家文化部分嘗試打破所謂“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清晰界線。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對“文化中國”認識的強化，將對“文化中國”的正面情感導引至“政治中國”，從而轉化為對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全面和整體的評價。

（四）國家制度：重經濟、輕政治

國家制度是一個國家運轉的系統軌道，任何國家或社會的制度都是自成體系的。^①教科書構建國家認同，自然離不開國家制度的內容。概括來說，教科書有關國家制度內容包

^①趙宇峰、林尚立：〈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中國的邏輯〉，《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5期（2015），頁10。

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央國家機關架構職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改革開放、“一國兩制”。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央國家機關架構職能是中國國家運轉的基本常識。教科書在初中一、二年級第八單元中用〈多民族的國家〉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兩課集中進行了介紹，足見其知識密度之高，容不得其餘更多的拓展。而在有限的空間中，教科書對於中央國家機關架構與職能，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仍作出了相對較為詳細的說明。在中央國家機關架構與職能中，提及了各機關主要人員的產生方式、負責機關、職權範圍。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從舉行日期到選舉流程再到代表構成，文字、示意圖、照片等多形式結合和運用體現了教科書對於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內容的重視。與之相對比的莫過於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內容，教科書僅用一句“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由居民（村民）選舉的成員組成居民（村民）委員會，實行自我管理、自由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制度”（G2-U8-L22-P119），解釋了其定義便已完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實現騰飛的關鍵核心。教科書在初中二年級第八單元第 23 課〈初探中國經濟〉、第 24 課〈改革開放的意義〉和初中三年級第八單元第 22 課〈初探中國發展〉，完整地把由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期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再到今天的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程進行了梳理。無論是計劃經濟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教科書將該時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都收入教材之中，引導學生對於中國在不同階段所實行的經濟體制形成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同時，教科書運用經濟統計資料所形成的圖表和紀實圖片，展示了改革開放所創造的亮眼經濟成績給中國社會和民眾生活帶來的可喜變化。

《憲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具體化，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基礎。教科書在初中一年級第三單元第 9 課〈澳門的法律體系〉中用金字塔圖將憲制性法律、在澳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澳門本地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行政命令及其他規範性法制文件由塔尖至底部排列，並指出《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同樣適用於澳門，其與《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法律體系中的位階最高的憲制性法律。這是有關“一國兩制”法律基礎的至高地位的交代。在初中二年級第三單元第 7 課〈《澳門基本法》中的居民權利〉中“腦力探索”欄目，教科書對“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體內涵進行解釋時，由箭頭與不同顏色文字方塊組成的框架輔以文字描述，將國家、內地、澳門在“一國兩制”下進行的權力分配所形成的關係簡明地表達出來。而頁面下方設置了《基本法》誕生歷程時間軸，軸上標明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基本法》草案公開諮詢直至《基本法》完成立法程序並經由國家主席正式頒佈的重要節點，突出了《基本法》制定過程的

權威性和廣泛代表性。在初中三年級第七單元第21課〈主權回歸與“一國兩制”方針〉裏，教科書對“一國兩制”方針中的“一個國家”、“高度自治”、“兩制並存”、“長期穩定”的特定內涵進行了說明。

總體而言，在國家制度方面，教科書“重經濟，輕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政治制度、“一國兩制”原則性概念及其內涵被謹慎、保守地由《憲法》、《基本法》等法律文件承載並安放在了其中。而服務於國家認同建構的主要內容，是讓學生得以從可觀、可感、可測的經濟騰飛、社會發展成就，其生活經驗與走向繁榮的“經濟中國”建立起親近的情感聯繫。

筆者認為，教科書有關國家認同的內容的立體建構是巧妙的。在不同領域知識間、在不同主體和對象間、在可能存在的爭議與矛盾間，這一立體建構致力於在“一國兩制”背景之下將學生們的國家認同自然地引向符合當今中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期待的方向，致力於在教科書中傳遞出一種可以為澳門學生共用的自覺、自信、自豪的情感，進而轉化為對國家認同的正面評價。

同時，這一立體建構又是保守的。從整體上看，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和國家文化的內容佔據了遠多於國家制度的版面。從國家制度這一局部來看，依靠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歷程被聚焦，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國家政治運行相較則略顯平淡。

三、對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討論

學校系統的政治社會化效果更多地取決於學校以外的大環境與其信息內容的一貫性，這種一貫性決定了統治集團灌輸政治態度的努力成功與否。^①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建構的討論，事實上是該內容如何做到與社會環境保持一貫性、從而有效介入學生群體對政治對象的態度的形成過程，為政治共同體贏得支持的討論。具體到本文，這一政治共同體就是包括內地、澳門、香港、台灣地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面對這一國家認同建構的本質，加之本地區乃至全球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所引發的可能出現的新挑戰，澳門品德與公民教育教科書在國家認同建構上的角色不能止步於此，需要走出一條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道路。

（一）澳門特色道路的核心：獨特性

走出一條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上的澳門特色道路，獨特性必然是核心。獨特性需要在比較中體現，而在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上，主要內容既借鑑內地教科書，又與其有所區別。在其他領域，澳門更多地與社會制度相近的香港、台灣地區進行比較。無論是澳門、香港還是台灣地區，當國家認同指向為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中華人民共和

^①（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美）小G·賓厄姆·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頁109。

國這一主體時，內地在與之有關概念、表述上擁有着最高的效力及規範性。若簡單遵循這一邏輯，既然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引導學生建構的國家認同與內地指向相同，那麼運用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理念，讓澳門學生閱讀並接受與內地相同的一種規範表述，就可以排除兩個制度和環境間發生衝突的隱患。然而，不同的制度和社會環境決定了那些主張“直接移植”的做法不僅行不通，更可能給國家認同帶來“反作用”。內容的獨特性要求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建構的國家認同是真正為澳門學生及社會所適應和接受的。

（二）澳門特色道路的重要內涵：開放性

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道路的開放性是應有之義。開放性意味着更多的觀點、聲音可以出現在教科書中，以供學生進行對比和瞭解。如果澳門的國家認同被認為是一種根植於土地、文化、種族等等中國元素的固有的內生情感，那麼國家認同的建構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喚醒和強化國家認同的過程。既然是喚醒和強化，自然就不應懼怕不同的聲音和觀點。

開放性絕不意味着無邊界、無原則的開放。開放性在教科書的國家認同上是為學生追尋一個理性的建構空間和路徑創造條件，是以開放促進認同。具體來說，開放性要求教科書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上做好工作。在事實判斷上，忠於客觀事實是不變的準則，即便在細節上存在的不利因素也同樣享有同等的被瞭解的權利。而在價值判斷上，區別與引導則是重中之重。面對不涉及原則的大多數問題時，價值判斷上的自由度應得到充分和無條件的保障，忠於個體內心的真實意志是作出價值判斷的唯一基礎。而當涉及原則問題，教科書的必要干預和積極引導是不容缺席的。而原則問題和非原則問題的區別並不是簡單的一分為二或是涇渭分明。如在對待澳門曾經被殖民統治的問題上，就殖民政府與特區政府的具體治理上的討論是非原則問題，學生大可以就二者之間的具體事例進行個人的價值判斷。籠統地將某些問題進行“一刀切”是行不通的，這讓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運用的重要性尤為突顯。

（三）澳門特色道路的關鍵：針對性

針對性體現在有關澳門和國家間“異”與“同”的處理上。人們通常理解，服務於國家認同部分的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內容當然應歸於“求同”，也就是關注澳門與國家的交集，如教科書中有關國家象徵、國家歷史、國家文化的內容。考慮到兩個社會間的部分差異的存在所帶有的爭議性，穩妥的做法是將這些“異”居於國家認同中的次要地位。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卻有着顯著的漏洞。它忽略了學生對兩個社會中的“同”與“異”認知，並不以教科書乃至學校為唯一渠道的現實。相較於“同”，兩個社會中的“異”往往更容易被捕捉。教科書若將“異”置於一個謹慎小心、欲言又止的安排之中，學生尋求其他渠道去填補這些空白是自然的。因此，有針對性地要求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對於澳門與國家存在的不同之處採取不迴避的態度，主動關注及回應學生可能抱有的有關這些不同之處的疑問甚至是質疑，有針對性地要求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在澳門自由

的社會環境中精準直面棘手的難題，鮮明劃出清晰的紅線，從而實現不僅在“求同”上掌握主動權，更要在“存異”上奪回並守住話語權的效果。

教科書內容上的獨特性、開放性和針對性事實上是一個有機整體。獨特性是開放性、針對性的統領，開放性、針對性是獨特性的具體體現。走出一條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道路，獨特性、開放性和針對性就是對政治社會化理論下學生日常接觸的澳門社會現實與教科書需保持一貫性的回應。要走出一條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建構的澳門特色道路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走出一條“一國兩制”澳門特色道路的發展問題上來。只要牢牢把握住這個本質，相信澳門公民教育教科書的國家認同建構將收穫更為廣闊的視野，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進步。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

張大千與澳門因緣的再研究

陳繼春

張大千（1899—1983）是二十世紀東西方畫壇如雷貫耳的名字，可能是中國歷代書畫家中學習古代名家畫作數量最多、範圍最廣的畫家，被徐悲鴻（1895—1953）譽為“五百年來第一人”。他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藝術史上的一座豐碑。

張大千原名正權，後改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下里巴人，齋名“大風堂”，祖籍廣東番禺。張大千曾於1949年2月19日，假香港大酒店天台花園舉行個人展覽會，當日下午二時揭幕，展出近作59件共60張作品。^①開幕時，香港藝術家收藏家及各界名流逾二千人出席。三天展期中，展覽時間是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半至六時，^②中午休息，文獻稱：

名畫家張大千繪畫展覽會已於昨日下午二時開幕，本港藝術家、收藏家及各界名流到會參觀者逾二千人，極一時之盛。張氏少研六法，早歲已馳譽大江南北，而最近作品尤為精湛。會中佳構，有摹敦煌壁畫觀音大士像，設色古樸，筆觸豪邁……《鷹犬圖》賦色濃豔，神采奕然，《秋山鳴泉圖》則沉厚蒼鬱，直逼元人，《醉舞圖》之人物，酩酊狂歌，醉態逼人，此圖倣龍眠白描畫法，勁挺飄逸，兼而有之。《倣東丹五人馬》及《倣唐人畫馬圖》二圖，深得唐人神髓，花卉如《芙蓉》、《玉茗》、《白鶴異卉》、《山櫻野馬》、《白荷》、《竹石》等，或而秀麗，或而雄豪，筆端造化，工意俱宜。會中出品五十九款，山水、人物、花鳥，仙佛像，無不各具神采，覽者莫不嘆為觀止。該會現尚有今明二日，參觀時間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半至六時，會場在香港大酒店花園，公開展覽，不收門券。^③

此時張氏，已隱棲在敦煌摹臨壁畫兩年多，畫風已大變，“山水則雄渾沉着，花鳥則妍麗而饒生趣，人物則意態萬千，實為畫壇鉅觀”。^④有跡象表明，張大千於香港的展覽結束後在當地有停留，之後曾返回內地，後來再履香江，而且於香港與葉恭綽（號遐庵，1881—1968）有合作。這是因為當年6月15日香港的報章有云：

藝林耆宿葉遐庵恭綽先生，與當代國畫大家張大千先生，最近數月，先後在港舉行展覽，觀者雲集，稱盛一時。茲因炎暑來臨，葉先生仍養病壚峰，張大千復南飛啖

作者簡介：陳繼春，廣東省藝術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澳門美術協會藝術顧問、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博士。

^①鄭德芬：〈介紹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工商日報》（香港），1949年2月19日，頁6。

^②〈張大千畫展今在大酒店天台舉行〉，《華僑日報》（香港），1949年2月19日，第2張，頁2。

^③〈張大千畫展盛況〉，《工商日報》（香港），1949年2月20日，頁6。

^④〈張大千畫展今在大酒店天台舉行〉，《華僑日報》（香港），1949年2月19日，第2張，頁2。

荔，九華堂主人劉少旅，特敦請兩先生作書畫扇面百事，藉供大雅之揚風，文壇共賞，刻已得到允許，訂於本月十八、十九兩日，假座思豪酒店藝術廳舉行聯合展覽。屆時會中並兼有兩先生合作之精品展出。^①

上文所說葉恭綽和張大千於香港的先後個人展覽，當中葉氏的是指1949年4月15日假香港思豪酒店舉行的為期三天的“葉遐庵書畫展”。其實，葉氏自1948年返回香港後，除編纂“廣東叢書”外，“餘時以畫自娛，積久得百餘幀”。^②該展覽的預展在大華飯店舉行，並陳列近作四十幀，當中以寫竹最多，“有元各家如趙鷗波、柯丹邱、吳仲圭、夏子昭、李息齋等竹法，葉氏皆有所摹擬，又作為雙鉤朱竹等，蔚為今代寫竹之大頤，松、梅諸作，機杼獨運，氣韻淵穆，尤非時下作家，所能望其項背，書法以寫經各幀最為恬澹，聯及條幅則筆力雄勁飛動”。^③此時的葉恭綽以書法馳譽海內已二十多年，故展覽令“中西各界人士參觀者空前擠擁，足以流傳後世之名作品，四壁琳瑯”。四十幅一套之《佛祖心經》為藏家以六千元購去，此外，梁季典、杜梅和及倪士欽等數十人亦訂購展品，大受歡迎。^④兩人承接2月和4月的“旋風”聯展，令香港的民眾眼福不淺。

是次於6月在香港舉行的合作展覽“除兩氏之畫便扇面外，尚有遐庵書法立軸及對聯等，全部出品，約百二十餘件，山水、人物、花鳥、書法，各體無不俱備，琳瑯滿目，美不勝收”。6月18日前往參觀人士眾多，大會“茲詢觀眾要求，將會期展期一日，至二十日始行閉幕云”。^⑤

葉恭綽與張大千在中國書畫界中夙負盛名，葉氏以書法名世，這是大家所共知的。兩位大家聯袂展畫，其淵源當緣自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要知道，葉恭綽與梅蘭芳（1894—1961）舉行合作書畫展，當展覽結束前，售餘的書畫就被張大千悉數購去，以分贈好友；張大千34歲時與兄張善孖（名澤，1882—1940）在蘇州居住時，“又曾與遐庵合賃一園，作為讀畫宴遊之所，遐庵集中之大千昆季的詩和信甚多”。^⑥張大千的書法，早年師從李瑞清（1867—1920），李氏之作頗能傾倒一時，後來張氏改變其師的風格，參以帖意，使自己的字清奇飄逸，神采獨具。當中，其寫《瘞鶴銘》、作榜書時更能表現出其雄渾氣息。很可能，學蘇軾（1037—1101）“啖荔”是一個藉口，“這次大千從四川到香港，原本是探望遐庵來的”。^⑦然而，張大千並沒住多久，6月21日香港的報章稱：

葉遐庵與張大千合作扇展，經於（六月）十八日起一連三（天）假思豪酒店舉行。張氏月前由蜀到港即轉澳門小住，昨始返港。^⑧

^① 〈葉恭綽張大千聯合書畫展定期舉行〉，《工商日報》（香港），1949年6月15日，頁6。

^② 〈葉恭綽將開書畫展〉，《大公報》（香港），1949年4月7日，第4版。

^③ 〈葉恭綽書畫展昨日預展招待報界〉，《工商日報》（香港），1949年4月13日，頁6。

^④ 〈葉遐庵書畫展今日最後一天〉，《工商日報》（香港），1949年4月17日，頁6。

^⑤ 〈兩個畫展均告展期〉，《華僑日報》（香港），1949年6月19日，第2張，頁2。

^⑥ 觀成：〈記遐庵大千之聯合展覽〉，《世界日報》（澳門），1949年7月11日。

^⑦ 馨廬：〈葉張聯會畫展〉，《大眾報》（澳門），1949年7月10日。

^⑧ 《華僑日報·圓社藝文》（香港），1949年6月21日。

以上文字至少可以為我們帶來兩個訊息：

其一，張大千是 1949 年 5 月左右抵達香港後轉居澳門，開始其穿梭港澳之旅。

其二，葉恭綽與張大千的聯合畫展開幕時，張大千是在香港的，或者開幕時在展場。然而，張氏何時最早與香港結緣？為何於 1949 年來澳門？

一、藝友往還

文獻表明，張大千於 1938 年為走避戰亂從北平侵華日軍魔掌中逃出，抵達香港，之後轉桂林而再入四川。張大千回到成都老家之後，再蟄居四川灌縣青城山。如果說早年的他主要以錘煉古人技法、領悟古人畫風的話，四五十歲即是“以自然為師”時期，也就是客居青城山的時期。

張氏與澳門結緣，還要等近十年之後。他 1949 年於澳門小住，緣於蔡家。

因時於澳門且是蔡家後輩同學而與張氏結緣的繆啟泰云：“當時殷商蔡克庭寓居澳門大堂街十八號（即劉柏盈、劉明新寓所隔鄰，現已拆建為永基大廈）。蔡克庭聞張大千在港便邀請張大千來澳作客。”^①偕行者有四夫人徐雯波及部分家人。其實，澳門蔡氏家族與張大千結緣可以追溯得更早。

蔡克庭於澳門設有“三和公司”，經營汽油等，並擁有俄國麵包公司和廬山影相館，同時亦從事澳門至廣東開平的內河客運生意，是澳門富商。抗戰爆發後，蔡氏激於愛國義憤，不顧澳門商務繁忙，接受家鄉民眾要求，兼任家鄉珠海拱北北嶺鄉鄉長，親自帶領自衛隊抗擊日寇侵略。日軍攻佔拱北地區後，北嶺鄉民逃來澳門避難，蔡家全部予以接待；此外，亦停開客輪，泊於澳門筷子基，安頓各家老少；其“三和公司”的廠房，則為單身漢的安棲之所，並按月向難民發放糧食與零用錢，鄉民均感其德。從張大千的年譜可知，張氏在青城山上清宮生活了三年之久。時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的蔡克庭次子蔡昌鑾抗戰時隨校西遷入川，在四川成都華西壩上學之際曾前往青城山旅遊，由此和於山上寄居的張大千結緣，兩人成為至交好友，而且邀張氏方便時來遊澳門。之後的 1941 年，張大千率門人、弟子數十人遠赴西北絲綢之路的敦煌莫高窟，對敦煌壁畫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與臨習。

1949 年抵澳門的張大千在蔡家的接待下“住在大宅樓下右前客房中，早晚除去南、西灣及松山漫步外，亦常常去盧家花園的春草堂和九曲橋上觀賞荷花，日間就在蔡宅大廳揮毫作畫為樂”。^②在此期間，他與鄧芬（1894 — 1964）、張谷雛（1891 — 1965）、鮑少游（1892 — 1985）、容漱石（1905 — 1993）、黃蘊玉、馬少如、黃苗子（1913 — 2012）、郁風（1916 — 2007）、招名山（1927 — 1966）等有聚會。

^①穆陽：〈張大千在澳門〉，《澳門日報》（澳門），1983 年 4 月 8 日。

^②穆陽：〈張大千在澳門〉，《澳門日報》（澳門），1983 年 4 月 8 日。

（一）與鄧芬及張谷雛

劉衡仲有云：“張君為賞澳門風光，南來小住，與吾粵留澳畫人鄧芬、張谷雛等往還。”^①鄧芬與張大千的關係淵源於李瑞清（1867—1920）。正如我們所知，鄧氏由於1911年負笈南京“暨南學堂”而與李瑞清結緣。張大千是1919年才於上海拜入曾農髯（名熙，1861—1930）和李瑞清門下的，張大千與李氏結緣比鄧芬遲了八年，這就是後來張氏致函鄧芬時稱之為“學長”的原因，是“同學”之誼的由來。

我們缺乏資料去證明1928年夏天張大千遊歷廣州時是否已和鄧芬相識。然而，有跡象顯示鄧芬和張大千的密切交往始於1929年，因為當時張氏居於上海，是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幹事會會員，同時他們曾聯袂遊覽杭州。張大千和葉恭綽結交是在1929年的3月，^②儘管我們沒有資料證明鄧、張之交往是否由葉恭綽一手促成，但張氏肯定是充分研究過鄧芬的作品才推許鄧芬為“廣東唯一國畫家”的。據林近對筆者說，當時中華書局計劃出版《當代名人畫海》，委託張大千組稿，藉此網羅當時中國畫壇第一流高手的作品，張大千於是邀請鄧芬提交作品。此作品乃鄧芬當年秋天作於上海的中堂《高柳鳴蟬》。^③此外，張大千於1933年11月再遊羅浮山後到廣州，就為鄧芬畫《羅浮秋色圖》。鄧芬於1938年秋天於香港與張大千多次會面，根據鄧芬家屬所藏鄧氏的日記，其中戊寅閏七月初六（8月30日）條云：“……六時晚餐後與仲嘉、仲強往利園詣張大千論畫，談至八時許散。”戊寅閏七月初七（8月31日）條云：“明午赴張大千酒招。”^④

1938年9月2日星期五，鄧芬參觀了張大千在香港舉行之畫展，翌日則與簡琴石、張君華、區季謀等宴張大千於金龍酒樓，^⑤9月7日為張大千餞行，時值張坤儀繪畫二幅，一為鳥和紅葉，另一為竹仕女，及張大千為其畫《芭蕉美人》一幅，^⑥張大千於席上贈鄧芬筆四支。眾多的可能性表明，張氏酌採篆隸入行楷且體貌自成的“香港避兵之作，戊寅初秋為二不乞士題，爰”，是1938年秋天於香港為鄧芬題署的。

鄧芬門人陳丙光藏有一張1948年張大千與鄧芬、簡琴齋、張君華、廖俠懷、張祥凝、余匡父以及雷君軾攝於香港的照片，名之曰：“袖海堂小集”。按1937年簡琴石於香港設“袖海堂”教授書法，1938年8月時，張大千已有於香港大酒店舉行畫展的記錄，到1939年，簡氏、鄧芬及馮康侯（1901—1983）就合辦“袖海堂金石書畫社”，當年就設有簡琴齋書法班、鄧芬習畫班及馮康侯之金石篆刻班。^⑦照片中的鄧芬居中，神態豪邁，其時張大千所流露的是怡然自得的神情。

^①劉衡仲：〈觀葉張書畫聯展後的介紹〉，《華僑報》（澳門），1949年7月11日，第四版。

^②李永翹：《張大千全傳》，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頁72。

^③坊間將此畫稱之曰《秋意圖》，現依原書改正為《高柳鳴蟬》。

^④2011年5月3日蒙劉季先生賜觀於澳門，深謝！

^⑤鄧芬日記戊寅閏七月初十（9月3日）條云：“三時往參觀張大千畫展也……即往金龍酒家，慧吾宴張，作陪也！同席張君華、區季謀、簡琴石……”

^⑥2010年11月4日蒙劉季先生賜告，深謝！

^⑦〈袖海堂之金石書畫社綜合各家所長組成〉，《大公報》（香港），1939年11月21日，第6版；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9年，頁144；朱琦：《香港美術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頁283。

張大千與居澳畫人關係至為深厚的，就是鄧芬。1949年2月的文獻有云：

畫人張大千上月到港，寄寓書畫家簡琴齋家，舉行近作畫展四十餘件。聞定價每尺約港幣三百元，折合黃金一兩。南中畫人李居端、黃般若、鄧芬等均從粵澳到港參觀，極一時之盛。^①

據說張大千寓蔡家時，鄧芬也於是處留宿。此外，1949年農曆四月，張大千就曾應吳鳴之邀和張谷雛等人於澳門普濟禪院小集。後者的詩有云：

大千吾宗有道己丑夏四月自蜀來游鏡海，吳仲鳴邀約小集普濟禪林，詩以記之。
“無塵碧影清如鏡，那得人間似水平。凌辱不忘夷典在，葡人有凌辱節，慈悲近夢晚鐘生。
相聞藏海思遺世，省識高蹤託遠程。咫尺江山成異國，華燈及夕看分明。谷雛稿。”^②

此詩書於“中山縣岐關車路有限公司用箋”上。按“己丑四月”即公曆1949年4月28日至5月27日，可以相信，張大千、吳鳴和張谷雛於普濟禪院的雅會，應在1949年5月，也就是張氏抵澳門不久。

（二）與鮑少游、黃般若及容漱石

1948年12月，張大千與夫人徐斐波由成都乘飛機赴香港，同月在香港舉行“張大千畫展”。^③根據鮑少游（1892—1985）的記述，他曾往參觀是次展覽，但尚未與張大千結識。不過，12月張大千住在九龍亞皆老街時，張氏請黃般若（1901—1968）驅車迎接並酒聚，此為鮑少游與張大千的第一次會面。“於是酒邊歡笑，縱談古今書畫。大千胸襟曠朗，豪氣干霄，對客殷勤，笑語不輟”。^④而他於澳門與張大千又有一次會面，鮑氏云：

逾歲，大千僑遷澳門。般若重來相告。正當此時，予之新作：《鏡濠春曉長卷》，方告脫稿。因出示般若，試與切磋。般若既加贊語，忽又倡議：攜此卷畫同遊馬郊，一訪髯翁請其指謬。予欣然與般若啟行。既抵澳，與大千重叙於燈紅酒綠之夜，怡然展卷同觀。大千細心鑑賞後，舉杯對我們大笑曰：“鮑先生此卷就地取材，師法造化變古開今，好極了！並即濡墨提筆，為題跋於卷末云：“觀此卷，不禁有三宿桑下之感，少游先生其神矣乎，何令人怡情乃爾後！”^⑤

遺憾的是，雖然十分不捨，但鮑少游此卷作品後來於1950年在澳門的畫展中被澳門總督柯維納（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1947—1951年在任）購藏了，故我們未能清楚瞭解張氏這一跋文的書寫月份。不過，緣於1949年5月中山縣總工會為籌募

^① 〈藝壇新訊〉，《新希望》（上海），1949年第2期，頁9。

^② 張谷雛詩稿曾展出於澳門藝術博物館。圖載勞巧綺等編：《歲月如流：濠江舊侶詩書畫篆刻》，澳門：民政總署澳門藝術博物館，2011年，頁68。

^③ 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頁313。

^④ 鮑少游：《石濤與大千》，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6。

^⑤ 鮑少游：《石濤與大千》，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7。

工人福利基金而廣邀縣內外香港和澳門的中山籍藝術家參加“名人書畫聯展”，該會理事長盧昭德經澳門前往香港親自邀鮑少游和容漱石（1906—1993）參加並回石岐主持儀式。隨後，鮑少游和容漱石應邀由香港乘船至澳門再轉乘岐關車回鄉。^①1949年5月22日，該展覽於石岐中山圖書館揭幕。^②按照行程，鮑少游和容漱石一行是6月5日由石岐起程，經澳門回香港，並與張大千在澳門有聚會。資料又云：

張大千去月（抵）港日（旬）前往澳門小住，時值容漱石、鮑少游赴石岐返港經澳，故周來彼等與澳中藝友時相聚會，鮑氏日昨已返港，容氏在澳稍事逗留，日間亦可返港矣！^③

由於從石岐到澳門，乘汽車當日可達，有限的資料表明容氏從1949年6月4日起可利用其在澳門停留的時間與張大千會面。當然，我們尚不能排除容氏回石岐前，或早在香港、或經澳門回鄉轉車前和張大千相遇的可能性。有直接而堅實的資料表明，容漱石和張大千一齊於1949年6月末在澳門盤桓了近兩個星期，因為當時的報章云：

容漱石週前復赴澳門為母祝壽，連日居澳與張大千等叙遊甚暢，並採選荔枝、甘欖、貝多羅花果等樹苗，以贈張氏攜蜀移植，張氏亦將由蜀以牡丹、芍藥種苗酬贈。^④

（三）與黃苗子等

之後，黃苗子（1913—2012）隨後來澳門探望張氏。黃氏云：

記得1949年春，我在香港，專程同郁風及呂恩女士一起去澳門，和大千先生盤桓三日。那時他住朋友家，他得意地把他為朋友眷屬繪製的牡丹、梅竹之類衣料拿給我們看。這是裁縫工匠剪裁好的旗袍料，大千在上面繪畫後再去縫製的。那是他正蟄居無聊，在繪畫品種上的新嘗試。大千掀髯說“年輕時曾去日本學過染織，這是我的本行呀”。^⑤

實際上，黃苗子於30年代已在陸丹林的介紹下認識張大千。按黃氏的記述，1935年左右，正確來說是1936年春天他與葉淺予、張正宇、陸志庠等從上海到蘇州，到網師園去看張大千兄弟。^⑥正因為如此的交情，張大千於澳門面對來訪第二天的黃苗子和郁風，就以一幅淡墨小幅作禮物。此畫右下角是一位美人的背影，坐在石上，手扶半露的紈扇，十分清雅。當然，此畫並不是張氏的寫生，黃氏記述云：

當我們道謝連聲之際，他隨手翻出桌上的一本美國雜誌，封面是一位穿着浴裝的金髮摩登少女，背面坐在海邊的帆布椅子上，大千笑着說：“我這幅畫，正是給這位摩登洋女人的姿態引起的靈感，我只是把她穿上古裝，盤上‘窩墮髻’而已。你看她的身形、

^①鮑少游：《石濤與大千》，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176。

^②〈中山縣總工會書畫義展籌款〉，《開明報》（中山），1949年6月5日。

^③《華僑日報·圓社藝文》（香港），1949年6月7日。

^④《華僑日報·圓社藝文》（香港），1949年7月5日，第廿期。

^⑤黃苗子：《畫壇師友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154—155。

^⑥黃苗子：《畫壇師友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156。

坐姿，和這封面女郎不是一模一樣嗎？”^①

此外，張大千亦向時為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演員的呂恩（1920—2012）贈了一幀《白描仕女圖》。^②是時，張大千以重金讓人從東南亞買回兩隻長臂白猿，並將之養在園內，時時對猿寫生，或逗猿嬉，引以為樂。張大千更引黃氏一行到園內觀賞長臂猿呢！^③

（四）與黃蘊玉、馬少如及招名山

目前唯一公開發表的張大千於澳門的留影，是資深報人、畫家黃蘊玉（1904—1994）的藏品，首現於1983年，而黃氏就是當事人之一。

其時，知名的攝影家盧世東在議事亨利斯大廈設有攝影院，是當時一家頗具規模的照相館，張大千與之諳熟，時至攝影院閒坐及聊天，有時更邀往“蔡家大屋”拍照留影。^④而黃蘊玉亦與盧世東私交甚篤，於盧氏攝影室結識張大千。黃蘊玉與張大千等就攝於“蔡家大屋”前，照片中的張氏時年五十一歲，但他的美髯仍然烏黑。“據黃蘊玉的回憶，張大千對本地的畫家十分熱情，非常隨和不擺架子，經常請本澳畫家到蔡家大屋觀他畫畫，大家切磋畫藝，交流心得”。相中就有黃蘊玉、梁少殷、馬少如、招名山、容漱石。^⑤

學者云：“1949年春節過後，張大千在澳門蔡家大屋畫過多幅荷花圖，後來選了一幅送到香港，黃蘊玉先生認為那一幅荷花圖就是應何香凝（1879—1972）之邀贈予毛澤東（1893—1976）的《荷花圖》。”^⑥

《人民日報》於1983年5月23日發表消息，透露張大千曾在1949年二月為毛澤東作《荷花圖》，並宣佈該圖將收入《毛澤東故居藏書畫家贈品集》中。這幅畫是由何香凝自香港攜到北京贈予毛澤東的。張氏《荷花圖》上題“潤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張爰”。^⑦按“己丑二月”為張氏作畫的農曆紀元，即在公曆1949年2月28日至3月28日之間。史載1949年3月8日何香凝攜女廖夢醒抵張大千的寓所拜訪，並向張氏贈其所作《梅菊圖》一幀。^⑧當然，是否何香凝於3月8日探訪時就將張氏贈毛氏之作帶走，還是當日表達請求而隨後交卷？迄今沒有更多的文獻公佈。不過，如果是前者，此《荷花圖》就與澳門不相關了！因為按1949年7月澳門的報章，其上仍云張大千來澳近兩月，^⑨如果是後者，即有可能。然而，按何氏年譜，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何氏已於1949

^①黃苗子：《畫壇師友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155。

^②黃苗子：《畫壇師友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155。

^③黃苗子：《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第五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

^④黃衫客：〈張大千曾小住澳門〉，《華僑報》（澳門），1985年6月23日，第13版。

^⑤徐新：〈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陳浩星主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臨時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1年，頁41。

^⑥徐新：〈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陳浩星主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臨時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1年，頁42。

^⑦張大千：《荷花圖》，毛澤東故居圖書管理組選編：《毛澤東故居藏書畫家贈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又載梁京武主編：《毛澤東藏畫——毛澤東珍藏現代名家書畫集》，北京：龍門書局，1998年，頁26。後者藏香港中央圖書館。

^⑧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頁319。

^⑨〈葉張畫展盛況尚有今日一天〉，《華僑報》（澳門）1949年7月12日，第4版。

年4月抵達北京。^①此外，除非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張氏於1949年農曆二月以前於香港居住時來過澳門且於盧園賞荷，否則如此看法，看來只能是美麗的想像。

上文所說的“多幅荷花圖”中，目前我們仍可看到《荷花》，上題“己丑夏日寫似樑年仁兄法家正之，大千張爰同客濠江”。^②“樑年”者，即劉樑年。劉氏字幹如，曾任職於上海海關，戰亂時期給予張大千多次幫助。

（五）生活點滴

在澳門時，張大千與蔡家上下俱諳熟，甚至小輩的同學亦一樣。1949年已有自己座駕的謝學華有空就載着張大千去海邊游泳，以及至其他大戶人家的花園賞花。“記得有一次蔡家十姑娘求張大千贈畫，張大千囑備一幅白色綢緞縫成長旗袍後，隨後在其上繪上荷葉荷花。蔡姑娘正年華雙十，穿上煞是好看，十分雅緻，還拍了照片”。^③或許，作為十姑娘同班同學，以及在場者的繆啟泰於半個世紀後憶述，會因時間的過去會影響記憶。以目前所知，張大千是讓求畫者買來白綢，先於其上繪畫，之後再讓裁縫做旗袍的，而且他不只畫了荷花，還有牡丹。^④後者就是謝學華，即後來的蔡家公子昌明的夫人。

張大千在澳門的生活甚有規律，清晨攜子牽着兩隻長臂猿從蔡家大屋出發，沿羅結地巷(Travessa do Roquete)而下議事亭前地，之後轉至玫瑰堂，再轉入賣草地街，直上聖保祿教堂遺址旁，經聖安多尼教堂抵賈梅士前地至白鴿巢公園晨運，從不間斷。張氏衣着樸素，留着大鬍子，身旁又有白猿，頗能引起街上行人的注意。^⑤

按繆啟泰的記述，張大千“對青年晚輩愛護備至。他多次與我們一起(沿)羅結地巷而下，在對面的龍記酒家進餐，大良野雞卷、炒牛奶均為宗師所嗜。席間宗師曾將其四川家鄉名為大千魚的菜式故事解述，談笑風生”……^⑥張大千於農曆七月於澳門為繆啟泰畫扇面。上題“己丑六月寫似啟泰仁兄法家正之，大千張爰時客濠江”。^⑦

二、展畫利為旅

張大千於香港與葉恭綽的聯合展覽會完成後，至少於6月中旬返回澳門，因為他的猿仍養在澳門，而且精作《烏猿》上署：“擬長沙□□易元吉筆，己丑夏至客濠江，蜀人張大千父。”^⑧夏至在1949年6月22日，換言之，此日他已由香港回到澳門。

張大千於澳門會友之時，與之所至，成畫若干幀，但他仍不輟寫生。其對澳門何處名勝情有獨鍾？白鴿巢、西望洋、西灣、馬交石，以及上文所述的殷商的花園留下了足跡。

^①〈何香凝藝術年譜〉1949年條，《何香凝美術館年鑑：1997—2001》，深圳：何香凝美術館，2002年，頁204—221。

^②張大千：《荷花》，程恩嶸主編：《張大千精品集》下，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353。

^③穆陽：〈張大千在澳門〉，《澳門日報》（澳門），1983年4月8日。

^④獲得牡丹的就是薛力勤的表姐，2014年5月20日蒙薛啟善兄賜告，深謝。

^⑤徐新：〈張大千在澳門的藝術活動〉，陳浩星主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大風堂用印》，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臨時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1年，頁42。

^⑥穆陽：《張大千在澳門》，《澳門日報》（澳門），1983年4月8日。

^⑦2010年9月20日蒙薛啟善兄賜觀，深謝！此畫現藏澳門博物館，編號4912。

^⑧張大千：《烏猿》，圖載林太乙：《文華集》，台北：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1984年，頁31。

當年農曆五月時，亦有書法創作。^①

7月10日至12日，葉遐庵、張大千書畫展覽會於利為旅酒店二樓一零五至一零八號房舉行，時間是早上10時至下午6時。^②利為旅的廣告表明該酒店幽靜清潔，高貴舒適，設備新穎，空氣充足之說，英、法、葡、俄等國的餐點都有提供，1948年的房租單房十二元，雙房二十五元。是澳門當時旺中帶靜、而且高級的酒店。作為展覽場地，甚是方便。澳門報導云：

名畫家葉遐庵（恭綽）、張大千聯合畫展定於今（十）日起，一連三天，假座利為旅酒店二樓舉行，不收門券，歡迎各界參觀。究昨晚舉行預展，並招待到會名流，即席訂購者已達十餘人。葉、張兩氏，為我國有名畫家，此次聯合展出，預料今日前赴參觀者必眾。^③

葉恭綽和張大千再次合作，延續香港展覽的傳奇，不得不使人再次重溫他們兩人的交往點滴。其實，張大千1938年7月底從上海帶着二十四箱古畫乘法國郵輪“費力斯·羅索”號抵香港，暫居淺水灣友人的家，8月上旬在香港畢打街香港大酒店舉行了香港的首次個展。當月中旬，他計劃由香港返回四川，苦於二十四箱收藏不好隨身攜帶，還是葉恭綽代為交涉，由香港中國航空公司飛漢口轉重慶的小飛機幫忙托運。葉氏當年亦對張大千期許甚深，張大千赴敦煌臨摹壁畫，則由於遐庵的鼓勵。而“當遐庵六十生日時，大千曾自敦煌畫《維摩像》寄給遐庵，純仿壁畫，用筆高妙”……^④葉、張兩人俱有個人展覽的經歷，但在澳門聯合展出，還是第一次。是次展覽展品共一百件，大部分是扇面，書畫各半，張大千個人作品約四十件，葉恭綽的約六十件，其餘是兩人精心合作的書畫扇面，共有十多幅。^⑤有跡象顯示，鄧芬於上述聯合畫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因為張氏有致鄧氏函云：

曇殊學長兄足下：邇日毒熱，未得趨談為歉，拙作扇子三十握擬於此展出，得兄登高一呼為幸耳！今遐翁有書欲與拙作同展，另有致足下書，附呈！弟爰再行，五日。^⑥

澳門展覽的反應如何？報章稱：

葉恭綽張大千書畫展覽會，已於昨十日開幕，車水馬龍，參觀者絡繹不絕。二氏俱極愛此間風景寧靜矣，極適宜於寫作。張大千來此已兩將二月，日惟於山巔水涯搜羅風景作草稿，會中展陳之《白鴿巢鳥瞰》、《馬交石》、《西環》等數幀，本地風光，觀者多歎賞不置。又《敦煌石窟佛像》、《楊妃琵琶》、《覓句圖》、《團扇閒情》、

^①張大千於澳門創作的書法圖版載《太乙樓藏近代名家法書集》，香港：中國美術總匯，1985年，圖版57。

^②〈葉遐庵、張大千書畫展覽會〉（廣告），《市民日報》（澳門），1949年7月10日。

^③〈葉張畫展今日開幕〉，《市民日報》（澳門），1949年7月10日。

^④觀成：〈記遐庵大千之聯合展覽〉，《世界日報》（澳門），1949年7月11日。

^⑤觀成：〈記遐庵大千之聯合展覽〉，《世界日報》（澳門），1949年7月11日。

^⑥信函圖版載《鄧芬百年藝術回顧》，澳門：澳門市政廳，1997年，頁25。

《倣唐人雙騎圖》等人物畫，莫不驚心動魄，蔚為鉅製，場中之間饒趣味者，為葉張合作扇面，其中合作者，有一字一畫者，珠聯璧合，名貴無倫。葉氏書名早已馳譽海內，深得顏趙之神，所書楹聯，尤見筆力，葉氏年高多病，日惟習靜著書自娛，最近已物色一幽靜之樓宇於青洲附近，將來此間靜養，若是即此間文化事業又多一提擘矣。^①

葉恭綽與張大千所展出的作品，“完全與在港時所展出者又別開生面。張氏之畫，一部分是寫澳門之本地風光……，其他如《倣清湘細筆山水》、倣陳老蓮之《覓句圖》、《楊妃琵琶圖》、《倣唐人雙騎圖》、《倣馬遠探梅圖》，俱直逼古人或而用筆超逸，或而蒼渾。其賦色之濃麗雅靜，佈局之奇險，尤為張氏高深偉大之成就。至葉氏之書法，向得力於趙子昂膽巴碑。葉氏藏法書名畫至富，其所藏趙子昂真跡甚多，而尤以膽巴碑為最，朝夕臨摹，深得其神者也”。^②其實，葉恭綽於此期間病臂，不能多作榜書，然而，是次展覽會上露面的五言或七言大聯，氣雄力厚，絕不類是病中之作，這或可表明其功力深厚，隨意揮灑，亦成佳構。展品中，亦有葉恭綽的松與竹。畫史表明，能以畫竹而於美術中上留下名字的，大都為士大夫，而且必精於書法。葉氏於書法上造詣深，故其下筆寫之就有元人胎息，^③令人印象難忘。

展覽結束後，張大千去了一次香港，但於7月17日返回。^④

這個展覽，成了1949年澳門美術領域內最重要的事件。迄今我們不清楚葉恭綽心儀的青洲居所位於何處？但知道1941年開業的“國際酒店”，以及沈仲強（1893—1974）於澳門的“霜傑樓”的“招牌”出於葉氏的手筆。同時“他六十九歲那年，因着戀久別的都，從香港回到北京”。^⑤

三、繾綣濠江

為了感謝蔡家的盛情款待，張氏離澳前將其《唐人秋獵圖》送與蔡克庭。^⑥該畫人物頭戴襍頭，着圓領窄袖袍衫，為唐人衣飾。胯下駿馬，馬鬃兩側分梳，馬尾縛尾成三花纓，亦為唐風。人與馬、人與人之間神情姿態，相互呼應互動關係，安排表現得極為生動傳神。人、馬的造型、畫法與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五代趙岳的《八達春遊圖》一脈相承。張大千很可能見過上圖，故《唐人秋獵圖》中人物造型與上圖中人物造型十分相仿。畫中人物所攜帶的箭壺與現藏國家博物館的唐代“狩獵紋高足銀杯”中狩獵者攜帶的箭壺已十分相仿。在敦煌壁畫中也有很多表現唐人狩獵的場景與圖像，由此可見大千在敦煌壁畫中觀察之

^①〈葉張畫展盛況尚有今日一天〉，《華僑報》（澳門），1949年7月12日，第4版。

^②劉銜仲：〈觀葉張書畫聯展後的介紹〉，《華僑報》（澳門），1949年7月11日，第4版。

^③鄭德芬：〈遐翁畫竹在中國繪畫之地位〉，《工商日報》（香港），1949年4月15日，頁6。

^④“葉遐庵張大千在澳門之聯展昨已閉幕，張氏日前來港，昨（十七日）又匆匆返澳。”參見《華僑日報·圓社藝文》（香港），1949年7月19日，第4張，頁1。

^⑤黃苗子：《畫壇師友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78。

^⑥蔡氏去世後此畫歸其第七子蔡昌桓。

仔細。^①《唐人秋獵圖》上題：

戊子嘉平月，仿唐人筆，蜀郡張大千爰。^②

翌年又自題：

早秋北國雪初飛，蘆荻花殘馬正肥；豐草欲（迷）麋鹿跡，酸風如箭射弓衣。己丑正月初四日再題，阿爰。欲下奪迷字。^③

此幅畫作於 1948 年底，可歸入張氏人物畫範疇，然山水以青綠為之，色彩華麗，冷暖對比強烈，從而襯托出淡彩賦色的人物。山石不事皴擦，而以線條和色彩為主。山石純以石青、石綠、蛤粉等礦物顏料渲染，富有濃厚的裝飾趣味與厚重感。為“沒骨山水”樣式。^④在筆者看來，《唐人秋獵圖》或許就是當年所稱的《倣唐人雙騎圖》。

另一方面，就目前所見，張大千也向鄧芬留贈自己的《自畫像》，上題：

衣冠甚偉鬚眉真，編策隨身杖履輕，何事無人（補泉石），不教閒處着先生。己丑六月朔，張大千爰。人下奪“補泉石”，荒率可笑。大千補注。曇殊學長博教，大千弟爰。^⑤

畫像富素雅高潔的文人味，以白描為之，張氏在此畫中，頭戴東坡帽，成高士之狀，右手執鬚，專心致志地觀讀左手上打開的書本。該圖下有鄧芬的題記稱：“辛卯夏日，以此奉呈仙洲吾兄嚴先生雅存。曇殊芬識在藕絲孔居。”^⑥

鄧芬做事一向出人意表，其轉手將張大千所贈之畫贈予別人，此為一向疏爽的性格使然，若受贈者不是深交之友，似沒有道理。不過，也不可以排除手頭拮据的情況，如其曾於 1948 年也對自藏的祝允明《自書詞卷》題識，其後成了吳鳴醫生挹翠閣的藏品。^⑦

^①〈張大千《唐人秋獵圖》3700 萬落槌〉，2013 年 6 月 2 日，新浪網，<http://collection.sina.com.cn/auction/pcdt/20130602/2202115425.shtml>。

^②〈張大千《唐人秋獵圖》3700 萬落槌〉，2013 年 6 月 2 日，新浪網，<http://collection.sina.com.cn/auction/pcdt/20130602/2202115425.shtml>。

^③〈張大千《唐人秋獵圖》3700 萬落槌〉，2013 年 6 月 2 日，新浪網，<http://collection.sina.com.cn/auction/pcdt/20130602/2202115425.shtml>。

^④張大千 1949 年有《仿張僧繇峒關蒲雪》，題識云：“此吾家僧繇法也，繼其軌者唐有楊升，宋有王希孟，元無傳焉。明則董玄宰墨戲之餘，時復為之，然非當行，有清三百年遂成絕響。或稱新羅能之，實鄰自創，去古彌遠。予二十年來心追手寫，冀還舊觀。斯從而後，直至小生，良用自喜。世之鑑者，毋乃愕然而驚，莞爾而笑耶！己丑閏七月廿五日，張爰。”

^⑤張大千《自畫像》，83×43 厘米，Sotheby's Fine Chinese Paintings, Hong Kong, 6 October, 2008. 編號 12160。此畫又亮相於 2010 年 8 月 1 日由廣東省拍賣行公司主辦、假廣東外經貿大廈二樓舉行的“廣東省 2010 夏季文物藝術品拍賣會”。

^⑥張大千《自畫像》，83×43 厘米，Sotheby's Fine Chinese Paintings, Hong Kong, 6 October, 2008. 編號 12160。

^⑦鄧民亮：〈從至樂樓書畫度藏管窺廣東收藏承傳〉，《明月清風——至樂樓藏明末清初書畫選》，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0 年，頁 46。

四、餘言

按記述，張大千於1949年9月也從成都飛抵香港，旋赴澳門並住在弟子家，為女弟子張志瓊作《浣紗女》圖，畫中題：

太白詩：盈盈素足女，不着鴉頭襪，更覺風致嫣然，天真可掬，因取其意為此，
于古寫浣女者，別開一生面。^①

張大千僅於澳門居住了數天，隨即於10月，赴台灣舉行個人作品展。有跡象表明，張大千1949年11月曾於香港逗留，鮑少游有云：“民國卅八年，予以‘牡丹’與‘金魚’為主題，假座思豪酒店畫廊，展出牡丹之作……而畫法敷色，亦各異其趣。”展品中，鮑少游運用了不少技法。當中包括宋陳維仁的“彈雪吹雲法”，即以彈弓於山樵上彈上白粉，以表現雪景的方式，鮑氏亦於其牡丹上施之，以呈現其雪中之致。沒想到，此舉被香港的同道於展場上譏諷，認為鮑氏摹學日本畫。當時在場者有張大千和高劍父（1879—1951），對此：“惟大千慧眼獨具，一見即笑對劍父說：‘此古法也，失之久矣。’”此外，他們兩人亦對展場中的金魚細細品味，“大千更大聲對劍父說：‘鮑先生無所不能，無一不精。’”^②或許，張大千此說不無“江湖習氣”，但換個角度來看，不正是對一些不學無術而強作解人的諷刺？

“鮑少游牡丹畫展”是1949年11月5日至7日舉行的，由葉恭綽題籤。^③同月的《華僑日報》上，我們看到該報記者謝天貽拍攝的照片，上題“鮑少游畫展中之高劍父（中）張大千（右）”。^④這是我們甚少見到的公開發表的高劍父、張大千及鮑少游的合照。它或許是高、張兩人最後的合影，因為張氏在澳門時，時任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高劍父仍於廣州，1949年末才回返澳門，而高劍父之所以於場中出現，主要是參加11月6日於香港大道中卅八號三樓中國近代書畫匯舉行的“港九書畫文藝界同寅第十次雅集”。^⑤他們三人之中，張大千還有重回故里一次的經歷，但高劍父在兩年之後的6月便逝於澳門鏡湖醫院。

對於張大千而言，風景秀麗的“花園城”——澳門是可堪留連的。就目前可寓目的文獻，張大千在澳門至少有如下重要的作品（表1）：

表1 張大千在澳門的重要作品

類型	名稱
山水	《白鴿巢鳥瞰》、《馬交石》、《西環》

^①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頁323。

^②鮑少游：《石濤與大千》，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8。

^③有關“鮑少游牡丹畫展”的資訊，可參看《華僑日報》（香港），1949年11月5日，第2張，頁2。

^④參看《華僑日報》（香港），1949年11月7日，第1張，頁4。

^⑤參看〈書畫匯雅集今日舉行〉，《華僑日報》（香港），1949年11月6日，第4張，頁1。

花卉	《荷花》
走獸	《烏猿》
人物	《淡墨女人圖》、《白描仕女圖》、《團扇閒情》、《竹林高士》、《浣紗女》
書法	條幅

張大千成圖於澳門的《團扇閒情》立軸寫陶淵明名篇〈閒情賦〉。^①此圖為張大千根據其畫稿而畫之作。就目前所知，其 1945 年和 1947 年均有，分別被名之為《執扇仕女》和《南國清歌》，而此 1949 年之本，被名之為《紈扇仕女》。張氏於其上題：“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颯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綿邈。拈淵明語寫於濠鏡。張大千爰。”《團扇閒情》繪一執扇盛裝仕女立於畫中，背景空白，女子微微側身，似含無限愁意。其衣紋婉轉流暢，神情落寞憂鬱，設色鮮豔亮麗，衣飾細節的勾勒頗為精絕，水汪汪的丹鳳眼令人憐愛，含蓄曲折。無疑，此圖的仕女豐腴健美，而其顏色敷染、面貌勾勒都上承襲唐人畫法，是張大千盛年時期仕女畫的“標準樣式”，精麗絕倫且富裝飾性。張大千能於澳門擬舊稿而作畫，或可想見其澳門蟄居條件不俗。

1949 年 10 月左右，張大千的畫展在台北中山南路北端天主教會新樓舉行。12 月，自台灣乘軍機返四川成都。12 月 12 日，攜夫人徐雯波乘軍機離開成都飛往台灣。此後，就是 1950、1951 年，張大千到印度辦畫展，回居香港。1952 年 2 月，張大千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展覽和旅遊，5 月返回香港後，為籌劃移居旅費，他向內地出售《韓熙載夜宴圖》、《瀟湘圖》、宋人冊頁等名畫。張大千後來先後移居南美阿根廷和巴西。1954 年去巴西由誰協助？據說與澳門蔡家有關！

20 世紀 60 年代張大千在巴西聖保羅創作巨幅《青城山全圖》，70 年代移居美國蒙特瑞，他又畫了《青城山第一峰》，寄託懷念之情。張大千晚年所創作的“潑彩”畫法，就是思念青城煙雨獨創出來的新畫法。

（緣於資料匱缺，本文寫作期間甚長，幸獲薛啟善先生不吝襄助，俾能先後拜識繆啟泰先生、蔡昌明先生，兩位前輩均與寓居澳門的張大千先生有往還，而當年張氏貽繆啟泰先生的扇面《賞竹圖》又是經薛啟善先生牽線而捐贈給澳門博物館的，因緣深種！諸友或提供線索，或提供圖像資料，俾能完成是項研究，特此說明，並謹申謝忱！）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王旭佳 黃耀岷 陳嘉欣]

^①張大千《團扇閒情》又名《紈扇仕女》，1949 年作，鈐印：張爰私印（朱文）、春愁怎畫（朱文）、長共天難老（白文）。裱邊：髯翁居士丹青筆，寫出峨眉妙入神。丁卯夏五月，趙少昂題。鈐印：趙（朱文）、少昂（白文）；此故人張大千所寫紈扇仕女圖。大千人物其風格丕變在去敦煌之後，此圖若五十餘時所作。秋暮。戊辰過香港觀因題。壯暮翁稚柳。鈐印：稚柳（白文）2009 年 6 月北京匡時拍賣，成交價為 112 萬元。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研究

王國強

[摘要] 本文分析二百年來澳門非高教育的出版概況，作者首先簡介澳門非高等教育的出版範圍，再說明不同時期的出版單位、編著者、出版品的語種、主題及出版年份的概況，最後通過過去的出版經驗，推斷未來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出版趨勢。

[關鍵詞] 出版 教育 澳門

澳門的非高等教育出版歷史悠久，例如有全中國最早一批的婦孺教科書、專門供修士們學習中文的教材等，特別在抗戰時期，更出版了大量教育書刊。本文將通過大量古籍的書影，從教科書、學校專刊、教育期刊、學科專著等多維角度，對編著者、出版機構、作品內容、出版背景等作出分析，在尋找及緬懷昔日光輝之餘，總結前輩們的經驗，傳承教育事業的優良文化，亦探討現今澳門教育書刊出版的概況及未來發展。

一、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的範圍

據筆者收集的資料，目前澳門本地共出版了3萬4千多本書刊，其中有1,314本是學校出版品，約佔整體5%；屬於教育類的則有3,360本，約佔一成左右。本文收錄資料日期至2022年7月30日止，收錄的範圍，從托兒所以後至中學畢業期間，不包括托兒所階段的嬰幼兒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範疇。至於出版品的類型，有紙質文獻、視聽資料、電子書等。而筆記簿、單張、文件、招生資料等則不在本文收錄的範圍，部分早期較珍貴的小冊子除外。

二、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史的分期

(一) 16—19世紀

這一時期主要是傳教士來華的著作；他們引進新式印刷術、中文活字模板，出版大量語文、宗教、醫藥衛生、數學等類型的教科書，代表機構為聖若瑟修院、英國東印度公司、香山書院。此外，華人的私塾教學，亦為澳門非高等教育史開創首次中文教育出版痕跡，如蔡懷善堂的《傳家寶》（1834）、《訓子瑣言》（1896）及曹存善堂的出版物。

(二) 20世紀初期

以陳子褒開辦澳門第一間平民學校為契機，他從廣州引進大量婦孺教科書，在石閘門

作者簡介：王國強，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澳門出版協會副理事長。

（營地大街）開設銷售點，改善了過往因教科書不足，華人識字未能普及的問題。此外，無原罪工藝學校（即慈幼中學前身）在 1910 年代開辦了印刷科，承印天主教教會的宗教著作，同時亦在此基礎上為學校編輯特刊、教科書、課外讀物。

（三）抗戰時期

抗戰時期不少廣州學校及師生避難到澳門。1937 年澳門有華校 33 間，學生 4,841 人，至 1942 年香港淪陷後，學校數量為 102 間，學生 34,573 人。^①因應需求，其時出版了大量的各級教科書，商科、應用文等書刊。而學生刊物亦在此時期大量湧現，約有 10 多本，內容除文學作品外，還涉獵國內政局、世界政治等大時代的題材。

（四）1950—1980 年

抗戰及新中國成立以後，大部分避居澳門的學校、師生紛紛回到原居地，澳門華人人口逐漸減少，經濟不景氣，各校零星地出版校刊及學生刊物。而此時的澳葡政府着手完善澳門教育制度與法規，以推動葡語教育及出版葡語教科書為主。

（五）1980—1999 年

改革開放以後，澳門新移民數量倍增。他們對基礎教育有強烈需求，部分更為國內的精英，不少知識分子進入了教育界發展，從此學校除出版校本為主的教科書、校刊、特刊及學生作品集外，有關澳門教育研究的著作亦開始出現。

此時期的教育著作題材多元，包括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前身為教育暨青年）的葡文老師出版了有關澳門教育史著作，澳門大學成立了教育學院，推動師生們有關教育研究的教學研討，出版了多本研討會論集；而民間社團則主要由澳門中華教育會劉羨冰校長的推動，成立了科研組，出版或發表不少研究教育研究及教育政策的著作。

（六）回歸以後

承接回歸前的良好教育出版勢頭，各校出版數量不斷增加，特別是出版校本教科書風氣盛行。至於學術著作方面，各校匯集本校老師的學術著作出版論集成為風氣。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前院長張國祥領導下，開展了多元智能及資訊科技、PISA 研究；前院長單文經在任期間，大力推動師生撰寫澳門教育史。

（七）最近五年

由於出版成本增加，過去學校重點出版的校刊、周年特刊、畢業紀念刊均相對減少。在出版教育研究的書刊方面，老師們因課堂壓力繁重，編寫教案及項目計劃的工作量大，沒有時間再兼顧更多教育科研工作。相反，教育界期望分享過去學校成長的經驗及歷程，因此有多本關於學校志及教師口述歷史著作出版。至於一直為教育類的主流出版品——學生用的教科書，轉由本地教育當局主導，因應國情需要，編著及出版有關愛國教育、性教育、家庭教育、本土歷史教育、本地中文教育等方面的教科書。

^① 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三、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在各時期的分析

依前述的不同出版時期及其出版數量而言，本文將非高等澳門教育出版分為四個時期：

- 1) 1949年以前：澳門教育書刊的孕育期；2) 1950—1979年：澳門教育書刊的休止期；3) 1980—1999年：澳門教育書刊的復甦期；4) 2000—2021年：澳門教育書刊的蓬勃期。

從數量上，最多是學校出版品，有1,317種；次為政府部門，1,108種；第三為社團，525種；第四為私人出版社，有327種，主要出版教科書及考試用書；最後為個人出版，共67種，主要為1949年以前的出版品，而狀況不明有16種（表1）。

表1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在不同時期的出版數量分析表

	出版單位類別						總計
	學校	政府	私人出版社	個人出版	社團	情況不明	
1949年以前	117	29	78	47	37	13	321
1950—1979年	216	51	23	3	56	3	352
1980—1999年	248	299	34	4	113	0	698
2000—2021年	736	729	192	13	319	0	1,989
總計	1,317	1,108	327	67	525	16	3,360

不同時期的出版單位屬性，以社團為最多，共201間，其中包括多間學校的學生社團出版單位；次為學校，共186間；第三為私人出版社，共80間；第四為政府部門，共53間；最後為個人作者，共22位（表2）。

至於社團在歷年的出版分佈，在201間社團中，以一般社團為最多，共85個，共出版281種書刊；第二為學生社團，共56個，出版121種；第三為校友會，共42個，出版96種，以澳門培正中學的校友出版最多，共52種；第四為家長會及大學學生會，各9間，分別為13種及11種，從中可察覺澳門家校合作在2000年以後才開始發展，而大學學生會則是因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及華南師範大學教師專業課程而成立的社團（表3）。

表2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在不同時期的出版單位分析表

	出版單位類別						總計
	學校	政府	私人出版社	個人出版	社團	情況不明	
1949年以前	39	6	18	8	28	12	111
1950—1979年	39	6	10	2	41	3	101
1980—1999年	40	17	15	4	47	0	123
2000—2021年	68	24	37	8	85	4	226
總計	186	53	80	22	201	19	561

表 3 不同時期的社團及社團出版品數量分析表

	社團類別										總計	
	校友會	出版數量	家長會	出版數量	大學學生會	出版數量	學生社團	出版數量	一般社團	出版數量	社團總數	出版數量
1949 年以前	8	11	0	0	0	0	16	19	4	7	28	37
1950—1979 年	12	12	0	0	0	0	16	20	14	24	42	56
1980—1999 年	14	35	0	0	5	7	11	27	17	44	47	113
2000—2021 年	8	38	9	13	4	4	13	55	50	206	84	316
總計	42	96	9	13	9	11	56	121	85	281	201	522

四、從編著者看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發展

個人編著者大多為老師，他們有的因應所任教的學科，累積教學經驗而編寫，或因應學校的需求而編輯特刊、年刊、年報及論集等。從下表可知（表 4），中文教育著作以張國祥、陳子褒、薛寶娣為主要編著者；外文著作以顏儼若、Pedro Nolasco da Silva（伯多祿）為主要編著者，其中以顏儼若的葡文教科書最多，曾多次重印再版，共出版超過 40 多種，對葡文教育影響深遠。

表 4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編著者列表（出版 5 本以上者）

排行	個人編著者	數量
1	張國祥	78
2	陳子褒	64
3	薛寶娣	63
4	顏儼若	23
5	Pedro Nolasco da Silva（伯多祿·殷里基·施利華）	20
6	Addis Fryback、Daniel Carruthers、Patricia L. de Muth	18
7	António Aresta（安文哲）、張航、鄭杰釗、黃素君、黃就順	12
8	盧蘭馨、Ana Cristina Santos、Carlos Santos、Filipe Didier、Paula Costa	11
9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江沙維）	10
10	王紅、蘇菊菴	9
11	劉羨冰、林牧修	8
12	李錦濤、Isabel Leiria、Manuela Vasconcelo、關啟佳、莫日從	7
13	Manuel Teixeira（文德泉）、尤端陽、馬茜玲、崔世平、陳志峰、陳新旺、Luís Gonzaga Gomes（高美士）、Horacio Poiares	6
14	李瘦芝、阮宇華、曾熾明、王勁秋、黃楓華、劉雅覺、方燕芬、鄺家健、Verónica Kwan、Ink Iao、Júlio César da Rosa、Robby Kwok	5

五、從出版單位看澳門教育書刊的發展

從出版量來看，排名前十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中，有5間為學校，3間為政府部門，2間為社團。最多是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及其前身，共705種，出版內容多元，主要有教育政策與法規、學術研究、期刊通訊等；其次為澳門大學，共142種，以教育研究及澳門教育史為主；第三為澳門粵華中學，共130種，由於該校成立超過95年，而每年均有出版校刊及畢業同學錄，所以累積了相當數量的出版品（表5）。

表5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數量
1	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705
2	澳門大學	142
3	澳門粵華中學	130
4	澳門濠江中學	119
5	澳門培正中學	117
6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	106
7	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	77
8	澳門中華教育會	64
9	澳門勞校中學	59
10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56

依各類出版單位的排行及其最早出版的年代作出統計，學校方面，最多是澳門粵華中學，共130種；最早首次出版的是1920年的澳門慈幼中學；最快速增長的是聯合國學校，自2013年起至今已出版44種（表6）。

表6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學校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數量	首次出版年份
1	澳門粵華中學	130	1944
2	澳門濠江中學	119	1944
3	澳門培正中學	117	1940
4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	106	1945
5	澳門勞校中學	55	1957
6	聯合國學校	44	2013
7	澳門菜農子弟學校	41	1986
8	澳門慈幼中學	38	1920
9	嘉諾撒聖心中學	30	1964
10	澳門鏡平學校	30	1942
11	利瑪竇中學	28	1960

政府部門方面，最多的是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及其前身，共 705 種，首次出版年份為 1949 年；最早的出版單位是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其前身官印局、澳門政府印刷署），於 1907 年出版。由於回歸以前，大部分政府部門的出版品均是印務局代為排版、印刷及出版，所以其出版數量有 88 種，該局本身出版品不多，主要是有關法律部門的出版物（表 7）。

表 7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政府部門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數量	首次出版年份
1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705	1949
2	澳門大學	142	1981
3	印務局	88	1907
4	統計暨普查局	30	1985
5	澳門理工大學	25	1997

社團方面，出版最多的是澳門中華教育會，共 64 種；次為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共 56 種，兩者首次出版均為 1950 年。最早首次出版的是澳門培正中學同學會，於 1945 年出版了第一本校友特刊。第四位的巴迪基金會（Badi Foundation），主要出版小幼的英文教科書；而第五位的東方葡萄牙學會（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自 1990 年首次出版葡文教科書，多年來從不間斷，至今共出版 25 種，為學習葡文的學生提供了基礎的參考書（表 8）。

表 8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社團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數量	首次出版年份
1	澳門中華教育會	64	1950
2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56	1950
3	澳門培正中學同學會	47	1945
4	巴迪基金會	26	2000
5	東方葡萄牙學會	25	1990

私人出版社方面，以澳門啟元出版社出版教科書 50 種為最多。早期出版者如要出版書刊，可委託印刷廠代理，所以 Typographia Mercantil 成為最早出版這類書刊的機構，共計 24 種。其餘排名在第三至五位的單位，除文化公所出版教育研究及教育歷史書刊

以外，其餘均為教科書的出版社，其中陳子褒的蒙學書局，自1900年出版至今均保持在五位以內，可見該書局對澳門教育事業貢獻良多（表9）。此外，20世紀80年代由澳門培正中學教師成立的澳門培教出版社，是當時較為活躍的單位。

表9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私人出版社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數量	首次出版年份
1	澳門啟元出版社	50	2019
2	Typographia Mercantil	24	1883
3	微宏數據分析（澳門）有限公司	21	2020
3	蒙學書局	21	1900
4	新華圖書有限公司	20	2020
5	文化公所	9	2019
5	澳門培教出版社	9	1980

個人出版方面，除陳子褒38種最多外，其餘的數量不多，可見教育界不太流行以個人名義出版書刊（表10）。

表10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個人出版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數量	首次出版年份
1	陳子褒	38	1900
2	陳新旺	6	2002
3	尹重謙	2	1945
3	高紹英	2	1960
3	郭輝堂	2	1944

總括來說，各時期不同出版單位中，澳門粵華中學、澳門培正中學在四個時期均有出版，其餘如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濠江中學及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均在三個時期有出版（表11）。

表11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在不同時期的排行表

排行	1949年以前	出版數量	1950—1979年	出版數量	1980—1999年	出版數量	2000—2021年	出版數量
1	陳子褒	38	印務局	46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236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469
2	Typographia Mercantil	24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	37	澳門濠江中學	40	澳門大學	128
3	蒙學書局、澳門聖若瑟修院	21	澳門粵華中學	33	澳門粵華中學	24	澳門粵華中學、澳門濠江中學	69

4	印務局	19	澳門培正中學	21	澳門培正中學 同學會	20	澳門培正中學	62
5	澳門培正中學	17	澳門中華教育會	14	澳門聖若瑟教區 中學	19	澳門啟元出版社	50
6	澳門慈幼中學	11	澳門慈幼中學	13	澳門菜農子弟學 校	17	澳門聖若瑟教區 中學	47
7	大眾印務	7	澳門中華學生 聯合總會、 鮑思高學校	9	澳門培正中學	16	聯合國學校	44
8	崇實中學、澳門 利宵中學、澳門 廣大中學	6	嘉諾撒聖心中學、 澳門世界書局	8	統計暨普查局、 印務局	15	澳門勞校中學	43
9	澳門光明書局、 澳門菊庵國文專 科學校	5	聖公會（澳門） 蔡高中學、澳門 取潔中學、澳門 濠江中學、澳門 鏡平學校	7	澳門中華教育會	14	澳門中華學生 聯合總會	40
10	香山書院、澳門 中德中學、澳門 粵華中學	4	聖若瑟修院、 澳門勞校中學	6	嘉諾撒聖心女子 中學	12	澳門中華教育會	35

六、從出版品的性質看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發展

本文將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性質分有 21 個小類並加以排行，可知以教科書性質的書刊為最多，共 971 種，2000—2021 年為迅速增長期。第二為特刊，共 758 種；第三為圖書，共 418 種；第四為年報，共 217 種；第五為期刊，共 194 種（表 12）。然而，在教科書類別，因學校習慣自行編製課堂的補充教材，且大多沒有公開，故應尚欠一定數量未被收錄。

表 12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性質在不同時期的排行表

排行	性質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總計
1	教科書	165	63	214	529	971
2	特刊	56	139	207	356	758
3	圖書	26	20	65	307	418
4	年報	6	41	37	133	217
5	期刊	30	30	53	81	194
6	年刊	9	32	8	119	168
7	手冊	3	5	17	121	146
8	調查研究	0	0	8	101	109
9	統計	0	0	29	75	104
10	會議錄	1	2	13	60	76
11	法律	10	10	9	46	75

12	視聽資料	0	0	3	22	25
13	展覽目錄	0	0	6	15	21
14	書目	1	0	14	3	18
15	名錄	3	8	4	2	17
16	字典	10	0	3	3	16
17	場刊	0	2	5	13	20
18	年表	0	0	1	3	4
19	檔案	0	0	1	0	1
19	樂譜	0	0	1	0	1
19	指南	1	0	0	0	1
總計		321	352	698	1,989	3,360

從不同出版品性質的首種出品列表，可以更進一步地得知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發展，以及其不可不知的歷史（表 13）。

表 13 不同出版品性質的第一本出版品列表

出版品性質	書名	作者	出版單位	年份
教科書	<i>Diálogos e Frases em Chinês-Português</i>	Padre Joaquim Afonso	/	1790 ?
特刊	<i>Exame do Relatório sobre o Seminário de S. José, Apresentado ao Exmo. Governador da Província de Macao e Timor</i>	António Luiz de Carvalho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ão José	1868
小冊子	傳家寶	蘭山佚人編	蔡懷善堂	1834
年報	灌根年報：1911	陳子褒	灌根學校	1911
期刊	灌根小雜誌	陳子褒	灌根學校	1916
年刊	<i>Anuário do Ensino de Macau: ano 1939-1940</i>	Conselho Inspector de Instrução Pública	Imprensa Nacional	1941
手冊	字首不字排檢法	趙榮光編	培正中學圖書館	1940
調查研究	澳門中英文學校幼稚園各科上課時數之統計：初步資料	教育暨青年司教育研究暨計劃室	教育暨青年司	1990
統計	教育調查：1983—1984	統計暨普查司	統計暨普查司	1985
會議錄	<i>I Encontro de Professores: Realizado de 26 a 31 de Agosto de 1968</i>	Repertiçã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a Educação	Imprensa Nacional	1969
法律	<i>Regulamento e Programma d'Estudos da Escola Central de Macau</i>	Escola Central de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e Filhos	1864
視聽資料	Olá, Macau! Curso de Português para a Rádio Curso Básico [錄音帶]	Armindo Cunha, [et al.]	Centro de Difusão da Língua Portugues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0
書目	培正中學圖書館館刊：遷澳圖書總目專號	培正中學圖書館	培正中學圖書館	1939

展覽目錄	第四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展 [展覽目錄]	澳門市政廳	澳門市政廳	1983
名錄	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附屬小學校 29 年度校務概況職教員一覽冊	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附屬小學校	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附屬小學校	1940
字典	<i>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i> (洋漢合字彙)	Padre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江沙維)	澳門聖若瑟修院 (Impresso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1
場刊	澳門中華鮑思高同學會慶祝母校金慶籌建鮑聖紀念祭台公演“偉大的愛”特刊	澳門中華鮑思高同學會	澳門中華鮑思高同學會	1954
年表	<i>Imagens Vividas: O Quotidiano da Educação em Macau</i> (教育影集：澳門教育日誌)	Albina dos Santos Silva (施愛萍) 等編	教育暨青年司	1997
指南	澳門遊覽指南	澳門中華教育會	澳門中華教育會	1935
樂譜	<i>Exsultate: Colectânea Musical do Seminário Diocesano de São José - Macau</i>	Seminário Diocesano de São José	Seminário Diocesano de São José	1996
檔案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	Albina dos Santos Silva (施愛萍), Aureliano Bart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6

單行本、期刊、多媒體三種出版性質中，單行本出版最多，共 3,036 種，佔總體的 90.4%；次為期刊，共 194 種，佔總體 5.8%；第三為視聽資料，共 130 種，佔總體 3.9%，包括 CD、VCD、DVD、EBOOK 及多媒體資料等，由於電子書慢慢被教育界所接受，製作成本較低，傳播面較廣，預計未來將會成為教育界的主流出版方式（表 14）。

表 14 各時期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主要類別分析表

時期	單行本	期刊	多媒體	總計
1949 年以前	291	30	0	321
1950—1979 年	322	30	0	352
1980—1999 年	639	53	6	698
2000—2021 年	1,784	81	124	1,989
總計	3,036	194	130	3,360

教育史主題在各時期出版品中，共分散在 13 個小類裏，共計 1,257 種，其中，特刊最多，共 735 種；第二位年報，共 217 種；第三為期刊，共 117 種；第四為圖書，共 72 種；第五為年刊，共 50 種（表 15）。

表 15 教育史主題在各時期出版品的性質分析表

排行	性質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總計
1	特刊	54	137	206	338	735
2	年報	6	41	37	133	217
3	期刊	15	19	32	51	117
4	圖書	3	5	20	44	72
5	年刊	9	32	5	4	50
6	名錄	3	8	4	1	16
6	法律	4	6	3	3	16
7	手冊	1	4	2	2	9
8	場刊	0	2	5	8	15
9	會議錄	1	0	0	2	3
9	年表	0	0	1	2	3
9	書目	0	0	0	3	3
10	檔案	0	0	1	0	1
總計		96	254	316	591	1,257

教育研究主題在各時期出版品中，共分散在 13 個小類裏，共計 547 種。排行第一為手冊，共 127 種，可見澳門教育界着重實務的操作；第二為統計，共 104 種；第三為圖書，共 103 種；第四為調查研究，共 96 種，顯示澳門教育研究的著作偏向調查研究的模式；第五為會議錄，共 43 種，反映出澳門教育界為引入各地先進的教育理念，邀請各地專家來澳出席學術研討會，分享心得（表 16）。

表 16 教育研究主題在各時期出版品的性質分析表

排行	性質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總計
1	手冊	0	0	14	113	127
2	統計	0	0	29	75	104
3	圖書	9	6	12	76	103
4	調查研究	0	0	8	88	96
5	會議錄	0	2	5	36	43
6	年刊	0	0	0	29	29
7	期刊	0	1	1	16	18
8	視聽資料	0	0	1	7	8
9	法律	0	0	0	5	5
10	字典	0	0	3	1	4
10	特刊	0	0	0	4	4
11	場刊	0	0	0	3	3
11	展覽目錄	0	0	2	1	3
總計		9	9	75	454	547

與教育相關學科在各時期出版品中，共分散在 18 小類裏，共計 589 種，以圖書為最多，共 244 種；次為年刊，共 89 種；第三為期刊，共 59 種；第四為法律，共 54 種；第五為會議錄，共 30 種（表 17）。

表 17 與教育相關學科在各時期出版品的性質分析表

排行	性質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總計
1	圖書	14	10	33	187	244
2	年刊	0	0	3	86	89
3	期刊	15	10	20	14	59
4	法律	6	4	6	38	54
5	會議錄	0	0	8	22	30
6	特刊	2	2	1	14	19
7	展覽目錄	0	0	4	14	18
7	視聽資料	0	0	2	15	17
8	書目	1	0	14	0	15
9	調查研究	0	0	0	13	13
10	字典	9	0	0	2	11
11	手冊	2	0	1	6	9
12	教科書	0	0	0	5	5
13	場刊	0	0	0	2	2
14	年表	0	0	0	1	1
14	樂譜	0	0	1	0	1
14	名錄	0	0	0	1	1
14	指南	1	0	0	0	1
總計		50	26	93	420	589

七、從出版品的語種看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書刊的發展

從不同語種分析各時期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可知中文為主要出版語種，共 2,418 種；次為葡文，共 355 種；第三為英文，共 226 種（表 18）。如只計算中葡英三語種，可得知中文有 2,773 本，佔總體 82.5%；葡文為 585 本，佔 17.4%；英文為 453 本，佔 13.5%（表 19）。

各語種均有在 1949 年以前出版，這是由於 16 世紀來華傳教士主要使用的是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為了有效學習中文，因而出版中拉或中意語文的教科書。中文方面，除了 20 世紀初陳子褒的婦孺教科書系列外，亦掀起了另一股出版國語及廣東話教科書的熱潮，主要在 20 世紀 30、40 年代，不少學校或教育界人士推動國語普及教育，同時因避戰亂，不少師生急需學習廣東話以便在澳門生活。抗戰時期，日本人在澳門活動頻繁，為了使更多人認識日文，於是開辦日文學習班，出版日文教科書。1950—1979 年期間，百業

待興，顏儼若神父出版的葡文教科書，成為本時期最重要的書刊；1980—1999年期間，澳葡政府期望在澳門推動葡文教育，所以此時期由東方葡萄牙學會及當時的教青司出版的葡文教科書數量激增。2000—2021年間，由於社會對英文需求日增，過去一直少量出版的英文出版品在此時期迅速增加，主要為教科書。

表 18 各時期不同語種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分析表

	語種													總計
	中	葡	英	中葡	中葡英	葡英	中英	中拉	中葡法	西	葡拉	中日	中意	
1949年以前	194	67	4	36	2	1	8	6	1	0	0	1	1	321
1950—1979年	254	56	2	12	0	0	27	0	0	1	0	0	0	352
1980—1999年	494	86	7	47	46	0	17	0	0	0	1	0	0	698
2000—2021年	1,476	146	213	28	53	3	70	0	0	0	0	0	0	1,989
總計	2,418	355	226	123	101	4	122	6	1	1	1	1	1	3,360

表 19 各時期三個主要語種的分析表

	語種		
	中	葡	英
1949年以前	249	107	15
1950—1979年	293	68	29
1980—1999年	604	180	70
2000—2021年	1,627	230	339
總計	2,773	585	453

八、從出版的主題看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發展

本文根據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主要數量分成 17 個主題，其中首五位為（表 20）：

第一為教育類，共 2,771 種，其中有 1,257 種與教育史相關，550 種與教育研究相關，965 種是其他教育教科書，如語文教科書、數學教科書、愛國教育教科書、安全教育教科書等。第二為文學類，共 203 種，主要為學生的文學總集，有 158 種，最早是 1928 年的《崇實文鈔（第一集）》，另有以出版學生創作為主的文学期刊 32 種。第三為藝術類，共 72 種，主要為學校師生作品及美術教育社團的合集。第四為語文類，共 65 種，以語文教育為主。第五為法學類，共 65 種，以澳門基本法、國家安全法、中國憲法為主。

表 20 各時期不同主題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分析表

排行	主題	時期				總計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1	教育	268	326	606	1571	2,771
2	文學	23	9	25	146	203
3	藝術	0	0	7	65	72
4	語文	12	5	14	34	65
5	法律	6	4	6	42	58
6	科學	0	0	8	46	54
7	歷史	4	1	6	28	39
8	書目	1	0	16	1	18
9	倫理	0	0	4	10	14
10	閱讀	0	0	1	12	13
11	健康科學	0	0	0	12	12
12	綜合	2	1	2	6	11
13	體育	2	1	0	6	9
14	音樂	0	2	1	5	8
15	地理	0	0	2	5	7
16	宗教	0	3	1	1	5
17	飲食	0	0	0	1	1
總計		318	352	699	1,991	3,360

九、有關教育類的書刊分析

為了更深入瞭解歷年教育類書刊出版的發展，以下將依教育史（1,257種）、教育研究（547種）、與教育相關學科（589種），以及教科書（967種）等方面作出分析：

（一）教育史

本主題共有書刊 1,257 種（表 21），時期分佈為：1949 年以前有 96 種，1950—1979 年有 254 種，1980—1999 年有 316 種，2000—2021 年有 591 種。如依各類子主題的分析，可知畢業同學錄為最多，共 343 種，由於畢業同學錄內容涵蓋了畢業班師生的相片、生活點滴、聯絡資料、校史簡介等，是提供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手參考資料。可是，由於該類型出版品印刷成本較高，發行對象為畢業師生，所以收集資料相對困難。1980—1999 年及 2000—2021 年兩時期的出版量相對接近，可能因為資料收集不完整，或者是新一代畢業生沒有上一代般積極，或者是因為成本高昂轉以多媒體方式出版。排第二位的是學校校慶特刊，共 212 種。學校出版校慶特刊通常為一年一刊或五年一刊，主要是回顧過去的工作，最早為 1940 年由 Cândido de Carvalho 編輯的 *Escola Comercial Pedro Nolasco. Quatro Anos de Direcção 1935 a 1939*。第三位為學校校史，共 118 種，主要是學校的簡介，最早是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 於 1907 年出版的 *Memória sobre o Gabinete de Ciências Physico-naturaes do Lyceu Nacional de Macau Apresentado a S. Ex.^a o Governador da Província Martinho Pinto de Queiroz Montenegro*。第四位為學校年報，共 109 種。年報主要是報告學校年度所發生的事情及工作報告，因此本文亦將年度計劃計算在內，如果年度的校刊亦是以報導當年的活動為主，亦入此類。

第五位是澳門教育社團歷史，共 79 種。其中，校友會 26 種，最早出版的是 1939 年的《澳門聖若瑟校友會彙刊》；家教會 3 種，最早出版的是《高美士中葡中學家長會成立 10 周年紀念特刊》；教育會 24 種，最早是 1837 年 Samuel Wells Williams（衛三畏）的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當中，澳門中華教育會歷史 12 種，學生社團 20 種，最早是 1941 年的《澳門執信學生自治會兩周年》；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14 種；慈善會 1 種。社團特刊大多反映籌辦學校的歷史、家校合作、校友發展、學生活動、教育界的活動，可為整理澳門教育史提供基本資料。

第六位為學校通訊，共 67 種，最早是 1916 年的《灌根小雜誌》；第七位為教育社團年報，共 62 種，最早為 1953 年《澳門學聯第三年工作報告》；第八位為政府部門年報，主要是《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年報》，該刊是在 2002 年起，分別以三語出版，共 46 種。第九位為澳門教育社團通訊，共 43 種，最早出版是 1939 年《青年會月報》；校友會通訊，最早是 1948 年《培正同學會通訊》；家長會最早是 2000 年的《根：陳瑞祺永援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教育會，最早是 1952 澳門中華教育會的《新教育參考資料》；普通社團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於 2003 年出版的《校園新動力》；第十位為教育年刊，共 42 種。

此外，教育家傳記、教育年表均為重要的參考書，前者有 38 種，其中有 10 本是外籍

教師的傳記，以 Manuel da Silva Mendes 最多，佔 4 種；後者有 3 種，包括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出版，由施愛萍編輯的《教育影集：澳門教育日誌》，記錄了公立學校教育的大事紀；2002 年劉羨冰出版了《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全方位記錄了澳門教育界的大事；到了 2011 年，陳志峰出版了《澳門回歸十年非高等教育範疇大事記（1999.12—2009.12）》，補充了回歸後十年的教育大事。學校規章及手冊，共 26 種，最早是 1864 年的 *Regulamento e Programma d'Estudos da Escola Central de Macau*。政府部門資訊 7 種，最早是 1988 年的 *Boletim Mensal de Informação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表 21 教育史主題在各時期的子主題分析表

排行	子主題	時期				總計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1	澳門學校畢業同學錄	16	84	111	132	343
2	澳門學校校慶特刊	12	34	61	105	212
3	澳門學校校史	11	17	19	71	118
4	澳門學校年報	5	38	16	50	109
5	澳門教育社團歷史	16	13	13	37	79
6	澳門學校通訊	11	12	12	32	67
7	澳門教育社團年報	1	3	21	37	62
8	澳門政府部門年報	0	0	0	46	46
9	澳門教育社團通訊	4	10	11	18	43
10	澳門教育年刊	9	30	3	0	42
11	澳門教育家傳記	6	2	8	22	38
12	澳門教育史	0	0	12	21	33
12	澳門學校校規	4	10	6	5	25
13	澳門教師教育	0	0	10	5	15
14	澳門政府部門通訊	0	0	6	1	7
14	澳門教育通訊	0	1	4	2	7
15	中國教育史	0	0	1	4	5
16	澳門教育年表	0	0	1	2	3
17	澳門教育社團規章	1	0	0	0	1
17	緬甸教育史	0	0	0	1	1
17	葡萄牙教育史	0	0	1	0	1
	總計	96	254	316	591	1,257

（二）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主題共計有 550 種、30 個小類（表 22）。排第一位是教育統計資料，是為教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的工具書，共 113 種。1985 年當時的統計司（現統計暨普查局）出

版了《教育調查 1983—1984 初步結果》後，直到 2011 年為止均以年度統計方式出版。而根據所收集的文獻，當時的教育局（現教育暨青年發展局）最早出版的教育統計為《1991—1992 教育統計資料》，以中葡英三語的小冊子發行；1997 年中文書名改名為《教育數字》，2000 年改名為《教育數字（非高等教育）》，2005 年改為《教育數字概覽》，並分別以中葡英三語單獨出版，2021 年改為《教育統計數字概覽》。在教師統計方面，最早出版了《教育及訓練數字：1993—1994》三語小冊子，1994 年中文改為《教育及培訓數字》，2005 年改名為《教學人員培訓概覽：2004 至 2005 年》。另外該局亦於 1996 年出版了單行本《教師資料（非官制私立學校）：1994—1995》。總計有關教育統計資料計有：教師統計 14 種、普通教育統計 92 種、課時統計 7 種。合共 113 種。

排第二位是升學輔導類書刊，共 100 種；20 世紀 80、90 年代，因升讀大學未普及，高中畢業的學生面臨就業與升學抉擇，當年的出版以升學與就業題材為主。2000 年後，澳門社會生活穩定，升讀大學普及，此時期的升學書刊，分為本地、國內及台灣等地的入學參考書，主要的出版單位有新生代雜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以及教育局。同時，教育局於 2006 年分別以中葡英三語出版學年入學指南，讓家長瞭解入讀幼稚園、非高等教育的資訊。

升學的期刊有 2 種，2008 年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出版《留學澳門》，於 2010 年改名為《求學澳門》；而有關升學研究的專著，有 3 種，均為小冊子。分別為何思謙議員辦事處教育研究小組於 1986 年出版的《關於澳門學位供求情況的若干分析》；教育局在 2001 年出版的《2001—2002 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班學生升讀大專科系調查報告》及 2012 年由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出版、胡雅坤編的《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意向調查研究報告：2011—2012》。總計升學類書刊分別有：澳門本地升學指南 81 種（概況 14 種、非高等教育 38 種、高等教育 29 種）、國內升學指南 6 種、台灣升學指南 3 種、葡萄牙 2 種、美國 1 種，此外，還有澳門高校入學試參考資料 21 種、升學與就業研究 3 種、升學期刊 2 種。

第三位為教育評估，共 79 本，最主要是澳門大學張國祥的 PISA 團隊的著作，共 71 種，有 1 種是 PIRLS，基本能力評估有 4 種，其他為 3 種。

第四位為教育研究，共 60 種。主要是教育的論集，有 43 種。其中 5 種以澳門為題，期刊 2 種。第五位為教師教育，共 31 種，包括教師教育論集 12 種、內地優秀教師分享 12 種、專著 4 種、教育約章 2 種、期刊 1 種。

至於有關各地的教育概況及歷史的出版數量不多，共 7 種，其中 5 種關於中國內地，包括《百年變遷百花盛放：賀中山實驗高中（中山師範）百年慶典》、《中山鄭亮鈞幼稚園特刊》、《講台生涯》、《永恆的燈塔：紀念章外小學創建八十五周年（1929—2014）》、《石嶺小學校志（1928—2017）》。另有劉羨冰的《南歐風彩，葡國教育（1991）》，2016 年緬華筆友協會的《難忘舐犢情：紀念緬甸仰光中國女中一百年華誕》，說明教育研究以本地為主，由於題材所限，本地出版品較難在澳門地區以外有所發展。

表 22 教育研究主題在各時期的子主題分析表

排行	教育研究類別	時期				總計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1	統計	0	0	37	76	113
2	升學	0	0	15	85	100
3	教育評估	0	0	1	78	79
4	教育研究	4	4	5	47	60
5	教師教育	0	0	1	30	31
6	課程研究	0	0	3	18	21
7	親子教育	0	0	2	13	15
8	教育行政	1	0	1	12	14
9	學校評鑑	0	0	0	12	12
9	輔導	0	0	1	11	12
10	愛國教育	0	0	0	10	10
11	幼兒教育	1	1	0	7	9
11	性教育	0	0	0	9	9
11	教育政策及制度	0	0	2	7	9
12	家校合作	0	0	1	7	8
12	家庭教育	2	1	2	3	8
13	教育改革	0	0	1	6	7
14	學習心理學	1	3	0	2	6
15	多元智能	0	0	0	5	5
16	教學法	0	0	0	4	4
16	創意教育	0	0	0	4	4
17	教育學字典	0	0	3	0	3
18	戶外教育	0	0	0	2	2
18	特殊教育	0	0	0	2	2
19	優質教育	0	0	1	1	2
19	少數民族教育	0	0	0	1	1
19	教科書研究	0	0	0	1	1
19	資優教育	0	0	0	1	1
19	生本教育	0	0	0	1	1
19	華人教育	0	0	0	1	1
	總計	9	9	76	456	550

(三) 與教育相關學科

與教育相關學科共計 589 種，分為 16 個子主題（表 23）。結果發現，排前五位的主題圖書，在 2000—2021 年期間均錄得激增的數字，說明此時期為各學科出版的迅速發展期，排行第一位的是文學主題的書刊，共 203 種，其中，主要為師生的文學作品總集（147 種）；次為藝術類，共 72 種，主要為師生的藝術作品，有 56 種；第三位為語文類，共 65 種；第四為法律，共 58 種，主要為教育法及學校的規章手冊；第五為科學，共 54 種，主要為數學教育的書刊。

表 23 與教育相關學科在各時期的子主題分析表

排行	與教育相關學科	時期				總計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1	文學	23	9	25	146	203
2	藝術	0	0	7	65	72
3	語文	12	5	14	34	65
4	法律	6	4	6	42	58
5	科學	0	0	8	46	54
6	歷史	4	1	6	28	39
7	書目	1	0	16	1	18
8	體育	2	1	0	6	9
9	倫理	0	0	4	10	14
10	閱讀	0	0	1	12	13
10	健康科學	0	0	0	12	12
11	綜合	2	1	2	6	11
12	音樂	0	2	1	5	8
13	地理	0	0	2	5	7
14	宗教	0	3	1	1	5
15	飲食	0	0	0	1	1
總計		50	26	93	420	589

(四) 教科書

教科書共計有 964 種，共分為 36 個子主題（表 24），當中以中文教科書為最多，共 234 種；次為葡文，共 152 種；第三為歷史，共 97 種；第四為課程大綱，共 89 種，主要為教育暨青年司在 20 世紀 90 年代統計中小幼各科的課程大綱；第五為數學，共 83 種。此外，有 17 個子主題是在 2000—2021 年才開始發展的，包括科學教育、四校入學輔導、安全教育、綜合、社會教育、物理、STEAM、化學、STEM、環保、體育、文學、性教育、旅遊、經濟、學習心理學、親子教育等。科學教育主要是聯國學校出版的科普教科書；而 2018 年起實施澳門四校聯考制度，帶動多間教學中心出版入學考試參考書。

表 24 教科書主題在各時期的子主題分析表

排行	教科書類別	時期				總計
		1949 年以前	1950—1979 年	1980—1999 年	2000—2021 年	
1	中文	81	17	15	121	234
2	葡文	35	9	63	45	152
3	歷史	20	1	3	73	97
4	課程大綱	0	0	89	0	89
5	數學	3	2	5	73	83
6	英文	4	0	7	47	58
7	倫理	0	0	3	39	42
8	音樂	4	15	10	1	30
9	地理	4	5	13	3	25
10	科學教育	0	0	0	21	21
11	四校入學輔導	0	0	0	20	20
12	安全教育	0	0	0	18	18
13	法律	0	0	2	10	12
14	社會教育	0	0	0	11	11
14	綜合	0	8	0	3	11
15	STEAM	0	0	0	6	6
15	物理	1	0	0	5	6
16	化學	0	0	0	5	5
17	STEM	0	0	0	4	4
17	環保	0	0	0	4	4
17	健康科學	2	2	0	0	4
18	文學	0	0	0	3	3
18	生物	0	0	2	1	3
18	體育	0	2	0	1	3
18	哲學	3	0	0	0	3
18	拉丁文	3	0	0	0	3
19	性教育	0	0	0	2	2
19	旅遊	0	0	0	2	2
19	經濟	0	0	0	2	2
19	學習心理學	0	0	0	2	2
19	親子教育	0	0	0	2	2
19	輔導	0	0	2	0	2
19	宗教	1	1	0	0	2
20	日文	1	0	0	0	1
20	印刷	0	1	0	0	1
20	裁縫	1	0	0	0	1
總計		163	63	214	524	964

十、結語

基於未來數年的教育經費將較為緊張、人力資源不足、加上出版書刊的時間周期較長、紙本書刊傳播成本高效益低；此外，印刷廠的技術改進、網絡科技高速發展及年青人的閱讀電子書習慣盛行，所以預見未來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將有以下的改變：

1. 以電子書刊取代傳統紙質圖書，如畢業特刊、周年紀念特刊、學生作品集。
2. 由於人力及出版專業不足，漸漸改以外判專業出版單位來出版及編輯書刊。
3. 為迎合年青人的品味，排版設計將以輕鬆活潑、圖像多、文字少為主。
4. 學術著作內容將以年長老教師出版回顧澳門教育發展著作，以及各校老師的教育研究論文彙編為主。
5. 學生著作亦因應學校的發展而大量增多，如文學、本土歷史、藝術、科普等。
6. 出版特刊是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的特色，所以負責編輯的教育工作者，將要在美工設計上花點時間，同時要多參閱各式新穎的排版及網頁設計，以應付新時代的出版工作。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黃耀岷 陳嘉欣]

《澳門研究》2022 年總目錄

(括號內前一數字是期數，後一數字是頁碼)

編輯部

教育研究

- 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 鄭振偉 (102 : 006 - 031)
- 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 劉暉 (102 : 032 - 051)
- 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 蘇少丹 張紅峰 (102 : 052 - 066)
- 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互動中的
優勢和策略 盛力 (102 : 067 - 074)
- 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
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
..... 彭俊 李悅 (102 : 075 - 086)
- 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
..... 向天屏 (102 : 087 - 103)
- 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之
關係——以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為例
..... 董志文 (103 : 095 - 110)
- 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
生活品質的探討 張玉琪 (103 : 111 - 130)
- 澳門初中《品德與公民》教科書中國家認同的建構
..... 劉子源 (105 : 122 - 132)

宗教與歷史／歷史研究

- 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 陳敏 夏泉 (102 : 104 - 115)
- 清代中期澳門印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銀單”
..... 邢思琳 冷東 (103 : 006 - 020)
- 從日葡貿易看 16 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
..... 張蘭星 (103 : 021 - 031)
- 唐廷桂正名考 賓睦新 (103 : 032 - 045)
- 唐廷樞及其家族與廣州的關係考述
..... 寧力 吳宏岐 (103 : 046 - 057)

契約華工從澳門赴古巴及其相關問題

- 宋玉宇 葉農 (103 : 058 - 071)
- 粵澳金融合作視野下的廣記銀號 (1939—1945)
..... 秦雲周 陳芬 (103 : 084 - 094)
- 澳門商與社會的關係網絡建構及其社會資本形成
..... 方木歡 (105 : 095 - 110)

經濟社會建設

- 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 周金泉 何文晉 (102 : 116 - 130)
- 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
..... 周平 陳朋親 (102 : 131 - 143)
- 官方旅遊項目宣傳建構的澳門旅遊形象
..... 林雪儀 李秀珊 (105 : 006 - 022)
- 澳門旅遊需求研究——基於機器學習及互聯網搜索熱度
..... 王俊皓 苑皓 阮智豪 (105 : 023 - 040)

法律研究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採購的判給及相關行為
..... 鄧達榮 (103 : 072 - 083)
- 澳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性質與過錯責任
..... 黃志豪 (103 : 084 - 094)

紀念鄭觀應誕辰 180 周年

- 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
..... 薛賀文 (104 : 008 - 016)
- 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
..... 李政陽 (104 : 017 - 025)
- 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 郭淦 (104 : 026 - 037)
- 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與時代特徵
..... 毛禹霖 (104 : 038 - 048)
- 鄭觀應與張之洞海南經略異同
..... 艾希 劉丹漫 (104 : 049 - 066)

“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劉茜 (104 : 067 - 077)
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鄧麗嬋 (104 : 078 - 088)
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	楊格 (104 : 089 - 098)
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潘小童 (104 : 099 - 109)
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李孜 (104 : 110 - 121)

城市規劃

澳門都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導向困境與影響因素	施養正 (105 : 041 - 056)
非正式住宅：二十世紀澳門都市形塑過程中的契機及過渡媒介	郭立怡 吳秉聲 (105 : 057 - 071)

文化研究

澳門居民的跨境流動與國家認同	藍宇東 (105 : 072 - 083)
----------------------	-----------------------

文學研究

雙向合流：2021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趙哲 (105 : 111 - 121)
--------------------------	----------------------

學術筆記

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	呂澤強 鄭國興 (102 : 144 - 151)
盛治：一幅新發現的乾隆時期“澳門山水長卷”探析	楊斌 (103 : 131 - 143)
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	湯開建 (104 : 122 - 150)
張大千與澳門因緣的再研究	陳繼春 (105 : 133 - 145)

政策研究

澳門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路徑、成效與評估	王建偉 劉俊麗 (103 : 144 - 157)
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	雷梓峰 李振國 (104 : 151 - 162)

書評

澳門學著作提要 (四十五)	白昕霞 (102 : 152 - 158)
澳門學著作提要 (四十六)	封小龍 (103 : 158 - 164)

其他

編者語	編輯部 (102 : 005)
編者語	編輯部 (103 : 005)
編者語	編輯部 (104 : 005)
編者語	編輯部 (105 : 005)
研究鄭觀應，學習鄭觀應——專輯主持人語	林廣志 (104 : 006 - 007)
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	編輯部 (104 : 163 - 167)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研究	王國強 (105 : 146 - 166)
《澳門研究》2022年總目錄	編輯部 (105 : 167 - 168)

“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劉茜 (104 : 067 - 077)
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鄧麗嬋 (104 : 078 - 088)
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	楊格 (104 : 089 - 098)
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潘小童 (104 : 099 - 109)
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李孜 (104 : 110 - 121)

ABSTRACTS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o's Tourism Image in the Official Promotional Materials in the Signature Events

LAM Sut I, LEI Sao San • 6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o's tourism image in official promoting materials. With a case study of three signature events of the city, the paper draws on the corpus-assisted multimodal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official news releases and the promotional videos, so as to analyse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o's tourism image in the official promotional materials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extual and visual resources and how they function in tourism image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with verbal and visual realisation, Macao is transformed from a gaming city into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with love, joy, and festivals.
Keywords: Corpu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ourism promotional materials, City image, Macao

Research on Macao's Tourism Demand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Internet Search Index

WANG Junhao, YUAN Hao, RUAN Zhihao • 23 •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models, namely, the traditional time series model ARIMA, the machine learning model random forest, LSTM and CNN-LSTM. We use them to analyze the sequenc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mmigrants in Macao from January 2008 to December 2019. Based on Internet search popularity data (Baidu Index, Google Trends), compared with the data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tourists' search preferences represented by the popularity of different search engin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NN-LSTM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search popularity of Google and Baidu is the best, and the CNN-LSTM model does not have strict requirements on the data preprocessing process,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scene of this study, namely the tourism demand of Macao predict.
Keywords: Internet search popularity, 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CNN-LSTM (Convolu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Travel demand, Machine learning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Interest Orientation in Macao's Urban Renewal

SI Ieong-cheng • 41 •

Abstract: As the regulating mechanism of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renewal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Macao's urban construction to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link to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Macao residents, avoid safety and hidden problems, revitalize the community economy and coordin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tourism and leisure center.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e failure to promote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old areas in the early stage has led to the polariz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atterns, the damage of public interes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which is further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cao.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hanges of Macao, city reviews and updating th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this study has found the SAR government needs to promote mor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ed are essentially around the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the benefit and the change of power struc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urban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following the attribute of public interest, implementing the right transformation system,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legal guarantee, and actively 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Public interest,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Urban renewal, Macao research

An Essay on the Informal Housing as an Opportunity and Transactional Agency of Macao's Urban Formation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KUOK Lap-I, WU Ping-Sheng • 57 •

Abstract: The informal sector appears with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modern urban system, and then alters along with their changes. It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elites under capitalism. It also is the frontier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formation. Macao was a Portugal colonial city located in the shore area of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cao was marching to modern society, in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Macao had a unique population structure composed of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maritime area population and immigra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so, the pressure of housing applied had kept accumulating due to waves of migration. To levitate and redirect the overwhelming housing demand, an informal housing system had been developed.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l housing in Macao city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rting by analyzing the social feature of the possible core consumer of the informal housing, as well as the vacancy left by the formal housing market. Then further the study on the three types of Macao's informal housing, which are boats, shanties, and subdivision hous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Macao's informal housing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not just a self-help tactic that simply resulted from the property; it also was a channel for the outsider and socially marginal groups to get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urban system. Furthermore, it acted as the primal stage of urban tissue to motiv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being the essential articu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social stages.

Keywords: Informal sector, Urban society, Immigrant, Marginal population

Trans-boundary Mobi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Macao Residents

LAN Yudong • 72 •

Abstract: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of the "Return of Recognition" project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The linkage betwee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becomes increasingly str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Macao residents on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usses its mechanism based on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on Macao's social mentality. Results show that Macao residents who had more frequent trans-boundary mobility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distance plays a ful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Even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b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 of social distance remained reliable.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the efforts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the adverse factors which impede transboundary mobility should still be addressed. Furthermore, improving national identity requires a reduction in social distance. Establishing a common identity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can promot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Macao residents in the long run.

Keywords: Mediation effect, Social distance, National identity, Trans-boundary mobility, Macao

Guangji Yin hao Based on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anton Province and Macao (1939-1945)

QIN Yunzhou, CHEN Fen • 84 •

Abstract: Relying on the pivotal role of Macao and the abundant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of Canton Province,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Bank successfully set up a branch in Macao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South China. As the only branch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banks in Macao, it remained in business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However, the Macao-Portuguese government strictly prohibited foreign banks from setting up branches to maintain the monopoly of the Atlantic Macao Bank.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Bank had to operate under the name of "Guangji Yin hao", identifying itself as a non-governmental entity. Objectively, this private status helped to dilute its official background, which not only met its strategy of smoothing remittance circul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accumulating overseas remittance resources but also help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o better gather resources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South China, Overseas remittances,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Bank, Guangji Yin hao, Maca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Business Families with Associations in Macao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Social Capital

FANG Muhuan • 95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 families and associations in Maca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cao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Macao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Kiang Wu Hospital Charitable Association, Tung Sin To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ors Association of Macao, and explores how influential Chinese business families in Macao establish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b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ssociations. In essence, Chinese business families have formed a social network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existence with the associations through the two-way interaction, thus increas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stock and forming social power.

Keywords: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coexistence, Social capital,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Chinese business family

Two-Way Collaboration: Overview of Macao Literature Research in 2021

ZHAO Xi • 111 •

Abstract: There was abundant research on Macao Literature in 2021. In the previous year, Macao literature had not only a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Greater Bay literary community with its unique charm and cohesive role, but also had a more accurate force and a clearer research vision;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see that Macao literature had tried to build a native research landscape with a strong consciousness, and had made achievements in creation and research. From the occurrence of Macao's modern literar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tyles, the depth of the research had been gradually promoted. While building a localized research system, Macao integrated into the Greater Bay literary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showing a two-way trend.

Keywords: Literature, Greater Bay literary, Localization, Maca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Textbooks in Macao

LIU Ziyuan • 122 •

Abstra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eenager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even national security.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2018 revision), a textbook of Macao junior high school co-edited by Macao and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students in the textbook from four aspects: national symbol, national history, na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follow a path of Macao characteristics that emphasizes uniqueness, openness and pertinence, and strive to adapt to the teaching reality of school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expected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textbooks, Textbook, National identity, Macao

Research on Non-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 Macao

WONG Kwok Keung • 14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on-higher publishing in Macao over 200 years. The author first introduces the scope of non-higher education, and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publishing, mainly in the type of publishers, authors, the languages of works, subjects, and so on.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in Macao can be predicted.

Keywords: Macao publishing, Macao education

《澳門研究》徵稿啟事

《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自1988年創刊以來，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本刊的學術水平及在學術界的認受性，本刊於2018年起實行“匿名評審”制度，確保所有刊登論文均經過同行評鑑。本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來稿請以中文撰寫並提供英文摘要，稿件類別及要求如下：

（一）稿件類別

（1）論 文：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和應用論文。字數以10,000至15,000為宜，並含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註釋、參考文獻（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以腳註的方法附於每頁下方）等。

（2）學術筆記：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以及對本刊所刊內容的回應，字數不限。

（3）政策研究：刊登有關澳門時事、政策及重大社會議題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不限。

（4）書 評：刊登內容有關澳門的、或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投稿要求

（1）來稿須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

（2）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

（3）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https://cms.um.edu.mo/publication/>）。

（4）來稿請電郵至 cms.info@um.edu.mo，若三個月內未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

（三）其他

（1）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

（2）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

（3）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

（4）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

《澳門研究》編輯部

編輯委員會（以姓氏筆畫為序）

朱壽桐 宋永華 李雁蓮 李 憑 吳德榮
金國平 姚京明 唐繼宗 張曙光 陸萬海
黃竹君 馮家超 湯開建 楊允中 楊秀玲
葉桂平 鄭振偉 駱偉建 龐 川

2022年第4期 總第105期

澳門研究

出 版：澳門基金會
編 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主 編：吳志良 林玉鳳
編輯部地址：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澳門大學崇文樓(E34)G025室
澳門研究中心
電 話：(853) 88228139
傳 真：(853) 28860009
電 郵：cms.info@um.edu.mo
封面設計：馮文偉
排版印刷：同點設計策劃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定 價：80澳門元

ISSN 0872-8526



9 770872 852007

ISSN 0872—8526